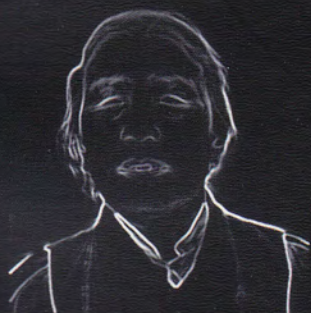


黑色文库 第十五集



阿妈阿德 口述
乔伊·布雷克斯莉 著
杨莉黎 译

记忆的声音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十五集

记忆的声音

阿妈阿德 口述
乔伊·布雷克斯莉 著
杨莉藜 译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6

目录

出版缘起	9
达赖喇嘛序	13
一部藏人的悲情史诗（序）.....吴弘达	15
执笔者前言	19
说在前头	25
第一部 苦难降临前的岁月	
第一章 花原上的童年时光	31
第二章 离开梁茹	37
第三章 家庭与传统	42
第四章 甘孜的记忆	55
第二部：侵略与监禁	
第五章 共产主义来临	67
第六章 遗忘的诺言	84
第七章 殊死搏斗	97
第八章 被捕	106
第九章 “永世不得翻身”	120
第十章 果塘嘉果	134
第三部 湖中莲花	
第十一章 枉费心机	155
第十二章 重逢	178
第四部 不息的声音	
第十三章 走出囹圄	201
第十四章 自由	227
第十五章 死者与生者的见证	238
尾声 时轮	245

附录一：历史事件撮要	251
附录二：西藏专名英汉对照表	259



阿妈阿德



阿妈阿德与达赖喇嘛的合照



作者与现在的丈夫仁青桑珠1987年摄于布达拉宫前



阿德和美国著名影星李察·基尔（右）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Lodi Gyari在一次集会上的合影。



阿德(右四)与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弘达（右三）及其他支持者在集会上的合影。



阿德与法国前总理乔斯潘的合照



阿德（右二）和仁青（右一）1989年在德国波恩的中国使馆前抗议



阿德（左一）和仁青（右一）到达兰萨拉受到友人招待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 in 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

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6 年于华盛顿

达赖喇嘛序

本书是西藏人民悲惨经历和英雄事迹的感人见证。主人公阿妈阿德在中国监狱生活了二十七年，她和家人因参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藏人抵抗运动，被捕入狱。正是他们这些人使西藏的斗争朝气蓬勃、百折不挠。

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妈阿德的故事，而且也是为她能在苦难中活了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求正义争自由的战斗。正如阿妈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难者的声音。”

我坚信本书的读者会了解西藏人民饱受折磨的真实状况，了解那些试图毁灭西藏文化与藏人特质的内幕真相。我希望此书会鼓舞更多的人们，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

丹增嘉措
至尊达赖喇嘛

一部藏人的悲情史诗（序）

吴弘达

这是《黑色文库》出版的第二本西藏人被劳改的书。

书中的主人公是女的，她的名字叫阿妈阿德。按照西藏人的风俗习惯，她没有什么文化，长大嫁了人，不久有了第一个孩子。小男孩周岁时，父亲突然不明不白被人毒死，不久她自己被逮捕。这株没有雨露阳光的幼苗早早就夭折，才五六岁的孩子就疯掉了，淹死在河中。阿德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时已是半个孤儿，尚在襁褓之中就又失去母亲，二十多年后，母女重逢时，如同陌路人，女儿已成人。青春少妇阿德坐牢二十六年，出来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了。

阿妈阿德经历了太多折磨，在狱中她被汉人警察拳打脚踢、扯头发，有时被迫跪在削尖的木片上。干警把竹签子楔进她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还把竹签子慢慢地往指甲盖里插，要强迫她供出“同谋”。阿德一次次昏死过去，却从没有开过口。

阿德也经历了太多的死亡：丈夫死在自己眼前，许许多多的朋友熟人被饿死、打死、折磨死，还陪姐夫上过刑场，亲眼目睹姐夫怎样在子弹下脑浆迸裂，沾满她的衣裳。她曾被丢进停尸房，醒转来后，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阿德也遭遇过无数的精神和身体的凌辱，她和同伴们都被狱警强奸，有的女犯还因此怀孕。汉人侮辱她的亲人、神明、宗教和文化。逼藏人亲手把古老珍贵的藏文经书一页页撕下来，拌在

灰泥中，填补墙洞。每撕一张，她的心都在颤抖泣血。寺庙中的佛像被砸烂，锯成两半，丢在仓库中。汉人干部还强迫所有藏人背毛语录，感谢共产党，欢呼“祖国”的强大。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中共政权五六十年代，甚至于到今天，在西藏推行的种族和宗教绝灭政策可以比美纳粹。由于历史和地域上跟外界隔绝，西藏许多世纪以来就遗世独立，似乎是远离人类世俗文明的化外之地。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各国都还没有从法西斯的残酷罪行造成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对共产主义的非人性和暴虐的认识也还不够，因而任由这种近乎种族绝灭的罪行发生，那么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世界还坐视汉人的移民潮涌入西藏，劣质庸俗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卡拉 OK、大哥大、电子游戏、酒吧发廊不一而足）去占领那一片净土，那就说不过去了。

汉人的自卑感有其历史原因，汉人的优越感却源于无知。中共政权对华夏本身文化传统的破坏是人尽皆知的。但是它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和启蒙知识的封锁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往往被忽略。中华文化里固有的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使得汉民族认为自己是文明的礼仪之邦，而所有其他民族都属蛮夷。碧眼紫须的西洋人若不是船坚炮利把中国人打怕了，国人还会继续把他们分成生番和熟番呢。西藏以前叫吐蕃，在中国人观念里就是个野蛮落后的地方。中共政权对西藏的占领和统治，不仅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需要，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意淫，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终于有自己的殖民地了！这样的心态无知又可怜。

西藏人被劳改，按理说同汉族人一样，也是没有足够的口粮、无穷无尽的劳动再加上各种拷打、刑罚。但西藏人还有其特

殊之处，即宗教信仰问题。西藏人拥有深厚的宗教情怀，碰到了不信神和藐视知识文化的共产党，就只能用血肉之躯来抗拒无情的枪炮，用内心的神佛来招架毛主义的洗脑。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阵，藏人的牺牲惨烈悲壮。像阿德这样普通的妇女，当她的家族、村庄、国家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时，她的精神似乎在瞬间得到升华，她的肉体也在自己纯净灵魂的带领下，变得超乎寻常的顽强，她的意志牢不可破。在劳改营中她所经历的酷刑和折磨超过了常人所能忍受的极限。阿德总受到同监难友的照顾，她也在任何时候都把难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豁出自己的性命去为大家争口粮。她也拒绝学汉语，宁可挨打受饿也不肯背诵毛语录。

这又是藏人和汉人的巨大差异。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互相告密、检举，拍上面马屁，只为自己捞一丝儿好处。在藏人的监狱中，大部分狱友都相互扶持照顾，出卖别人或被人出卖的情形相对来说少得多。这和宗教的潜移默化和民族性的纯朴有直接的关系。

阿妈阿德终于投奔到达赖喇嘛身边，圆了她一生的夙愿。今年七十多岁的阿德在达兰萨拉过着简陋却自由的生活，她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她从来没有忘记还在狱中的藏人囚犯，也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她那花原上的故乡。虽然汉人的大量移民和随之造成的环境和生态破坏令她心忧，但是她依然不改心怀慈爱、宽容的本性，以及坚定果敢的毅力，要用自己有生之年去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西藏奋斗。

这本书是一部藏人的悲情史诗，一个民族的圣经，也是每个汉人应当细读的史书。

执笔者前言

能诉诸笔端的故事很少有哪个能与你即将读到的这个故事相比。本书讲述了一位妇女面对巨大的压迫与折磨，依然坚守着人类的尊严、正直与慈爱。故事的主人公阿德达本仓，一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因抵抗中国入侵西藏，入狱 27 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西藏人民持续至今的悲惨命运。不幸的是，书中描述的情形尚未消失，阿德所提到的艰难

困苦在千百万依然生活在那块儿土地的藏人中仍屡见不鲜。

1988 年夏天，我初次听到了这个故事，是在朋友琼位于纽约上州¹的花园内。琼坐在台阶上，给我看她和藏人朋友在印度达兰萨拉²的照片。达兰萨拉——喜马拉雅村，1959 年至尊达赖喇嘛³从西藏逃出不久，这里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总部。就是在琼的花园，在一片玫瑰与萱草的花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勇敢的民族的遭遇——他们独立的国家被老谋深算的共产党侵占，他们艰苦卓绝地斗争，又被无情无义地出卖。

琼得了癌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到达兰萨拉，和自己热爱的人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日子。那个夏日，站在她的花园围墙边，与她分手道别时，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第二年冬天，她在印度去世。

¹ 纽约上州，泛指纽约州除纽约市及郊县外的所有地区——译注

² 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设有行政、文化、宗教等中央机构，以“小拉萨”闻名——译注

³ 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现已传十四世。此处指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译注

莅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达兰萨拉，一方面去拜会琼高度称赞的朋友，一方面尽我所能帮助西藏人民。访问期间，我有幸见到了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西，商讨了如何提供帮助的事宜。1990 年春天再次来到达兰萨拉时，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权官员阿旺扎玛加本给我介绍了阿德达本仓——我所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初次见面，阿德和我便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亲情和溢于言表的依恋，从此这种情感便与日俱增。现在阿德认我做养女，我也像熟悉她的藏人那样，叫她“阿妈”或“妈妈”，表达我的尊敬爱戴之情。第一次见面她就要求我抽时间写下她的故事，并要我特别留心她想讲的一些细节：不仅要描述她那被围困的家园所经历的累累伤痕，还要描述她被捕前对那个古老文化的珍贵记忆。她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充满感召力的力量和人格，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她的故事，从田园诗般的童年时光，到长期的监禁和折磨，直到最终获得自由。

最初的几次谈话是在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中心进行的。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阿妈阿德和我坐在床上，人权官员阿旺在一旁做翻译。她的故事一点点展开，我感到十分震惊。谈到青年时代，阿妈阿德闭上双眼，满脸欢笑，俨然成了天真烂漫的孩子。相反，谈到那些难以置信的苦难经历，她几乎毫无表情。每当她平静地讲起那让人不寒而栗的磨难时，比如，她让我看那只因指甲缝钉了竹签而致残的手指，我总竭力想做出同样的神情。阿妈阿德在谈话中，从头至尾，只是在回忆到他人的悲惨经历时，才流过眼泪，其中有很多她的家人、朋友、以及一些陌生人。阿妈亲眼目睹了他们遭受的酷刑和骇人的惨死。

阿妈阿德的遭遇可谓怵目惊心，而她讲述起来却平实无华，

不动声色，这种口吻有时几乎令人不安。然而，读者应该理解，这种口吻恰恰反映了藏语和藏族文化。外国人总是觉得藏人习惯用夸张的、富于悲剧色彩的词汇描述自己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沉浸在个人的不幸之中，免不了有自我为中心之嫌——这也许源于藏人广泛信奉的佛教中令人不快的一面。阿妈阿德那非比寻常的坦率口吻体现了她的无私情怀，很可能就是这种情怀使她有幸捱过了书中记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磨难。

像多数藏人一样，阿妈阿德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叙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只要可能，我就尽量保留她原本的叙述风格，采用她所用的词语。全书出现的藏文与中文术语、专名、以及地名均按照阿妈阿德的康区方言音译。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使某些西藏专家不满意，我希望这样可以将阿妈阿德在达兰萨拉讲给我的故事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藏语与汉语术语第一次出现时均以斜体标出⁴，读者可以参照词汇表⁵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及专业解释。书末还有一个附录，综述了发生在藏东，贯穿阿妈阿德一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可能会有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历史背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该附录及参考书目⁶。

本书得以成书，得益于众多人的鼎力支持。首先，我要感谢许多人和我分享他们的家史：阿妈阿德的丈夫仁青桑珠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任洛珠嘉日和父亲——梁茹⁷土司嘉日尼玛，就嘉日仓和希瓦仓两个家族，以及汉人统治下的梁茹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背景

⁴ 汉语译文未保留这一点——译注

⁵ 汉语版略去了该词汇表，新增了《英汉西藏专名对照表》——译注

⁶ 参考书目未译出——译注

⁷ 梁茹，今名新龙，现属四川甘孜州——译注

知识。希瓦仓家族的贡嘎坚赞先生及儿子其美扎西，提供了有关甘孜的信息。有关 1959 年起义的记载，我还要感谢朱古玛达本仓所收集的资料和洛桑丹巴的书面证词。新闻和国际事务部的丹增阿底峡陪阿德一起参加了 1989 年在丹麦举行的国际听证会，为我提供了阿德此行的许多有益信息。

在参考书方面，我要感激至尊达赖喇嘛，从他的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的详细描述中，我获得了大量有关他生平的资料。有关共产党侵占之前，西藏东部局势的更多具体细节，我参考了埃里克·泰克曼的《英国领事藏东游记》、休·理查森的《西藏及其历史》。江央诺布的《西藏战士》帮助我证实了一些发生在梁茹的事件及共产党在康区东部的政策。第十章提到的祷文摘自益西宗志⁸的《甘露精滴》，是对十三世纪伟大的佛教大师宗喀巴⁹的《菩提道次第论》的精辟的诗体阐释（经西藏文献与档案馆的许可）。第十五章所描述的波恩听证会是在听证会会议记录的基础上写成。

还有很多人，在我研究与准备本书手稿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深表谢意。感谢达兰萨拉噶夏（内阁）政治事务委员会的索南多杰，他是除阿德本人，给我鼓舞鼓励最多的人。感谢丹增戴童对我的鼓励，他坚信完成此书非常重要。还要特别感谢目前在日内瓦西藏办事处工作的阿旺扎玛加本，他促成了此书的写作，并为阿德和我作翻译。感谢所有为我和阿德的交流提供帮助的，我不知道姓名的朋友。达兰萨拉西藏文献与档案馆的藏学专家扎西次仁提供了许多关于西藏文化的有益建议，并

⁸ 益西宗志，格鲁派活佛，所著《甘露精滴》流传甚广——译注

⁹ 宗喀巴（1357-1419），法名罗桑札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佛教理论家——译注

核对了文字的准确性。西藏历史独立研究员艾德里安·摩恩给我介绍了十分有价值的原始材料。贝玛南嘉的儿子热心地翻译了许多珍贵、实用的文献。美国之音的西藏历史学家才丹旺修，在中文资料翻译上提供了极大帮助，并澄清了某些事件的时间与表述。他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阿沛晋美帮我核对了中文资料的翻译，书中任何遗留错误都是我个人的疏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斯伯林给我们介绍了资料。西藏伦敦办事处的才丹桑珠热情地帮我查找材料。西藏史学家沃伦·史密斯也给予了十分珍贵的帮助。感谢麦格·兰德斯特拉姆和加里·德夫曼校阅最初的几版手稿。感谢罗宾·拜姆、萨拉·施内德曼以及智慧出版社的全体人员，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就不可能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还要感谢艾伦·布雷克斯里的所有帮助与耐心。

阿妈阿德和我希望此书代表一种支持西藏人民的声音，让世界人记住那许许多多未能幸免于难的人们，记住那因中国入侵仍饱受威胁的人们。

阿妈阿德的一生是悲惨的，但她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折磨后，仍然见识非凡、坚强勇敢。这一切使她成了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之一——他们不会对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不会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教义。对于藏人，阿德是勇气与决心的象征。对于我，阿德是正义战士，面对着极大的不平等，大无畏地捍卫本民族的文化、宗教和精神自由。

乔伊·布雷克斯莉

纽约 奥尼昂塔

1997年6月

说在前头

穿越漫漫时空，我抛下天真烂漫，充满幻想的童年，离开度过青春岁月的国度，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的一切我的许多西藏同胞做梦都想不到。

踏上这条背井离乡的程途也是无奈的选择。还好，我活了下来，可以来见证我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同胞、家人和朋友们的呐喊。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已经随风而逝，有人处心积虑地要摧毁我熟知和深爱的人们的记忆，他们重写了西藏的历史，在那个精心编结的历史网络里，我感到厌倦、感到茫然，甚至忘记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实现我的诺言，见证西藏的历史，成了我余生唯一的生活目标。

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做了长期的、仔细的准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由我来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我深知向世人讲明真相的目的。尽管这个世界大得连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但是世界再大，地球上的居民也不会彼此没有任何关联。天下的事情以因果链的方式传播，迟早会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最后形成一个循环。我所说的不仅是活在我心中的往昔的记忆，还有投入水中的石块的激起的水波，越来越远地散开去，直到拍打着岸边。

现在我获得了自由。门口没有警察看守，再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但是，一个流浪异乡的人决不会忘记被切断的根，珍贵的记忆的碎片总会珍藏在心底。我最大的渴望是回到生养我的土地。这个愿望很难实现，除非西藏再次回到西藏人的手里。现

在，中国政府把我视为歹徒，因为我决不低下自己的头颅，决不要忘记很多同胞们都曾经经历的饱受奴役的岁月。

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困难岁月之前的那些日子……透过我在达兰萨拉的住处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黄昏的月光燃亮的山峰。那景色虽然十分迷人，却让我想到了另外一座大山，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就是在那座大山下开始的。

我在自由和幸福中长大。现在这些记忆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属于一个遥远的地方。每天我从我的屋子里穿过，心里总会泛起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影子——他们的尸骨已经和故国的国土融为一体，在异国人的践踏下呻吟。

1987年，我离开故国的日子到来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让官员们相信我不久就会回来，而且不会跟任何人讲起我的生活经历，不管是侵略者对生命的摧残或是对文化的破坏——许许多多的人在酷刑、饥饿和奴隶般的超强度劳动的摧残下死于非命；许许多多的寺院被毁坏，寺院里古老的珍宝被玷污，有的因为含金而被盗走；成千上万的僧尼和喇嘛死在劳改营里；我自己的家人有一多半都成了侵略者占领西藏的直接牺牲品。

我准备离家远行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死在他乡可不好。一个人的尸骨该埋在他出生的土地。”对这样的说法，我心里并不反对，而且和我的同胞一起生活在难民营里也让我感到伤心。但是，文化的灵魂活在它的人民之中。只要人民愿意保留这种文化，而且有自由继承这种传统，文化就可以承传下来。正是因为离乡流亡，我才获得了自由，可以不怕恐惧地讲述我人生的悲喜。我必须在流亡中度日，直到有一天我的国家获得自由。

我的心底深处总珍藏着对故乡的记忆，那是西藏东部的一块地方，叫做康区。多少年来，故乡的文化和那里的人民遭受了可

怕的苦难和摧残，但是却常常有人以“进步”为借口，对这种代价置若罔闻。我希望通过我讲述的经历，人们不再会轻易犯这种错误。

第一部

苦难降临前的岁月

第一章 花原上的童年时光

时值今日，每每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童年的时光：一望无际的广阔天空下是开满鲜花的原野，我们就在这原野上欢笑、旋转、滚打。在花丛里玩耍，是夏天里消磨时光的最好的方法。我和同伴们脱下靴子，相互追逐。然后，停下来看看脚趾间是不是夹着某一种花儿，如果有，就必须再去开着这种花儿的草地上奔跑。我们喜欢在山坡上打滚，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泥土和野花的芬芳。我们仔细观察着各种花儿的形状和颜色：它们显得那么柔弱，但是却拥有它们脚下的土地。夏天，草地上有那么多不同色彩的花儿在开放，要把它们全都认出来可不是件容易事。其实，我们那里有一个别称叫做“麦脱格郁尔”，意思就是“开满鲜花的土地”。

我们那个地区的康区藏民大都靠游牧或半游牧半耕作为生。一到夏天，我们家和大多数人家一样，把牛羊赶到山上放牧。一到这时，村里人和四邻八乡的亲戚就把家当收拾好，让牦牛、骡子驮上，到山区牧场放牧。我们在卡瓦拉里山上的草场和高山草甸扎下营帐，从六月底一直待到十月份。

有时我们这些孩子会向父母要些锅碗、茶叶和吃的，带到玩耍的地方自个儿做饭。先是拣柴生火，然后烧茶。看到水在锅里咕嘟嘟地翻，我们觉得像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儿时与伙伴在草地上分东西吃的情形我一直念念不忘，味道要比坐在家里和父母长辈们一起吃香了许多。

我和伙伴们常谈论从父母那儿偷听来的事，回忆和家人一起

去朝圣的经历，你一言我一语地描述见到的各地风光。姐姐们的衣服、珠宝也是我们爱聊的话题，大家都急切地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带上金银珠宝首饰。父母唤我们吃饭了，我们也假装没听见，一个劲儿地玩耍、嬉戏，分享着彼此的梦想。

我父亲常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一边聊着各种各样的趣事，一边喝青稞酒，我们那儿的人常喝这种麦酒。傍晚，玩累了我喜欢坐在父亲脚边。他常常朝着卡瓦拉里山峰的方向深深地凝望，光是看一眼这些山峰，他就会激情澎湃，举起酒杯即兴唱起歌来：

幼狮诞生在冰山雪峰，
大山啊，请呵护这属于你的生命。
愿永恒的雪永远覆盖这洁白的高山，
愿雪狮子快快长大，鬃毛扬起雄风。

我总在一旁听着，求父亲多唱几遍。父亲告诉我，卡瓦拉里山意思是“永恒的雪”，是住在山里的一位伟大的喜马拉雅神的名字，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他的领地。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已经和那些皑皑雪峰交织在一起了。他教我像他一样爱雪山——山峰随着变幻莫测的阳光闪射着熠熠的光芒，入夜又在月光下投射出剪影；冬天傲立在清新、冰冷的寒风之中，春秋季节又笼罩在翻飞的雾霭里。

当地的游牧部落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管他们叫“卓格巴”。卓格巴人生活俭朴，吃苦耐劳，对外人心存戒备，而一旦得到他们的信任就对你肝胆相照。牧民都不愿受约束，宁愿住在广阔的草原上也不愿被束缚在城镇里。即使是在最严酷的天气

里，他们住在牦牛毛织成的大帐房里也觉得很舒服。隔一段时间牧民们就卷起结实的帐篷，赶着牛羊到新的草场。他们的食物几乎全靠放牧的牛羊，从不种地，也从不懂得吃蔬菜的好处。在他们看来，种“这些草”给人吃简直是瞎浪费时间，丢下广阔草原上悠闲自得的生活，去种些牦牛才会吃的东西实在是可笑。

牧民们轻易不下山，除非是有买卖要做、有畜产品税要付，或是要出山去朝圣。这些部落有他们自己的世袭首领，还有自己部落的法规。虽然他们的方言和我们的有点不同，我们还是能明白彼此的意思。

夏天我们待在牧区，像牧民们一样住在舒适的牦牛绒帐房里。那是段平静的日子，除了管好牧群以外没有多少事可作，整日享受着家人、朋友的陪伴。夏天，满山都是牛、马、绵羊，那些游牧部落还养着山羊。我家有 25 匹马，150 头牛，数量在康区算是一般。我家主要是养母牦牛，可以挤奶，做出上等的酥油，不管是用来做饭还是用来点灯都是一流地棒。酥油在藏文化中十分重要，是寺庙供奉的祭品，可以拿来做交易，甚至用来交税。

到了十月底，就该收起帐篷回到山谷去了。我和伙伴们最后一次坐在干枯的野花丛里，望着广袤无垠的草原。这一分手，有的伙伴要等到来年夏天才能再见到，所以离别时心里不好受。不过我们相约待到大雪溶化的时候，一定能再相见。



冬天，一家人挤在厨房里享受着火炉里温暖的火光，感受着彼此带来的安全感，任凭狂风刮得天昏地暗，绕着我们的房子打着唿哨嗥叫。夜幕降临，周遭一片寂静，这时可以听到远处的狼

豪。冬天的几个月里，我们一日三餐都聚在一起吃。饭前我们总向度母¹⁰祈祷，那是一个女菩萨，也叫塔拉，是我们的保护神。

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铺着毯子的低矮的床上，床与床之间放着低低的桌子。父母坐在桌子的首位，孩子们按照年龄大小排开。仆人和我们一起吃，碰巧有过客临门，我们也请他们和我们一起享用。在我们的村子里，远游者总是很受欢迎。我们那里没有报纸，从外地来的远游者就成了宝贵的信息来源，还带给我们难得的欢乐。一有客来，当家的人就会出门迎接，给他们的马喂上干草，再请他们进屋。一进屋，马上给端来青稞酒或是茶，一边询问他们这次出门是干什么的，走了多远的路。吃了晚饭，家人、仆人和客人坐在一起，一边聊天，听着逸闻趣事，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我们藏人必不可少的饮品——酥油茶。

每逢这样的时刻，长辈们也爱讲起他们年轻时的经历，把他们那个时代西藏的面貌描述给我们。尽管我们没有上学，靠这种口耳相传的方法，我们也了解了我们那里的历史和宗教传统。有时，父母和兄长谈到满洲和国民党侵占西藏时藏人遭遇的种种艰难；有时，他们回忆起我家住在梁茹时家族间的恩仇和那些争斗造成的悲剧。

我们也听到关于圣城拉萨的故事。拉萨位于西藏中部叫做卫藏¹¹的地区，是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地方。达赖喇嘛住在布达拉宫里，“高高的天宇之宫”，有一千间房屋，一万座圣坛，坐落在高耸在城市之上的山坡上。他们说，拉萨是整个西藏最重要的朝圣地，有三大最有名的寺院，还有大昭寺，藏有佛祖释迦牟尼

¹⁰ 度母，梵名塔拉（Tara），藏名卓玛（Drolma）。佛教所崇奉的普渡众生的女菩萨，在藏传佛教的噶登派中，度母是与释迦牟尼、观世音、不动明王并列的本尊。——译注

¹¹ 卫藏，西藏中西部地区——译注

的圣像，许多奇迹都发生在那里。一生中至少去拉萨朝圣一次，是每个人心底的梦想。在傍晚的火光里，听着父辈描述那美妙的情景，我们心里充满了期望，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踏上人生中最伟大的朝圣之旅。

哥哥们总爱谈论他们最喜欢的话题：买卖、政治、马匹等等。藏东康区的居民我们称为康巴人，自小就学习骑马，而且个个都是好骑手。我父亲和哥哥们都自认为是识马的内行高手。有时候，他们会提到自己看到的一匹好马，一心想买下，花多少钱都不吝惜。妇女们感到这些男人爱马匹胜过了爱妻子，提起这事儿总是愤愤不平。

男人们有时会讲起他们去那些贸易中心的奇异旅程。一个地方是安多，和康区北部相邻的另一个藏区；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去得更多，叫打箭炉¹²，是个重要的贸易城市，在我们家乡以东，邻近藏区和传统的中国边境的交界处。哥哥们去打箭炉做买卖，看到街上走动着的从拉萨远道而来的喇嘛和商贩。长长的牦牛商队，带着羊毛、珍贵的麝皮、矿物和藏药从藏区赶来做买卖，驻扎在当地宽敞的客栈里。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们到打箭炉买茶叶、丝绸、针线、火柴和别的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关于美国这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好奇。

中国人在打箭炉的所作所为总让我父亲和哥哥们很感兴趣。我们居住的地方离藏汉边境不远，康区的头人对邻近的汉人的活动总是很关注。康区和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接壤，一连二百多年两边就西藏最东边的领土归属发生过不少争执。

打箭炉曾经是西藏的加拉省¹³的省府所在地。十九世纪晚

¹² 打箭炉：今名康定，现属四川甘孜州——译注。

¹³ 加拉省，辖今甘孜、阿坝州等地——译注

期，这个位于边区的省份坚决和中国结盟，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地区。1905 年，察拉王成为被免职的第一批西藏官员之一。几年之后，中国政府烧毁了他的王宫，还砍了他兄弟的头。他和那些新的统治者的关系总是很不稳固，最后在哀伤中抑郁而死。

这位地方首领被清除后，打箭炉曾经有过一阵混乱，混乱结束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城市再次恢复了作为商贸中心的功能。满清王朝垮台后，这一地区落入了无恶不作的军阀手里，最后被军阀刘文辉牢牢控制起来。那些军阀并不从省府领取分文报酬，为了发放军饷，他们垄断了茶、金、鸦片等物品的专卖权。

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听话，有时候家里的大人就拿中国人来吓唬我们。说：“再不规矩，刘文辉的兵就来把你抓走。”我认识的那些孩子，没有一个不怕的。因此，每当大人们晚上的谈话转到中国的话题上，我就感到又是好奇，又是害怕，一心盼着这个话题赶紧转到我更熟悉的别的话题上去。

大约 12 岁那年，早春的一天，我那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突然变成了现实。我和哥哥坐在房前摘菜，我起身伸个懒腰，四下看看，突然看到远处走来一队当兵的，我吓了一跳。我妈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近，低声说：“是 *Gya mi*（中国人）。”他们是川军的士兵，个个都穿着咔叽军服，排成一字长蛇阵，迈着大步，沿着离我家不远的大路走来。一看到这奇怪的景象，我就躲在妈妈的身后，从她的裙子后面朝前看，这才感觉安全些。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以整齐生硬的军人步伐行进。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看到这么多中国兵穿过我们的城镇行进。然而，六年之后，这些中国兵又来了，不过不是同一支军队，军容风纪也不一样。

第二章 离开梁茹

我家姓达本仓¹⁴，意思是“马倌儿”。多少世代以来，我家一直是当地有名的养马户，我们那里土地未经开垦，马是十分珍贵的牲口。我爷爷曾经在西藏军队服役，他的任务就是养马，供给梁茹地方政府的军队使用。我出生前的几百年间，梁茹曾经有过自由，和西藏有联盟关系，也有几个时期受中国管辖。

我们生活的地方在纳格托的北部，头人是嘉日仓家族，是当地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家族的首领人物是嘉日多杰南嘉，那时，我父亲多杰拉普丹是他最信任的副官。父亲先前是个士兵，后来升到副官，还负责家族里“垂朋”的事务，垂朋相当于“律师”，谁家吵了架，就请垂朋来，了解各方的情况，调查争执的原因，并向首领进行汇报。

据传，梁茹的居民是藏王赤松德赞¹⁵派来戍守边塞的士兵们的后裔。八世纪，西藏的军力十分强盛，藏王的军队遍布西藏，甚至还出兵中亚，征服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大帝国之后，他又设法在国内推行佛教。因此，可以说是藏王本人种下了西藏军力衰退的种子。

虽说梁茹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恪守教规，但是他们的祖上的战斗精神和士兵的荣誉感却流传下来。也许，我们民族最大的弱点就是根深蒂固的高傲，不过在某些方面，这种高傲也帮助我们生存下来。在边界争执不决的西藏边疆地区，这种高傲使我们团

¹⁴ 仓，藏语中代表姓、氏——译注

¹⁵ 赤松德赞，八世纪中叶藏王，吐蕃王朝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法王，在位期间积极扶持佛教——译注

结起来，度过艰苦的岁月。然而，它也使我们的更加脆弱——如果荣誉问题引发争执，就会引发长期的仇怨，造成家族和部落的分裂。梁茹的寺院里的喇嘛一直在提醒人们别忘了佛的教诲或佛法，因为那是决定我们生存的律法。喇嘛们经常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即使那些最固执的人也不得不对喇嘛表示敬意——至少暂时是这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嘉日仓家断了子嗣，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招个上门女婿，改姓妻子家的姓氏，来承传这家的香火。嘉日仓家的问题最后通过跟希瓦仓家联姻得到解决。希瓦仓家住在甘孜，位于梁茹以北。江央桑白希瓦仓是康区东部最有权势，最受人尊敬的土司。梁茹大大小小的土司都想跟他家扯上点亲戚。他家的儿子旺修多杰答应娶嘉日仓家的两个女儿为妻，搬到纳格托来住。两家就这样联合在一起，两家的老小也在甘孜和梁茹之间来回走动。

不巧的是，嘉日仓家族某些成员之间渐渐产生了一些龃龉，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不算太出人意料。有的人感觉家里住进一个外人，还带着一帮使唤人，而且还是从甘孜的大户人家来的，这样一来嘉日仓家的利益就会受到破坏，还会给这个家族在梁茹的地位造成不稳定。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就讨厌看见这位上门女婿，这样嘉日仓家族就分裂成了两派。两派的争斗愈演愈烈，我父亲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搞得十分灰心。为了这个家族的名誉，嘉里多杰南嘉在这场纷争中义无反顾地要保护自己的女婿，结果嘉里家和施瓦家就结起了怨气。我父亲是嘉里多杰最忠实可信的仆人，于是协助旺修多杰的重任交到了他手里。我父亲也因此一直认为跟施瓦家和他们在嘉里家的支持者并肩战斗是自己的职责。

有一次，我的哥哥珠古玛，那时还不到十八岁，加入了甘孜的支持者的人群。争斗中，他杀死了当地一位有名的射手。这件事虽然给他赢得了一些荣誉，但按照当地的规矩，我们家必须给死者的家庭以金钱或物质赔偿。赔付的价码很高，我们的家的经济状况大受打击。事后不久，家里又失了火，仅存的家产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这件事让我父亲十分伤心，也完全改变了他通过暴力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珠古玛也接受了教训，决心要平平安安地生活。等到这场争斗最后平复下来，各方死了五十四人，许多朋友也因为争斗中所持的立场不同结下梁子，一连好多年都没能修复。

我生于 1932 年，就是这场争斗结束五年之后。我母亲名叫索南卓玛，生我那年四十九岁。她常常回忆说怀我的时候有多难堪，因为他俩都那么大年纪了又要生孩子，左邻右舍都很好奇。那年头，我家经历了很多艰难之后，日子又过得红火起来，一家人很幸福，也很满足。出于这个原因，父亲决定给我取名阿德：藏人把字母 a 看作吉祥字符，他们认为别的音素全是从 a 衍生而来的。西藏人的许多祷词和咒语都含有这个音，比如“嗡嘛呢叭咪哄”（OM MANI PADME HUM）就是从这个音开始的。（在藏语里，om 这个音节是在词根音 a 上加了元音 *naro*，即“o”。）在梁茹地区，人们常常给孩子取个两个音节的小名，第一个音节以 a 音开始。不过，我父亲没有这样做，“阿德”这个名字既作小名又作正名。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家搬到了甘孜附近。我们住的那个村庄

叫洛巴夏，从村里骑马向东走，只消走四个小时就可以到甘孜城中心。虽说藏人的城市都不很大，和康区别的地方比起来，甘孜被看作一个很有名也很平静的去处。人们这样想也许是因为甘孜有三十一座寺院。再有就是圣山卡瓦拉里雪山离城不远，连甘孜这个名字都跟这座圣山有关，“甘孜”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白美人”。

我家住的是一座四方形的两层楼房，厚厚的墙是用石头和灰泥砌的。村里其它人家的房子相距都不太远。想跟伙伴们玩儿的时候，我只用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喊他们一声儿，他们就听得见。不管谁家，我们都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出。

从村子朝西北走不远就是卡囊寺，寺里住着 450 名僧人和喇嘛。村里的人不管谁在精神上需要引导，总是去找他们帮助。重要的宗教节日，他们就替村里的人家祈祷、献祭。每家人都有一位喇嘛经常联系，大多数人家都有一座小佛堂，日常佛事需要，那位喇嘛就会来帮助。

村子里还有一个小市场，村民在那里交换盐、酥油和干酪之类的物品。市场上还有些珠宝、铜炊具。不过，当地最大的市场在甘孜，在那里想买啥都能买到：从棉花、羊毛到各类漂亮丝绸等各类织品，美观的马鞍和马具，杏脯之类的进口食品，农具，居家用品，还有枪支弹药等。

一条名叫扎曲的大河¹⁶从我们的村子洛巴夏旁边流过，然后拐了一个弯朝南流向梁茹，再一路流向遥远的地方。我家离河边很近，我常常坐在河边看着河里旭日或夕阳的倒影。村子远处高高耸立的是卡瓦拉里山，有三座高高的山峰。每当晨光初露或是夕阳西下时分，那些山峰仿佛在光焰里颤动，显出了勃勃生机。

¹⁶ 扎曲河，雅砻江流经甘孜的一段——译注

过不了多久，那颤动的紫霭变成了浓浓淡淡的各种色彩，那么透明、精致。山里还有四座小湖，东南西北各有一座。静卧在茂密的森林里，林间栖息着雪豹、熊以及其它小动物和鸟类。

人们说康区的森林是我们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不管是谁都不许随随便便地滥用这里的土地。林子里的树木需要盖房子才能砍伐。除此之外，一草一木都没有人去破坏。我们把森林看作“大山的珠宝”，各色各样的漂亮野生动物看作是林间的居民。尽管大多数人都很守规矩尽量不去猎杀动物，也有一些例外情况。特别是那些游牧部族，他们猎杀某些动物，比如雄鹿和麝香鹿，是为了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人到了一定年龄总要经历一些生命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变化，比如——年老、财富、不幸、疾病、死亡等，但是在藏人中间有两件事情是恒久不变的：一是佛法，一是使自己不断进步的与生俱来的智慧。我们藏人敬畏天神，把大地看成是生命精华的体现。山神在我们眼里就像大山一样不可撼动。西藏寺院那些古老的石头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坚固依旧，我们决不相信它们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轰然崩塌。同样道理，我们决从不相信会有某种力量能彻底改变我们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家庭和传统

佛堂是个特别的地方。只有家庭喇嘛举行特殊佛事时我们才聚到这儿。通常只是进去安安静静地祷告一会儿就离开了。房间很干净，铺着精致的木地板。中心是带有台阶的圣坛，摆着佛像及藏族神像：渐列喜¹⁷，代表大悲，为西藏的保护神，也称观音菩萨；妙吉祥，代表大智，又称曼殊室利（文殊菩萨）¹⁸；莲花生¹⁹，是“法轮掌控者”；绿度母²⁰，是慈悲神母，或称卓玛。神像下方，摆着鲜花和七只盛满清水的罄。所有的人家，无论贫富，都供得起这种供品；提醒人们真正的精神信仰与财富无关。

稍大些，我喜欢坐在佛堂里，伴着微弱的、摇曳的酥油灯，合着香气，享受那份静谧与纯朴的气氛。这是我最平静的时刻，虽然我平时总爱热闹，一踏进佛堂，整个人一下子就自然而然地静下来了。

十一岁那年，父亲给我讲我学习佛祖教义是很重要的。他说佛教早在七世纪就传到西藏，宗教是西藏社会的中心，还向我解释因果报应，教我应该始终不渝地善待别人，这样无论做什么都会有积极的回报。对别人心存不轨，迟早会遭报应。父亲强调对待众生要始终以真心诚意，善念为本。告诉我为什么不要说谎，

¹⁷ 渐列喜，是藏密大悲观音的主尊，代表大悲、大智、大力——译注

¹⁸ 妙吉祥，又称妙音菩萨，梵文 Manjusri 有曼妙之意。据传说他出生时家中出现许多吉瑞祥兆，故名——译注

¹⁹ 莲花生，又称莲花生大士。印度僧人，8 世纪后半期把佛教密宗传入西藏，是红教创始开山祖师——译注

²⁰ 绿度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大慈大悲。据说供奉她能解脱八种苦难，故又称救八难度母——译注

骗人，谋杀，那些只会招致不幸。如果处处行善、事事重德，就会心如止水，远离纷扰。

父亲给我讲了佛祖悉达多王子²¹的故事，他长在王宫之内，食有膏脂，衣有轻软。尽管上有父辈呵护，下有宫人照料，但结婚生子之后，他看到人世间的死亡和衰老，明白了人最终都难逃此劫，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地为众生寻求超度的道路。佛教强调“八正道”²²的重要性，正是他多年苦心修行的结果。

进佛堂时，父亲总是“磕长头”，这是一种虔诚的磕拜方式，信徒一边诵经，一边五体投地，然后起身立正，如此循环往复。父亲很虔诚，那一幕一直留在我心中，引起了儿时的我对生命的精神本质的第一丝兴趣。

父亲教我绿度母经，非常长，我一天只学两三行。度母全身绿色，有着广大的慈悲心，就像无远弗届的风一样，在佛经里，风也被描述成绿色的。父亲说修持此法，能消除一切魔障、病患。度母是位菩萨（下凡救助他人的仙人），孜孜不倦地以慈爱的母亲之身修习，直到将众生从轮回（无休无止的循环苦难）中解救出来。我还学了“三宝”²³咒、莲花生咒和西藏护佑神渐列喜的六字真言经“嗡嘛呢叭咪吽”²⁴。

父亲告诉我，西藏的最高领导者达赖喇嘛是大慈大悲观世音

²¹ 乔达摩·悉达多，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尊称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译注

²² 八正道，指修炼的佛教徒达到最高理想境地涅槃的八种方法和途径。包括：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译注

²³ 三宝，即佛宝、法宝和僧宝，是佛教的最基本信仰和教义，即佛教的核心和基础——译注

²⁴ 六字真言经，即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为祈愿宝珠莲上之义。是佛教徒，特别是藏传佛教徒口头经常念诵之咒文——译注

菩萨的化身。1391年，观世音菩萨初次化身，立誓要保护和提高众生灵魂境界。之后又化身为达赖喇嘛引领西藏人民²⁵。参见达赖喇嘛，不辜负他的教导，是每一个西藏人最重要，最迫切盼望的事。达赖喇嘛是完美的精神自由的象征，完美无缺地体现着佛教教义的力量。在西藏人眼里，他是凡间的圣人。

1933年，我出生后一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作为一位政治领导，土登嘉措觉得有必要对西藏的许多法律实施改革，来平衡贵族与平民间的平等权利。他审查、修改了寺院和贵族的特权，努力赋予寺院新的精神，强调每一种教派的价值和独特性。他的圆寂是整个国家的巨大损失，举国上下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哀悼。当然，我不太记得那些悲伤的日子，但很小的时候，就听家人说起我们的达赖喇嘛。

哀悼期间，由摄政王活佛热振仁波切接管拉萨的行政权。1936年，寻访小组找到了新的转世灵童，定为西藏下一任的精神领袖及临时领导。灵童是寻访小组在娜姆拉措湖²⁶通过湖光倒影中显示的一些神秘的景象，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其他迹象认定的。

1939年，新的转世灵童乘大篷车从出生地安多到达拉萨，第二年举行了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整个西藏都在庆贺我们的精神领袖和佑护者的到来。我常常想起这位比我还小的灵童，他住在圣城，既是我特殊的朋友又是我的佑护者。我为他的平安祈祷，期待某天能有幸见到他。

²⁵ 此为达赖喇嘛制度之始。一世达赖喇嘛为根敦珠巴——译注

²⁶ 娜姆拉措湖，为藏传佛教重要的圣湖，在山南地区。达赖、班禅等活佛圆寂后，为寻找转世灵童，要去该湖察看倒影，以判断灵童出生的时间、地点等——译注



家人经常带我去朝圣，离我家不远的卡囊寺我们去了无数次，接受住持仁波切（高级喇嘛）的赐福。家中有谁身体不舒服都来寺院治疗，我们和很多僧人和喇嘛都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家人一大早起来，一起爬上山道，非常开心。到了寺院大门，叩三次长头，再走进寺院。父亲牵着我的手，观赏着巨型佛像和神像，古老的唐卡²⁷（宗教绘画）挂在墙上，在许许多多酥油灯的柔光映衬下，每件物品都蒙上一层薄薄的光，烟雾缭绕中的浓重气息和香火的淡淡芬芳交织在一起。时不时会传来僧人们的诵经声，伴随着法号、手鼓的回响，偶尔还夹杂着法铙的敲击和法螺的低沉共鸣。照着父亲教的那样，我祈祷众生的幸福、繁荣。接着走到巨大的黄铜转经筒旁，父亲告诉我，筒里装着成千的记在纸片上的经文和颂词，双手转动经筒，我们就把这些祈祷送上了天国。

卡囊寺一位名叫卡囊库朔的喇嘛和我家的关系很好。我记得他好像始终都是我们家生活的一部分，总是对我特别注意。我刚记事儿，他已经二十多了，总感觉他那么优雅、神圣。我有个头痛脑热的，就让父母拿一些家中保存的，卡囊库朔赐过福的水给我喝。他经常来我们家参加奉献仪式。不等他来，家人已经把炉香、净水、鲜花准备好了。卡囊库朔在佛堂里祈祷，给聚在那儿的家人传授佛经。我记得有一次参加接纳仪式，他用一尊非常神圣的观音菩萨雕像为我们摩顶赐福。轮到这儿，他有意逗我，敲得稍稍重了点儿。我没抬头，只是抬起眼睛望着他的眼睛，尽

²⁷ 唐卡，藏式卷轴画。有的以丝绢绸缎为材料，用刺绣、编织、拼贴或套版印刷等方式制成，有的用颜料在画布上绘制而成——译注

力不退缩，也不作任何反应。

我家的另一位重要喇嘛是活佛乔白嘉措，父亲、哥哥珠古玛把他奉为“根本上师”，即首要的精神导师。他是第十三世达赖的宗教导师——索南嘉波喇嘛的儿子，在梁茹倍受尊敬。他是宁玛派的喇嘛，人们只要有解不开的难题，都去向他请教。家中有人去世了，要请他为离魂做祈祷；需要占卜，也要去请他。经常听父亲和珠古玛提到乔白嘉措，但是我年轻时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很小的时候，家人要去格桑寺院朝圣，他在那儿做住持，我就有了机会第一次聆听他讲法。

沿着扎曲河边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走了三天上下就到了寺院。寺院附近有座圣山，名叫霍洛卓格山²⁸，信徒要围着圣山沿着转经道走上三圈。这种仪式称为转山；转山时要始终使圣山或神庙位于右方。虔心转经，会使修习者的精神得以纯洁、升华。

我很小，觉得转山实在太累，最后不再走了。父亲很耐心地坐在我旁边说：“阿德，我打算在石头上作一个记号，这是你的记号。虽然很难，每转一圈，你会赢得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记号。”就这样，他说服我继续转山。我太小了，记不得家人和乔白嘉措喇嘛都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冲我笑。

第二次见乔白嘉措是在十几岁时，他来甘孜做公开谒见。人山人海，根本没有机会和他当面说话。几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情形却大相径庭。



²⁸ 霍洛卓格山，在今炉霍县境内——译注

作为西藏一时的风俗，父亲有两位妻子，博琼玛和索南卓玛。我母亲索南卓玛是第二位妻子。虽然两位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她们却十分融洽，邻居、亲戚们都认为他们比姐妹还亲。彼此照顾对方的孩子，没有任何隔阂。我经常和博琼玛一起睡，事实上有好多年我都认为她是我的亲妈。

我在家中排行最末，虽有些调皮，让人劳神，每个人都很疼我，尤其是父亲和大哥珠古玛。我和其他哥哥、姐姐的关系也很近，与卓玛拉吉和布姆最好。卓玛拉吉是我大姐，乳名叫色拉玛，意思是“黄毛儿”，因为她的头发颜色很浅。我经常去找她，从洛巴夏到她家，骑马一天就到了。色拉玛有好几个孩子，个个争着要东西。她倒茶非常快，迅速地把茶碗送到每个孩子手中，我最爱在这时逗她，假装叫着纠缠她来照顾我，或模仿她风风火火的样子，学她叹气。因为她很忙，喝茶很快，我学她的样子逗她，喝完一碗再要一碗。色拉玛笑着训斥我：“别笑我，总有一天你也会有孩子的，那时就想起姐姐了。”不管我什么时候去，色拉玛都很高兴，笑眯眯地欢迎我来：“啊，阿德，快进来。”色拉玛和她的丈夫普尔巴都比我大好多，我一直把他当和蔼可亲的叔叔看待。夏天，他们一家和我们一起到山上游牧，直到秋天来临。

哥哥珠古玛是我最喜爱的人，全家人只有他能把我从小伙伴儿那儿分开。他比我大二十四岁，成家了，有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和我们住在一起，随着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他分担了越来越多父亲的职责，照料牲畜，料理农田，闲暇时为我们缝补靴子，缝制朱巴（男女均适用的藏族传统服装）。虽然他有自己的家，我们之间有特殊的兄妹感情，在很多方面很相像。哥哥对我非常耐心，虽然总爱逗我，我却非常喜欢跟他在一起。

到了学骑马的年龄，哥哥就开始教我。虽然他没有教我太多男子间流行的骑马技巧，在他的精心教导下，我在一次比赛中脱颖而出，被认为是家中的优秀骑手之一。

虽然现在我家比当初在梁茹时平静好多，珠古玛和其他哥哥仍醉心于习练精良的枪械，切磋枪法。他去练枪法，也让我陪他一起去。看了一会儿，我当然坚持让他教我打枪。珠古玛总是那么耐心，满足了我的愿望，兴致勃勃地教我枪法。太让人兴奋了，我还从没有听说哪个女孩会射击。

哥哥的教导让我掌握了一些原本只有男子才会的技术，潜移默化中慢慢地转变了我需要别人照顾的弱点，形成了我坚定的自律性格。教我时，只要我要小孩子脾气，急躁、懒惰，他会一声不响地走开，留我一人在那儿不知所措。他不断强调观察和专心的重要性。一来为了让他高兴，二来我自己掌握了新本领也越来越有成就感，我就开始把他看作老师，接受他那严厉的态度。

母亲常说：“珠古玛，你都是大人了，怎么可以这么宠她？女人不该用枪，你是知道的。”我总是反对这种说法，梁茹的一位妇女就是个例外，她叫赤美卓玛，是嘉日仓家族中的一员，凭着智慧和英勇做了土司。她带领家族跟仇家一决雌雄，跟刘文辉的军队辗转作战，还跟多次侵入她的领地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杀而进行的全国范围的两万五千里的集体行军）军队对决。卓越的领导才能，使她成了整个藏东的传奇人物。

尽管有她的威名作例子，妈妈还是决定不让哥哥带我一起练习射击了。不用说，我认为这极不公平，简直是种痛苦。男子们进山，我试图说服母亲让我跟哥哥一起去。母亲训斥我：“那儿只有男人，你去干什么？”我只是不想和珠古玛分开。

珠古玛带我去宿营，算是对我的补偿。我们划着一只小牦牛

皮船，横渡河流，河面很宽，河水又深又冷。到了对岸，点燃一些芳香的杜松枝，祈祷众神。吃过晚饭，围着火堆，我依偎在哥哥怀里。哥哥教我忘掉一切杂念，只细细地聆听周围的一切，注目周围的动静。月亮慢慢升起来，燃亮了卡瓦拉里的三座山峰。他给我讲故事，指点星空。碰上少有的晴朗夜空，还可以看到无数流星雨，我们或开着玩笑，或只是听着森林的声音，直到我睡去。



姐姐布姆比我大五岁。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即使调皮仍博得家人喜爱。但大家赞美布姆，却完全是因为她的善良和超群的美丽。似乎她总能体会别人的感受，总是知道该说什么话，而且非常耐心。布姆在家总是安安静静，虽然在年龄上我们最接近，和她相比，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尤其是我经常吵着闹着要别人照顾自己。我希望在各方面都能和布姆做得一样好。她总是把头发辫得整整齐齐，戴着漂亮的项链，穿着好看的衣服，配上美丽的脸庞和温柔、含笑的眼睛，更加楚楚动人。

布姆出嫁那天，我喜欢上了她的漂亮头饰，开始缠着母亲也给我买像布姆那样的头饰，又平又长，顶端镶有三颗琥珀宝石，看起来非常华丽、气派。我见了吸引人的珠宝就喜欢得不得了，不知道这是婚礼专用饰品。母亲吵我：“不害臊，有你戴的时候，别急。”

布姆离家时，我很伤心。母亲告诉我：“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离开的。”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顿时感到很讨厌这种想法。我一直设想全家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哭了，之后很多次，一想到

要和家人分离，一种难以抗拒的悲伤和困惑就油然而生。从那天起，一连好多年，一想到结婚心里都感到怕怕的。

除了和珠古玛在一起的宝贵时光，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度过的。记得母亲对我说：“你不能再玩了，你已经长大了。”我总和她争论，把母亲争得很尴尬。我说我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大，他们都还在玩，我也应该玩。母亲回答说：“不，不，不，和那些女孩在一起，你比他们高。”真不幸，我不巧长得相当高。

母亲接着说：“你很快就会长大，一定要承担责任，你不是尼姑，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家里。要做尼姑，就必须很虔诚地信教。不能戴珠宝，也不能编辫子。不愿作尼姑，就要结婚，嫁到婆家，必须学会处理一切事情。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持家，你自己很难堪，我们这些娘家人也没面子。”我反驳她：“为什么是我被送走？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和爸爸在一起？”她尽力向我解释，让我明白结婚是人生中很自然的事情。

珠古玛经常建议我说：“你最好做个尼姑，要是你结婚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我不同意，舍不得那些珠宝、辫子、漂亮的衣服，不愿放弃在舞会和其它聚会上穿戴的机会。为什么我要被迫剃度，放弃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就因为我爱我的家？母亲一听到我说这样的话就恼羞成怒，斥责我怎样可以这样说话。但是我总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抛出了家庭，抛到世界上。

姐姐布姆的丈夫贝玛坚赞是一位好丈夫，家里很富有，一家人住在同一地区。跟我们这儿的藏人不同，贝玛坚赞在寺院里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因学有所长很受人敬重，年轻时是出了名的勇敢。他很潇洒，蓄了短须。作为康区男性的特征，他将长长的辫

子盘在头上，用一条红丝带束着。和家人、朋友谈话时，他看起来又和蔼又自信。我知道父亲非常喜欢他。

初见贝玛，我很喜欢他的外貌，尤其是他的微笑，但我对他仍有些冷淡。他是外人，只是尽力吸引姐姐的注意。筹备婚礼期间大家忙忙碌碌，完全把我忘了。姐姐离开后，一连几个月，我都觉得很沮丧。

时光流逝，家人告诉我贝玛坚赞多么好，会是姐姐很好的伴侣，我开始接受这个现实。幸运的是，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只有五公里远。我逐渐开始了解他，去他们家时也不再害羞，经常去找他们。

贝玛总是对我笑脸相迎。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不住嘴地开玩笑，总说一些让我尴尬的话：“噢，阿德来了，小心她藏着枪，不定哪一天，召集一支军队，成了领地的女皇。”然后又半认真地问我：“阿德，你怎么没有男朋友？是不是他们都害怕你啊？怕你会在他们不走正道儿的时候开枪，还是怕你个头比他们高啊？”我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答案来给自己找回点儿面子，但经常是不知所措。

虽然贝玛在家人面前从不怎么发脾气，一旦发现有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做了愚蠢决定，他会突然激动起来，很不耐烦。和他争论，想要说服他非常困难，对手会马上明白他到底有多固执。在跟人争论的时候和涉及名誉的问题上，他有时会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

贝玛精通藏族文学，经常给我们读西藏战神格萨尔王²⁹的史

²⁹ 格萨尔王，藏族史诗中的英雄，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降妖除魔、惩强扶弱、救护生灵，使百姓过上了安定、富足的日子。他的故事以说唱、戏剧等形式长期流传——译注

诗。很久以前，格萨尔在莲花生和其他众神的指导下，与恶魔和邪恶之王作战，收复了他们的王国，廓清了通往达摩的道路。格萨尔的历险故事可以写成厚达一千页的书，许多藏人都能大段地背诵他的生平故事，表演出来得好几个小时。他们也用抒情的方式来朗读或讲述那些故事，那押韵的诗行背诵起来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贝玛讲故事时声音特别优美，演绎了一幕幕鲜活的格萨尔历险记。

贝玛坚赞成了我的又一位哥哥。那时，我不能想像有一天苦难会缠上他和布姆。结婚不久，厄运开始降临到他们身上：两个孩子先后夭折。后来，情形越来越糟，夫妻二人不得不分离。再后来，贝玛坚赞和我一样被划成最严重的罪犯——政治敌对分子和暴乱分子，还作为反面教材游斗示众。然而，早些年我们并未预见到要发生的事情，像一家人一样欢欢喜喜，平平静静地生活。



贝玛坚赞和哥哥们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和康区的关系。和当地许多年轻人一样，对中国人进入甘孜，他们很气愤。跟朋友在家中聚会时，贝玛经常用各种丰富多彩的言辞嬉笑怒骂地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 1950 年共产党入侵前，藏人经历了一生中的一场大劫难。追根溯源，这场劫难得归咎于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文辉从中央政府脱离出来，控制着四川（中国的一个省，位于藏区东边）大部分地区，之后，又控制了西藏边界地区的打箭炉。20 年代后期，他的势力范围已扩展到康区东部，军队的残忍、腐败令西藏

人民深恶痛绝，完全失去了民心。藏人唯有靠行贿、妥协，才能与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队相处。

希瓦和嘉日两个家族一直仇怨未消，在长达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嘉日家族先是在嘉日多杰南嘉，后来又在不屈不挠的女土司赤美卓玛领导下，和刘文辉进行了长期斗争。江央桑白希瓦仓和他的谋士们饶有兴致地观注着事态的发展却从不介入。到了30年代初，赤美卓玛在嘉日多杰南嘉不在时当选为部落首领。虽然她曾坚决反对希瓦仓和嘉日仓进行联合，说起她时，父亲仍充满了钦佩，说她领兵打仗很有一套，敢说敢做，誓要夺回西藏对梁茹的统制权。赤美带着枪支，扮成男子模样，多次亲自指挥嘉日仓的队伍跟敌人作战。最终在纳格托被刘文辉的军队逮捕，戴着镣铐押到了雌龙关，1939年被行刑队处决。她被捕后，汉人放火烧毁了嘉日仓的城堡。

然而，不久，刘文辉自作自受，最终吃了败仗。一来，他和他的侄子军阀刘湘是对头，叔侄俩一场恶战，刘文辉落败，失去了在四川的控制权；二来，他与中央政府脱离得实在太远，最后除了打箭炉，所有的势利范围几乎全让别人占了。刘文辉曾是那么权倾一时，控制着四川大部 and 康区东部，而且说打仗就打仗，现在却狼狈得连给残部提供军需都很困难，最后只剩下一支残兵，时不时被南京中央政府调这儿调那儿。那段时间，嘉日仓的堡垒得以重建，梁茹的土司一一重归原职。甘孜境内的汉人很少有人敢走出驻地到外面活动。出了门也只敢走平川大道，大多在甘孜和打箭炉之间往返。

1940到1950年间，我们一如从前地过着日子，没想过什么外来统治。我们住在康区，自然是藏人，像藏人一样生活。我只是从一些陈年旧事中听说过中国领导的事情，虽然故事很可怕，

但相距遥远，也就不那么真实可信。但是中国人总是不断地转着心思，希望把西藏变成为一块由他们完全占有的土地。

第四章 甘孜的记忆

十六岁那年，我开始和大人一起下地干活。说来也怪，我发现农活虽然有时候很单调，干起来也很有意思。春耕要选在良辰吉日。动土前好几天，喇嘛们举行隆重庆典，一切祭祀礼仪完毕，大家才开始耕地。开耕的那天一大早，我们把红色羊毛扎成的结，挂在选来耕地的犏牛（牦牛和黄牛的杂交后代）的角上，以示吉祥。在地里焚上香，我们的家庭喇嘛卡囊库朔捧着经书，吟唱着清静经，绕着田地四周走动。

汉子们用带着铁犁铧的犁来耕地，上年纪的妇女提着篮子撒种。我总是闹着要和他们一起做，大人们对我说：“你还太小，要是把种子撒得满地都是，庄稼就长不好了。”我仍不依不饶，非要去做。

耕作和收获季节，家中除了珠古玛，都到地里干活。珠古玛一个人两头忙，又是照看山里牧场上的牲畜，又是监督田里的情况。收庄稼的时候，一罐一罐的青稞酒往田里送。到了傍晚，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畅饮。我家的田地所在的山谷有三、四英里宽，十五英里长，人们说是全康区最肥沃的农田。



童年时光和婚姻生活是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小伙伴们打成一片，无忧无虑。嘉日仓一家住在甘孜，我们经常从洛巴夏去他们家做客。

他家的房子叫做“宗”³⁰，是一种堡垒式建筑，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建在城镇旁边的高山上。山脚覆盖着草地，“宗”的上方是甘孜寺，藏东最大的寺院之一。沿平地而上，可见阳光下金碧辉煌的寺顶。甘孜寺色彩绚丽，以红白为主，依山而建，好似佛教圣地“曼荼罗”³¹。

僧人和年长的喇嘛居住的屋舍依山势高低而建，由窄窄的游廊和楼梯相连。寺内重楼叠阁，错落有致，有几处台地花园视野开阔，可遥望流光溢彩的卡瓦拉里雪山的雄姿。大大小小的楼宇内部都由红漆的巨型圆柱支撑，庙里到处是佛像和西藏神像，墙上挂着鼎盛时期留下的巨幅丝制唐卡和挂毯。其中一幅为“都噶”³²刺绣唐卡，佛母右手执一柄白伞盖，意为伞盖下庇护着芸芸众生，面带愠色，镇妖伏魔，千手千眼，威踏六道众生。这幅举世闻名的珍宝，有三层楼那么高，每年夏末，挂在辩经院的大礼堂，供人们观瞻。

我年轻时，甘孜寺有两位有名的活佛：蓝达仁波切和西雅祖古。甘孜寺是一个朝圣要地，各地信众纷纷前来朝拜，绕着三里长的转经廊转经。整个朝拜中，时时在某个神龛前驻足，一起转动那些巨型经筒，大的有十二英尺长，半径有六英尺。人们相信转动经筒可以让人更聚精会神地诵经。

夏季，寺院内表演宗教礼仪舞蹈“羌姆”和藏戏“拉姆”。搭起帐篷就是舞台，许多人不远千里，前来观看身着锦袍、打扮成国王和英雄的僧人们。僧人佩带着长长的藏刀，戴着绿松石。

³⁰ 宗，意为“碉堡”、“山寨”、“要塞”，一般是各大、小土司们的驻地——译注

³¹ 曼荼罗，梵语译音，本义为“坛”、“场”，在佛教中有很丰富的解释——译注

³² 都噶，大白伞盖佛母，千手千眼，手持白伞盖为八宝之一——译注

一片热闹气氛。

藏戏的主题多是男女主人公在追求“达摩”³³的过程中，如何战胜重重险阻。有一些是重现宗教之王和土司们生活的，还有一些，如：牦牛舞，是反映日常生活的喜剧。一场拉姆表演要持续一整天。人们自带干粮，全天都在寺院内享受这盛大的节日气氛。孩子们对所表演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几周后还在重复着表演的细节。

另一个朝圣重地是甘孜郊外的一座寺院，1284 年为大黑天神摩诃迦罗³⁴而建。那里的佛事据说是为了治愈长年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而做的。但香火旺盛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向大黑天神祈祷，不孕妇女就可以生子。

最美的寺院要数离我们村子不远的甘孜大察尔寺。19 世纪初，一些人为躲避梁茹的骚乱逃到此地。这些逃难者成了甘孜的居民后，被重新安置在牧场开阔的游牧区，甘孜大察尔就坐落在他们的村中央。夏天一到，我们一家到高地游牧，扎营的地方就和这座寺院相邻。

19 世纪 60 年代末，一位十分出众的祖古³⁵，即转世活佛，在达拉达的一个家庭转世，从那里到大察尔寺骑马只需一天半。经老人们同意，大察尔的居民把小祖古带到他们那里一起生活，让他作当地的精神领袖。渐渐地，祖古声名雀起，大甘孜寺认可了他，并帮助当地居民建了甘孜大察尔寺。居民们给僧人提供食

³³ 达摩，来自梵文 dharma，中国佛教典籍译为“法”。哲学意义上，它指事物存在的法则；伦理学意义上，它指人们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译注

³⁴ 摩诃迦罗，梵语译音，意为“大黑”，据言为大日如来降魔时所化现，其形象有二臂、四臂、六臂数种——译注

³⁵ 祖古，亦译“土库”，来自藏文 tulku，意即佛的化身转世——译注

品，寺院与周边地区一派合谐、安宁。

我父亲和江央桑白希瓦仓非常喜欢去寺院朝拜。他们喜欢一起长时间地在寺院和周围散步。希瓦仓经常把甘孜大察尔寺的美看作是自然与人类完美交融的杰作，漫步于此，令人心旷神怡。

甘孜寺院区，是甘孜的五个由土司管辖的地区之一。两位来自同一家族的土司在此任职，都拥有“马祖尔”（分区管理者）头衔。但不久，这个家族因姻亲分为两支，马祖尔土司的一个儿子继承了这一地区的部分统治权，他的家被称作康萨尔，“新家”。江央桑白希瓦仓土司属于这一分支。马祖尔土司最初是由拉萨政府任命的，称为“邦”，即甘孜地区的行政长官。



我们家和希瓦仓一家关系非常近。土司的两个女儿，德臣望姆和贝玛旺姆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德臣严肃认真，非常热情，也很有耐心，对身边的一切都很感兴趣。自己家和当地十位副土司的事她都十分关注。她喜欢听父亲和哥哥们讨论事情，总是尽力弄明白当地居民中存在的问题。

贝玛旺姆活泼开朗，人人都喜欢跟她做朋友。跟我一样，她特别喜欢新衣服和项链。我们没有任何现在女性所使用的时髦化妆品，用的是一种带有花香的白色油膏，相信涂上它我们会更漂亮。这是中国商人从西宁带来的，卖给安多的康巴商人在当地销售。

买项链、上衣、丝绸朱巴时，贝玛旺姆和我总是互相参谋，直到买到最合适的为止。我们穿戴上新衣装，一起玩耍嬉戏，自认为是甘孜最美的女孩。一般我们都在“宗”内玩闹，但有舞蹈

“羌姆”或藏戏“拉姆”演出时，我们大着胆子跑到城里。走在街上，一身不同寻常的华丽衣服常引来人们注视的目光。

到了那个年龄，什么家务活都少不了我。家中有四个仆人，三位女仆负责喂牲口、放牧、挤奶、做酥油和奶酪。帕尔诺是总管家，四十岁左右，有时看起来好像整个家都是她的。她工作非常负责，家里缺啥少啥全归她管。另外三位仆人是卓玛、才洛玛和楚依卓玛。卓玛和楚依卓玛干些农活，才洛玛负责打水和照看牛羊。才洛玛非常耐心，教我做酥油和其它奶制品，总是教到我完全掌握为止。见我累了，就马上接过我手中的搅奶器。

家中还有一位成员巴觉，是珠古玛的助手，俩人总是形影不离。在山上扎营或是出去做生意，总是巴觉把所有的东西打好包放在牲口上；夜晚歇脚时，又是巴觉搭帐篷。珠古玛非常信任巴觉，知道他很诚实、很有能力。珠古玛经常说巴觉能明辨是非。虽然巴觉有自己的家，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非常喜欢和哥哥们一起喝酒，一块儿讨论。



1948年，是我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通过朋友打听，家人听说有一家的儿子还未娶妻，他家离我家骑马两个小时就到了。那家人最初住在梁茹的萨丹，后来搬到我们村子的临近地区，现在在梁茹还有一个小农场，在洛巴夏附近还有一个。两个农场是他们的经济来源。虽然这家人并不很富有，但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父亲很满意。

虽然桑杜帕钦和我并不认识，我经常听一个女伙伴提起他。女伴和桑杜交换过定情信物。虽然他们没能结合，女伴不断地告

诉我她对桑杜多么看重，桑杜多么与众不同，多么能干。我们一起在甘孜散步时，我看见过桑杜好几次。

父亲和珠古玛到桑杜家和他母亲说了此事，还安排了一场正式的家庭会见。一天，桑杜帕钦、他母亲、姐姐一起骑马来到我家，手捧哈达（礼节性的白色围巾）、礼品前来相亲。他很潇洒，比我大三岁。初次见面我很害羞，我肯定他也一样。但我们一见面彼此就很有好感。和家人谈话时，他时不时向我望一眼，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我对他一见钟情，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了。

我的心扉渐渐洞开，开始接受那即将到来的现实。我感觉到嫁给桑杜帕钦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那非比寻常的漂亮黑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整个人看上去又友善又多情又体贴。桑杜虽然年轻，已经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几年前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就承担起了家庭重任。我很感激家人对我的理解，让我自己去选自己爱的人做丈夫。桑杜帕钦发现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他，最终选择和我结合。

1948年春末，我们俩结婚了。出嫁那天早晨，我身穿一身紫色锦缎朱巴，绣着金龙与花朵；戴着长长的金耳环，三串由黄金、绿松石、珊瑚、猫眼宝石（西藏流行的一种稀有花纹矿石）组成的项链；手臂上全是玉镯；衣袍上系着一条重重的白银带子。梳妆打扮完毕，母亲高兴地望着我说：“阿德，你的好日子到了。”记得几年前一次和母亲争吵，非要戴姐姐布姆的结婚珠宝，此时我突然明白了：“啊，这次我的童年真的结束了。”

身着盛装的家人和朋友簇拥着我，向丈夫家出发。下马前，按照传统仪规，人们高唱赞歌，赞扬我们这对新人及各自家中的祖辈。仪礼完毕，马前摆好了踏步，上面刻着茶砖那样精致的图案，铺着豹皮毡子，我下了马。

大门前，家庭喇嘛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仲萨”，新郎和他的家人在门内，我们站在门外，仪式结束后，所有送亲者都走进房间，参加在客厅举行的盛大的典礼，这是第二场仲萨。主持喇嘛边诵经文，边向我们头顶洒圣水，给我们的婚礼祝圣，为我们的将来祝福。所有的亲戚、客人、仆人都争着抢着看新郎新娘。我非常害羞，非常紧张，整个仪式上几乎没敢抬头。

接下来就是三天三夜的庆祝。傍晚，人们燃起篝火，通宵达旦地欢庆，饱享美食，畅饮青稞酒。一直单身的哥哥奥确，为两家联姻做了演讲。他继承了父亲的演讲才能，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婚礼结束后，按照传统，新娘应继续在娘家住半年或一年。之后，两家才真正成一家。第二年春天我才算正式出嫁，母亲对我说：“你该走了，是开始你新生活的时候了。”

我收拾好东西，第二天，家人一起送我到新家。虽然那时我已经长大，完全懂得自己不可能永远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可是家人离开时，我突然满眼是泪，对这个新家充满了怀疑。但很幸运我被带进了一个充满理解的家庭。刚到家，透过婆婆桑旦卓玛的眼神，我知道了我和她的儿子是一样的。我马上改口叫她“桑旦妈妈”。

桑旦妈妈十分高兴，因为家里除了桑杜的姐姐热尕外，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我过门几个月后，热尕和丈夫贝玛旺求一起回到家中，我和热尕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桑旦妈妈、热尕、我，还有从娘家带来的仆人兼好友楚依卓玛经常在一起聊天。我听到了好多桑杜的童年趣事。桑旦妈妈经常提起孩子给她带来的快乐。桑杜是她的小儿子，似乎也是她最疼爱的一個。

我们住的是一幢三层木楼，结结实实，还临着大路。最上面

一层有两个房间做佛堂。卧室、客厅、储藏室和佣房都在第二层。我最喜欢客厅，喜欢那漂亮的木地板、小巧的西藏地毯。桌子和长椅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图案，西藏毡毯、枕头给长椅更添了几分舒适。客厅的立柱漆成红色，巧妙地配以蓝、黄、绿、白四种颜色的精美图案。房间最大的优点是有两扇窗户，透过窗子，可以久久凝视卡瓦拉里那终年变幻不定，高耸入云的雪峰。

我在家里主要就是接待客人，照顾婆婆。我特别盼望收割的季节，那时可以和楚依卓玛一起享受在农田干活的乐趣，享受欢庆丰收的喜悦。这是我生命中充满欢笑的岁月，可惜这样的岁月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和丈夫度过最初的调整期和亲密期，我觉得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桑杜帕钦。然而，我们婚后的第一年，他还曾见我流泪。他向我保证我可以随时回洛巴夏娘家。有时，他主动问我：“你不想去看看他们吗？和他们住上个把月？”桑杜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很理解我，也很关心我是否快乐。假如有什么事让我伤心失望，他总是设法逗我开心。他很耐心，知道在某些方面我还很不成熟。有时，看着他那敏感的神情，我明白了他要承担的一切，决心要做得更好。

最终，我们两家人非常亲近。姐姐布姆的丈夫贝玛坚赞和桑杜在我们结婚前就是朋友，我们经常相互串串门，听贝玛讲故事，背诵格萨尔史诗。后来，两家的人都来我家聚会。哥哥尼玛，经常在桑杜不在时来我家，他觉得那时可能是我最孤单的时候。大姐色拉玛和父母有空就来看我，天气变暖时两家一起在山扎营。我们这样的生活简直是福星高照。



大半生的光景，我从来没能真正意识到汉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出没到底是个什么兆头。小时候，我看见士兵在村里经过，吓得受不了。但那时年龄很小，事情过后，一连串快乐时光很快使我忘记了恐惧，不再担心未来。后来，我做梦也没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正威胁着我稳定的婚姻、和睦的家庭，以及我们的一切。虽然当时没意识到，回头看来，结婚那年确实是生死攸关的一年。东部连年的战火已告结束，胜利一方却很快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异常的动荡与混乱。1949 年末的一天，我们听说共产党到了打箭炉，这预示着一场变动即将来临。

第二部

侵略与监禁

第五章 共产主义来临

1950 年春天，甘孜的农民依旧去田里捡碎石、施肥、犁地。但是，四月中旬，我们听说一支共产党的军队正从打箭炉开拔。临近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麦子和青裸长刚出芽，田地一片绿色，生机勃勃，树上花蕾初绽，我们心里却时常感到不安，在紧张、期待中度日如年。

4 月 28 日下午四点左右，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到了甘孜城下方的平原。同一天，共产党的军队抵达了洛巴夏。家人聚在一起议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要做什么呢？谈话时，外面不时传来阵阵骚动、喧闹。我哥哥起身望了一下，立刻扭回头，冲我们喊：“中国人来了。”我们都跑到门边向外张望，路上全是士兵。军队纪律严明、礼貌有素，我们很惊奇。

军队是奉吴师长³⁶的命令进入甘孜的。整整一个星期，一支又一支的小分队继续进驻甘孜。这么多的军队看得我们只吃惊，总共接近三万人，遍布在甘孜及周边地区。我们不知道第十八军五十二师正准备进入昌都（拉萨政府离我们最近的政治中心）和拉萨政府直辖的康区，然后直接进入拉萨市。

甘孜寺院东边，离一座堡垒不远，有一大片空地，名为“陶沟”，共产党军队在那儿召开了一次大会，对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来这儿，是要把你们从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国民党的统治永远结束了，我们来帮助你们真正当家

³⁶ 原文 Wu Shizang, Shizang 当为 Shizhang 讹误，径译“师长”。带领 18 军 154 团先遣队进入甘孜者为师长吴忠——译注

作主，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是你们的客人。我们知道那些土地属于你们。完成任务后，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我们是兄弟姐妹，是来帮你们的。”

吴师长³⁷由桑叶耶西陪着，那是个藏奸，年轻时在长征中加入了共产党，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田宝。现在，人们都在传，他好像已经不会说藏语了。

会议上，一些印着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袁世凯头像的硬币，被当作礼物分发给在场的人们。这种硬币，被称作“大洋”，是共产党打动我们的第一招。中国士兵走街窜巷，给年轻人一些银元，和他们套近乎，但是没有一个人洛巴夏人敢要，也不愿意要。村里的孩子们看到士兵过来，就跑去找父母，或是跑到离得最近的大人那儿。无奈，当兵的就将大洋给了家长，说是给孩子买糖吃。

中国军队穿得破破烂烂，衣服不足以御寒，武器却很先进。他们来到高原吃了不少苦，完全不适应。普通士兵看起来个个营养不良，多数人鼻腔出血，脸被强烈的日照晒得通红。只有军官能得到氧气罩，帮他们减轻恶高原反应。大多数从平原来的人都感到恶心，头痛。中国士兵经常喝糖水，认为可以缓解症状，还去甘孜附近洗温泉浴减轻不适。

很快，共产党的游行队伍充满了康区的大街小巷。他们挥舞着小旗，高举着他们的英雄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高喊着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口号。在他们“和平解放”西藏的最初阶段，士兵们没动过任何武力，也从没威胁过我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家乡时都是受人压迫的农民，共产党的革命给了他们权利。中国士兵尽力做各种演讲、以模范行动赢得我们的信任。上级有命

³⁷ 原文 Brigadier Wu（吴旅长），据上下文改作“吴师长”——译注

令，他们不能伤害任何人，不能侵犯任何女人，不能损害任何财产，而且，买什么都要付钱。通过共产主义制度可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们自己也深受这种誓言的感染。

最初，共产党对宗教表现出了一副崇敬、虔诚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那时研究我们的宗教和习俗，已成为军事训练的一部分。一天，我去洛巴夏的亲戚家，出去散步时，看到一些士兵在村里闲逛，他们遇上了一位边走边大声祈祷的藏族老人。一个士兵拿了他的转经筒，试着转了转，转完，另一个人也转了转。他们又看了他的念珠，拿在手中一个珠一个珠地数起来，一个人数罢，另一个人又数。我走进了几步，听见他们在出声地念着死记硬背了的六字真言经：“嗡嘛呢叭咪吽”（意思是“赞美你，莲花湖的珍珠！”³⁸）。其中一个人称赞了老人对宗教的献身精神，还说他们也爱佛。起初，中国士兵的这种表现随处可见，有些藏人还认为共产党也信奉佛教。一些上年纪的藏人对此很惊奇，他们接触过的中国领导者，一向都是对我们的宗教文化毫无兴趣。共产党总是不停地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我们只是来帮你们、教你们如何当家作主。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到那时，你们就是叫我们留下，我们也不留下。”他们说他们是来推行“自主、自治”政策的。

军队刚到时，军官们只提团结；但我们最后了解到，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就意味着要开展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很快分裂了社会，离间了朋友，帮助共产党了解到了贵重物资的所有者。

那个夏天，飞机从这一地区上空飞过，空投下一捆捆的大米

³⁸ 此为六字真言经之一解。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解释为：“啊！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译注

和大洋。我们当地的主食是青稞，中国士兵吃不习惯。他们要空运食品，这使我们怀疑那些驻扎在甘孜下面的陆军是不是遇到了抵抗。



收获季节，一队队春风满面的中国士兵来到田里，给我们提供帮助。看到有谁扛的粮食过重，士兵们就执意人家放下，然后自己扛起来，说：“请让我们帮帮你，我们是一家人。”参观寺院时，他们告诉僧人们：“你们这种宗教信仰很好。”还给寺院捐了一袋子一袋子的大洋。

我父亲多杰拉普丹看到这一切很气愤，他认为人们接受这些礼物很愚蠢，觉得中国人把我们当小孩看，尽力去赢得我们的信任，左邻右舍都被他们的许诺迷惑了。

最后，第十八军的一支支队向昌都行进。那时，六十二师已在打箭炉完全驻扎下来，接管了这一地区和其它地区的行政权。康区东部大部分地区都被这潮水般的军队占领。许多老人还记得在长征时期打过的那些硬仗。那时，由于粮草不足，共产党不顾一切，想方设法搜刮食物。虽然很多康巴人想起来反抗，但是他们很清楚中国兵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他们寡不敌众。

嘉日尼玛和一些其他藏族官员同中国当局有过接触，他们听到了一个计划——如果和拉萨政府的协商不能进行，如果达赖喇嘛潜逃，共产党打算让桑叶耶西来当政府长官。甘孜和梁茹的土司们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都很清楚共产党的先进军事力量。

打跑蒋介石后，共产党很快变得异常强大，世界各国承认中

国政府，是康区人们十分关注的事情。有人觉得，要是我们迁就、迎合共产党，说不定他们不久就会离开，他们待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我们多用些心思智取他们，还能赚得那些他们给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大多数是在长征中和中国人合作的，相信共产党会践行诺言，为西藏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共产党来之前，甘孜没通电。中国士兵很快在康萨尔宗³⁹安装了小型发电机，靠人踏动一辆固定的自行车一样的装置来发送无线电报。大半年后，又带来了一些发电机。中国人开始在堡垒里放映宣传片。甘孜的大多数人从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个个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对影片中所宣传的内容，大家都很怀疑——影片总是不断宣扬共产党多么伟大、正直，宣扬共产党拯救了穷人、建立了新中国，万众一心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奋斗。影片里讲的中国兵个个英勇善战、朝气蓬勃，相形之下，那些日本兵全是胆小低能，无可救药。一会儿，贝玛坚赞就一肚子气，看不下去了，叹着气，穿上衬衫走了。记得一个晚上，看完电影后我走在贝玛身后，听见他讽刺地对朋友说：“看过这个电影，我都想把命运交给他们了。”

共产党看起来很殷勤，但他们不间断的古板说教让人厌烦。共产党人似乎全然没有临时应变的能力，不光是跟藏人谈话，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谈话，也不断引用毛主席语录。开会时，我们要一首接一首听共产党歌曲，无数的口号，但那些歌儿啊口号啊全

³⁹ 宗，原为土司们的驻地，14世纪演化为县一级行政单位，可参见第四章注一——译注

都生硬无聊，味同嚼蜡。我们只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等着散会。



由于父亲是“垂朋”⁴⁰，有六位中国官员定期来我家讨论司法制度。自然少不了赞扬父亲一番，称赞他如何秉公执法、大公无私、体恤穷人，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厚爱；还告诉父亲他们很想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家在当地有如此的社会影响力。我以前亲耳听过，也亲眼见过他们对我们的宗教的异常兴趣。通过与他们接触，我进一步地观察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来我们家的那些官员总是要求到佛堂参拜，起初，看到他们叩长头，行一些连中国的佛教徒都不知道的礼节，我们十分惊奇。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几乎带着一种宗教狂热，声称“他是解放一切受苦人的伟大父亲，对藏人的幸福无限关怀”。他们说是毛泽东把他们派到西藏，看看藏人是不是有困难，需要帮助。

父亲和哥哥对中国人的先进武器很感兴趣；他们来我家时，所有人都爬到房顶练习射击，珠古玛用猎枪和鲁格手枪⁴¹和中国军官交换他们的手枪。珠古玛是出了名的神枪手，中国人总是夸奖他有才能，给他更多子弹。他们告诉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彼此学习，真是太好了。当然，他们总是让父亲相信：“我们根本没想留下来。我们只是暂时在这儿，明天就会回去的。”他们走后，父亲不断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只是为了给我们营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骗得我们的信任。

⁴⁰ 垂朋，藏语译音，法官或律师——译注

⁴¹ 鲁格手枪，由毛瑟公司制造的驰名手枪，以设计者鲁格的名字命名——译注

到那时，中国人已经摸透了藏人的社会，分得出谁是最受人尊敬的名门望族，谁是社会权威人士，谁是富家大户，谁是乞丐，谁是一般僧人，谁是寺院方丈。他们耗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些。共产党特别注意了各个寺院的财富，有多少牲畜，有什么样的雕像等。此外，还收集了甘孜地区每家每户的个人财产信息。



甘孜城下面的平原上有一座村庄叫苏额夏，国民党时期，村子附近动工建一座飞机场。后来，共产党征用了大批藏人，工程终于在 1951 年 12 月完工。虽然西藏人得了报酬，但牢骚也很多。一些人抱怨被派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不能在田里干活。飞机场完工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落成典礼，我没有参加，听说甘孜以及一些其它地区的很多要人都出席了。第一次看到飞机降落，人们激动万分。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想过，这些飞机的出现会给将来带来什么。苏额夏离甘孜城东南最多不过 5 里，最终成了拥有上千名中国官兵的大城市。

日子一天天过去，进驻这一地区的士兵越来越多，驻守在甘孜兵营和大察尔寺。洛巴夏成了中国装甲兵的司令部。军事基地一旦建立，过不多久周围地区就成了军队的大本营。

占领军没有忘记他们的诺言。他们盖学校、建医院、设兽医站，还在甘孜开办了一所专供穷人孩子上学的小学。1952 年，可供藏人免费就诊的医院落成了。我们骑马从门口经过时，经常看到人们排着长队，等待体检。然而，康区这些医院后来主要是为第十八军服务的。

不久，共产党做的一切都露出了底细。学校的共产党教员教育孩子们：藏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人要学习汉语、中国历史、风俗，要在日常生活中好好使用，才能更好地认识到藏人的真正身份。上了年纪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搞法儿，私下谈论说，学校教给藏族孩子的那些思想，是让他们对自己的家族传统感到耻辱。



1953 年，洛萨节（藏族新年）期间，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甘孜寺院区一个叫钦德的地方举行。当地所有的显贵和将近全镇的居民，还有许多中国士兵和军官都参加了。宴会上汉人告诉我们：“这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尽情享受自由吧！我们不会打扰的。今天，借这次欢庆，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回。”但是聚会上，有人在拍照片。一些特别好奇的人看得很仔细，被照相的都是些珠光宝气的富人。

过了几个月，汉人从当地的寺院和家庭中选出了一些能人，告诉他们：“你们是各行各业最能干的人，我们想让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代表团共有二三十人，包括我父亲和甘孜土司的儿子贡噶坚赞希瓦仓。代表团乘飞机抵达中国，共产党领他们看了最好的工厂、田地，使他们慢慢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都井井有条。

代表团被带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城镇去参观那里的工厂。父亲在某个城市的市场上看到有人销售佛像和唐卡。有一会儿，他和代表团走散了，代表团的翻译原是国民党的一员，最近，为了保

护自己，投靠了共产党。一位中国老人引起了父亲的兴趣，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聊了起来。谈话时，一辆满载着国民党囚犯的卡车经过，“你看，”那位老人对父亲说：“所有囚犯都要被处死。共产党正在一点点地把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都抢走。”父亲听了大吃一惊。

说话间一辆载着女囚犯的卡车到了。所有的女人都从卡车上拉下来，站成一排等待枪决。她们害怕极了，浑身筛糠，站也站不稳，许多人都摔倒在地上。突然间，父亲明白了，在那些看起来无上崇高的演讲和许诺背后，隐藏着共产党真正的目的。父亲头脑中的一切信任荡然无存了。

代表团返回西藏前，共产党给每人发了个巨幅毛泽东像和斯大林像。回来后，父亲告诉我们：“这些人不打算离开我们的土地。他们给我那些画像，我当然不能拒绝。但我决不会把它们放在家里。”说着把头像扔进了壁炉，我们谁也没吱声，看着画像一点点烧成灰烬。

不久，一天，共产党宣布要把发给我们的“袁大头”统统上交。收缴一开始，他们警告我们，以后如果再发现谁有任何银元，都要受到严惩。大多数人都上交了银元，有些人打成了戒指，还有少数人冒险把银元藏了起来。银元很快不再流通。中国人告诉我们银元太重了，平常拿着不方便。中国的纸币，“元”首次在康区使用。以前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各种不同面额的硬币和纸币，虽然西藏的贸易多数是物物交换。



1954年初，一次大会议上汉人告诉我们，要成立一个政治协

商委员会，由当地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甘孜所有最受人崇敬、最有影响力和富有的人都被选成了官员。共产党付给他们薪水，要他们去说服社会上的其他人，告诉人们遵守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好处。共产党还向委员会派了中国顾问，帮助他们推行新政策。“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进行经济转变”的宣传一出台，汉人就提出自愿分田，试图劝说地主们把一些土地交给共产党政府，由他们再把土地分发给人民。甘孜的地主们没有丝毫热情，对这个提议不予理睬。共产党要求政协委员们去推行实施这些政策。共产党来的头几年，发给了居民各种各样的家具，许多藏人接受了无息贷款。

中国人说要给甘孜和周边地区无偿提供粮食和衣物，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者必须首先声明自己拥有多少财富和财产。据说这样可以使“分配更公平。”中国官员走访了各个家庭，确保每个人都对分配满意。许多人很高兴接受这些赠品，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些东西，认为这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中国人总是强调这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一份心意。那时，共产党向藏人打听邻居们的情况和态度，藏人都很愿意回答。

我父亲是委员，但是，自从亲眼目睹了中国女囚被枪决的一幕，他心存芥蒂，对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很反感。他开始在私下里找一些信得过的朋友，建议他们：“那些人没安什么好心。他们是要毁了我们的社会，抢走我们的一切。”一天，新命令传来了，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人员都要接受再教育。

那时，父亲生了病，卧床不起。自从他从中国回来，身体就一直不好。总是腹泻，整个人很虚弱，心中充满了悲伤。不久，一些士兵来到我家门前，说要把父亲带到医院。哥哥每天都去探望父亲。一天，珠古玛坐在父亲身边，等到周围没人时，父亲告

诉他：“现在再待在这儿已没用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带上所有能干的人，离开这里。一切都已在汉人的控制下了，希望不大了。我老了，支撑不了多久了。”他让珠古玛告诉我丈夫必须想法把我从甘孜带走。他觉得拉萨或许会安全些。

当地藏人，包括我们家人，都怀疑中国人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时间。父亲很倔强，起初，不愿接受汉人给的任何治疗，但哥哥最终说服了他。接受治疗后他一日比一日虚弱，见到他的人说：“他再也好不了啦，说不定人家在药里下了毒。”1954年春末，父亲在医院故去，给哥哥珠古玛和奥确留下遗言：“不管他们向你们保证什么，都不要相信他们。他们不久就会毁了我们的社会，消灭我们。你们必须努力找到挽救家园的路，共产党的行动注定要以毁灭告终。”

中共当局公开表达了他们的遗憾，说我父亲是一位十分诚实正直，德高望重的人。父亲去世后，共产党强迫珠古玛接替他在委员会的职位。

我们为父亲举行了天葬。按藏人的传统，人死后，如果家人能把一些骨头和毛发埋在拉萨色拉寺边的墓地里，会给离魂很大的好处。半是为了安葬父亲，半是为了逃避加入政协，珠古玛决定前往拉萨。共产党不同意，我哥哥奥确告诉他们，在珠古玛回来之前，他先接替委员会的职务，共产党这才同意让珠古玛离开。



刚一入侵，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提议要修一条新公路，说这一方面会推动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会给西藏

人带来巨大利益。很快，他们拓宽了往日走大蓬车的小道，建了连通西藏主要地区的公路桥。一些藏人认为这些道路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但多数人相信，这些道路对中国军队在全藏范围内进行快速部署，运送补给更为有利。康藏公路始于四川，经过打箭炉，最终进入甘孜和东边⁴²更远的地方。

修路期间，成千的中国人从成都和四川的其它地方被带过来，在打箭炉、甘孜和东边更远的地方修路。相当一部分人是国民党的囚犯。他们对藏语和藏族风俗一无所知，受尽折磨。由于高原反应，再加上极差的工作条件，很多人都死了。最终坚持下来的人，成了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住在西藏的汉人。

共产党从米纳⁴³、打箭炉和梁茹的其它地区征用了许多藏人参加修路，起初他们是和中国劳力分开的，而且会得到更多报酬。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解放军进入西藏，付给藏人的工资突然少了很多。藏人辞了工，怎么说都不愿再回去修路了。最后，共产党威胁他们，不回去修路，就采取报复行动。许多被拉去修路的藏人就这样失踪了，再没有回来过。工程进展的消息慢慢传到甘孜，贝玛坚赞大骂那些最初为中国人提供工具和衣食住行的有钱藏族商人。“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咬牙切齿地说：“他们真的相信中国人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国买到便宜的茶叶？搭上那么多中国人的命，就为给我们带来舒适和繁荣？”工程开建不久，一次嘉日尼玛来到甘孜带来了一些关于梁茹北边藏人的消息。他们发现那些被带去修路再没有消息的藏人，事实上是被带到了北方很远的格尔木，那是安多北部的一处要地，是西宁和甘肃兰州铁路线的终点。

⁴² “东边”应为“西边”，疑为作者笔误——译注

⁴³ 米纳，康定县折多山以西地区，亦称木雅，弥娥等——译注

1954年8月，打箭炉段的公路开通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机动车开进甘孜。要是走旧的蓬车路，从北京到拉萨要花3个月，公路修好后，只用20天就行了。1954年12月25日拉萨段开通后，从甘孜到拉萨只需12天。



同年，达赖喇嘛应邀访问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起草一部宪法，他和其它九位藏族代表应邀参加。达赖喇嘛把这次邀请看作是帮助藏族人民的一次机会，热切地盼望着会见毛泽东。

西藏民众对拟议中的此次访问都感到焦虑不安，因为我们怀疑这其中有诈，大家在想：“他们怎能从我们的眼睛里攫走我们的眼珠，从我们的身体里挖去我们的心脏呢？”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去中国。

达赖喇嘛一行乘汽车从拉萨出发。走了90多里，新修的道路被冲毁了。他们骑着马继续前行，新路经过了一段的强降雨后，经常会发生泥石流和山石坠落。随行人员决定要走老路，但是，中国的护送人员觉得脸上无光，坚持按原计划前行。路上死了三个人，还有许多骡马。最后，一行人终于到了一个可以通车的路段，搭乘吉普车沿着坎坷的道路前行。就这样，终于到达了甘孜，来自全省和卫藏的许多地区的五万多人守候在那里，等着拜见达赖喇嘛。

那天，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来到甘孜寺，他们觉得这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见达赖喇嘛了。生病卧床的老人由身体健康的家人抬着去接受赐福。

一片山雨欲来的形势下，我们觉得唯一应做的就是多作佛事，更虔诚地祈祷，为我们的精神领袖排解一切凶险。每个人都在尽全力向民族之神祷告，我们还举行了多次守夜祈祷，为他此行的成功吟诵了百万次的经文。我对他的行程充满担心，热切地诉诸那看不见的天上诸神，用仁慈佑护着他的生命。

藏人认为，有机会把自己或家里的所有献给达赖喇嘛，会给自己现世和来世的生活带来福气。那天，寻求谒见的人们，乞求他接受各自的物品，担心这些贵重的物品或许哪天就被中国人没收了。然而，达赖喇嘛正在去中国的路上，根本不可能接受什么东西。

目光所及之处，人人都在哭泣。我们很清楚，我们根本无力与中国军队抗衡。多数人意识到，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武力与中国人抗争，只会使达赖喇嘛的处境更加危险，公众也注定会受更多苦。

代表团从康区东部进入四川时，一些康巴人担心达赖喇嘛的安危，担心中国企图利用他作宣传，影响藏人，决定在代表团到达中国前，拦截他们，迫使中国人带他重返康区。但是共产党预料到了这种企图，在康藏公路沿线布署了众多军队。米纳拉嘎冈⁴⁴的拉嘎纳塘机场，是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终点站之一。约有三万人，我的家人也在内，一起去机场接他。人们为见到他而兴高采烈，个个争先恐后，希望作第一个被赐福的人，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担心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自己却又无能为力。人们很清楚达赖喇嘛正面临着难以估计的危险，但为了与毛泽东建立合作关系，他选择了这种方式。藏人知道必须尊重达赖喇嘛的决定。但是，又在痛苦地问自己：即使他那样做了，他何时能回来？

⁴⁴ 米纳拉嘎冈，现称新都桥镇——译注



达赖喇嘛在中国将近一年。他的回忆录里说，经常有人向他灌输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带他到各地参观。他感到虽然中国的工业进步给人民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但中国人民好像完全失去了个人意识。人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做着规范的行为。拥有外国报纸和收音机都被认为是犯法。所知道的一切信息均来自政府主办的广播节目和报纸。

毛泽东告诉达赖喇嘛，让他放心，驻守在拉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去帮助他和他的人民，军队不会行使任何行政权。毛泽东说，开发西藏的自然资源，推动西藏进步，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任命达赖喇嘛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主要是为西藏地区自治做准备的。但是，达赖喇嘛意识到，共产党实行这些政策，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共领导下的所有地方，都变成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翻版，这才是毛泽东和他的部长们所面对的、最关心的事。

最后，有消息说达赖喇嘛要离开中国了。行程安排先进入火箭炉，然后北上，经过安多。康区许多地方的人们，因没有机会接受赐福，十分失望。达赖喇嘛派去了代表与他们见面：赤江仁波切，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访问了格鲁巴⁴⁵寺院，敏竹林寺⁴⁶喇嘛琼仁波切接见了宁玛派⁴⁷的信众，葛玛巴⁴⁸接见了噶举派⁴⁹的信众。

⁴⁵ 格鲁巴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的宗派之一，俗称黄教。是十五世纪初叶在宗喀巴宗教改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译注

⁴⁶ 敏竹林寺，卓有影响的宁玛派寺庙，在山南扎囊县——译注

⁴⁷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的宗派之一，俗称“红教”，因其教派僧众均着红色衣冠。源于从印度来藏的莲花生，创立于11-12世纪——译注

⁴⁸ 葛玛巴，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此处指十六世葛玛巴让琼利佩多杰——译注

这一系列活动给康巴人带去了希望和团结。1955 年四月，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西藏人如释重负。



1940 年年初，嘉日多杰南嘉回到梁茹，了解到一位名叫阿丹的喇嘛被刘文辉任命为纳格托区专员，这一职位以前一直由嘉日仓土司担任。嘉日仓一家要求阿丹喇嘛下台，他服从了。但是多年来，阿丹一直坚持夺回一些特权，最后在共产党到来一年左右，阿丹在打箭炉提起了诉讼。为解决这一纠纷，1953 年，共产党当局在法庭上传唤了嘉日仓多杰南嘉和阿丹喇嘛。

在中国，嘉日仓多杰南嘉了解了太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很清楚现在解放军进入了西藏，个人财产最终会被没收。藏族有这样的传统，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去世时，他的家人要给寺院捐一笔钱。因此嘉日多杰南嘉告诉家人，他死后，要把家里的大部分财产分给各个寺院，不要落到共产党手中。

嘉日仓家的重要成员，包括被任命为梁茹的主要行政长官的嘉日尼玛，在嘉日多杰南嘉的陪同下，去参加在打箭炉举行的会议。一到那儿，所有的人都被软禁了起来。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削弱藏人传统的领导者的势力。拘留了嘉日多杰南嘉，他们也就剥夺了最后一批有权的土司手中的权力。嘉日多杰南嘉遭到扣押，无法在达赖喇嘛去中国时与他见面；也无法在 1955 年春天接受达赖喇嘛派往梁茹的特使琼仁波切的赐福。老人眼睁睁地错过一次次难得的机会，非常伤心。1955 年秋天，嘉日多杰南嘉在

⁴⁹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的宗派之一，创立于 11 世纪。由于噶举派僧人的僧裙中加有白色条纹，后人学者又俗称“白教”——译注

囚禁中辞世。

嘉日多杰南嘉去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哥哥奥确一直不言不语地一个人发呆，默想着这位倍受尊敬的老人被迫害的凄惨场景，默想着父亲去世的情形，默想着两位老人深厚的友谊以及他们永久分离的原因。两位朋友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他们充满波折的晚年似乎正体现了西藏经历的这场变革，从我们所熟悉的往日的光景变成了今天的模样。现在，父亲去世了，我们意识到生活再不会和以前一样，不禁纳闷，我们最终的命运是不是也会像他一样凄凉。

第六章 遗忘的诺言

西藏刚“解放”，甘孜大察尔寺的活佛大察尔祖古就去世了，留下了四页手稿，预言有一场侵略即将到来，会给人们带来无数困苦。大察尔祖古知道自己所剩日子不多了，告诉僧人们在寺院的每个角建一个小灵塔，来安放他的骨灰。由于中国人的干涉，僧人们只好堆了四个土丘，安放他的遗骨。

中国人到甘孜不久，便占领了大察尔寺，在那儿组建了“乡公所”，即乡级的行政部门，并告诉我们建“乡公所”就是为了和平解决各种汉藏交往中的问题。没过多久，解放军就驻满了整个寺院。

1955年，针对寺院的首轮迫害开始了。宗教信仰，在中国人嘴里，一下子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中国人把一些小乞丐打扮成僧人、尼姑，将他们带到卡囊寺院区，“僧人”、“尼姑”们宣布要还俗结婚。中国人说其余的僧人和尼姑也要如法炮制，使自己成为社会上更有一员。这项政策在许多寺院施行开来。为了不背弃自己的誓言，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还有许多人假装已经还俗，接受了新生活，但私下仍继续着自己的宗教信仰。

索南多杰，卡囊寺一位年长的僧人，是我们同村人，跟我哥哥珠古玛是好朋友。一天，他来我父亲家串门儿。只见他放下手中的茶杯，闭上眼，轻声地说：“我大半生都献给了我的信仰，决心抛弃世俗生活。他们就是再怎么逼我，我也不可能过俗人那样的生活了，被中国人控制着，背弃自己的宗教，还不如死了。”珠古玛看到他这么心灰意冷，很担心，却也无言相劝，只

有互道再见。没过多久，索南多杰在离寺院不远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



1954 年夏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第二年春天，儿子出生了，取名其美旺加。他的出生带来了无限快乐，但他的生活却是在一个最动荡不安的春天开始的。那时，再也看不到丈夫桑杜帕钦、姐夫贝玛坚赞和我哥哥们聚在一起，谈谈生意、讲讲马匹，聊聊各自的兴趣爱好。只看见有时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目前局势如何如何，气氛异常沉闷。往日餐桌上的欢笑和轻松已不复存在。“解放军会毁了一切。”父亲的警示还回响在耳边。我们商讨着如何评价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如何防范解放军的狡诈阴谋。想到局势如此无助，大家无不陷入在一片沉默中。室内噼啪作响的炉火、室外愈刮愈大的狂风时不时打断了我们的思绪，此时，我环视家人、朋友，看着他们被火光照亮的面庞，暗自寻思，下个月会发生什么呢？下一年又会发生什么呢？

贝玛坚赞越来越觉得藏人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共产党。最后我们商定，让桑杜帕钦设法把其美和我带到拉萨，他有一些颇有家资的商人朋友在那儿。安排行程相当困难，因为任何行动都要秘密进行。要是向中国人申请离开，除了被拒绝不会有其它结果。申请人还有被随时监禁的危险。局势难以预料，动荡异常。截止 1956 年初春，甘孜的一些地区和甘孜以外的许多地方都爆发了战斗。临近春未时，我们终于万事俱备，就差起程了。

临行前，我们邀请村民来家中聚会。想到就要离开朋友和家人了，我很伤心。聚会上桑杜吃了几片肉，突然感到一阵难受。

他紧紧捂着肚子，痛苦地叫着，倒在了地上。我冲到他身边，告诉他要坚持住，医生马上就到，自己却感到万分无助和恐惧。尽管有些人立刻去请了村里看病的喇嘛，还没等他到来，桑杜已经断气了。谁也没有亲眼看到有人给他的饭菜下毒，但人们都怀疑中国人早已买通了内线来投毒。朋友们和家人成群站在尸体旁哭泣。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我先是一阵麻木，之后渐渐明白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从头到脚没有一点气力，眼泪夺眶而出，我崩溃了。

那时，儿子刚一岁，我有两个月的身孕。桑杜帕钦不在了，我也去不成拉萨了。一系列的变化接踵而至，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动荡不安。丈夫死后的第二天，我从噩梦中惊醒。我竭力回忆着父亲和哥哥珠古玛讲给我的那些影响我一生的事，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从小就倍受宠爱，娇生惯养，这一切使我成了一位典型的妻子，一位完全依靠丈夫和家人的主妇。现在父亲和丈夫一个个离我而去，我不由想起了有段日子哥哥教我找准方向，坚定信念的重要意义。很显然，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别人带领，靠别人保护。渐渐地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唯一要做的就是仔细观察，耐心等待。想到这里我的痛苦变成了愤怒，又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坚定的责任感。

此后，西藏人知道了中国的政策是如此反复无常，难以捉摸。藏人把中国人同一条关于麻风病的谚语联系起来，中国人，就像是麻风病，杀人不动声色，等到你的手指一个个慢慢烂掉，你也就死定了。

桑杜帕钦去世后，婆婆桑旦阿妈生了重病，生活中没有了任何盼头儿。我回去照顾她。几个月里，婆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几乎没说过什么话。到了最后，没我扶着，她走也走不动，

站也站不起。

我可怜的小儿子从没有体验父母和孩子之间那种自然的天伦之乐。我努力使他的生活快乐、有趣，但是这实在让我身心俱疲。我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桑旦阿妈再没有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桑杜去世六个月后，她也去世了。我回到了娘家。



1956 年春天，第一轮民主改革在甘孜推行。寺院的财产、牲畜，没收的没收、查封的查封。解放军宣布这些东西将来都会变成“农村合作社”的财产。喇嘛们被迫参加农业生产和别的体力劳动，如挖地等活计。在寺院作僧人时，他们都有自己的杂活，但是因为种庄稼牵涉到杀生，而佛教教义要求不能杀生，所以按传统习惯，僧人和喇嘛们不干这样的活儿。

僧人们被逼着在田地干活，还被迫赤裸着双手运人粪，撒人粪，来给土地施肥。中国人还坚持让僧人和喇嘛们杀死小鸟、昆虫、老鼠，和别的被认为是害虫的小生灵，当然也屠宰绵羊和山羊。到了晚上，他们还得用自己的“战利品”去取悦中国士兵，向他们展示自己打死了多少只家蝇，捉了多少只鸟，还要一个一个地数给他们看。去寺院时我多次亲眼目睹这种事情。

民主改革的第一要旨就是要把所有的私人财产归为国有，建立“互助组”，即六、七个家庭在一起的劳动小组。先建小组，这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公社制度。他们说通过这些改革，藏人可以最终享受自由。

他们还告诉百姓，一切个人的土地、牲畜、种子、农具都要上交，用于加快集体化发展，改善生活，推进现代化。解放军按

照价值多少给土地所有者打了收条，许诺最终会偿还，但根本没有还。他们还说，百姓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其它私人物品，但要交一定的费用来资助这个系统。

我们很快明白了，共产党的长期计划就是要剥夺我们拥有的一切。康藏公路完工后，第一个益处就是一些重要物品，如茶、盐等都便宜了，但是好景不长。他们接二连三地制定了各种规章限制我们的活动，连篷车运输也不放过，这样一来传统贸易更难开展了。

解放军给我们提供了新化肥，向我们介绍了杀虫剂，要我们每年再多种两茬庄稼。但我们这里山区的土壤非常贫瘠，庄稼只能实行轮作，给土地留一些休耕和复苏的时间。按解放军的那种方法，虽然头几年产量提高了，土地最终没能逃过过分开垦的劫难。我们心里很清楚，虽然解放军声称他们会介绍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但对于如何在我们这样的地形和气候下发展农业，他们是一窍不通。

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着大地，滋养着大地。我们的文化一直追求与环境的完美合谐。我们只种那些我们需要的，这足够了。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贪婪。现在，他们似乎计划开垦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军队。

有一段，共产党设法说服每个人交出手中的枪支和弹药。理由是如果家中有武器，就会导致内部矛盾，从而对社会不利。他们告诉我们：“你们不用担心外部冲突或侵略，因为现在有我们，我们会替你们对付他们。”当然，我们都不是三岁孩子——我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己保护着自己。

在康区，男人们佩带藏刀是一种传统。共产党说康巴人不能

持有藏刀，这很可能会引起内部冲突，引发死亡。这个法令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因为男人们并不觉得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需要用外力来保护自己。共产党开始试图利用西藏当地的政协去说服康巴人。政协的人告诉共产党：“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人们交出他们的武器。这完全取决于藏人自己。”

于是，中国人召开了一次大会，企图让我哥哥奥确劝每一个人交出他们的枪支。我那可怜的哥哥站在那儿，低着头，活像一个囚犯，身旁围满了中国兵。会议就这样持续了两天。虽然奥确很害怕，但他始终坚持立场，不肯亲自去劝人们交出手中的枪。最后他抬起头，看着面前的朋友们，望着他们的眼睛，只是说：“中国人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会议结束后，中国兵训斥他：“你应该说是你自己觉得上交枪支很重要，而不能说那是我们的意思，你这样说，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了。”

奥确的处境十分危险。中国人想利用他的影响力，为他们作代言人。他完全在他们的摆布中，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但是他很清楚，无论如何也不能仅仅为了自己，而说一些对藏人不利的話去影响他们。不管结局如何，他不能作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奥确有很强的人格力量，委员会的其他人总希望奥确能替他们说几句话。

那时，我哥哥珠古玛已在拉萨多时，他渐渐明了解放军的意图，给家里写了信，真是难得，共产党对此事一无所知，信安全到达我们手中，信上说：“家中所有的枪支、弹药都要交给他们，因为哥哥在他们手中。至于民众，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他们的决定。”

随后的一次大会上，奥确说：“我们决定交出武器，因为我的家人别无选择。至于你们大家，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有

权自己决定。”我家有七支步枪，三支手枪，其中一只是德国鲁格手枪，几百发子弹，几柄藏刀。步枪和弹药家家都有，机关枪却没有一家有。

解放军利用政协劝藏人交出枪支后，把委员们带到了甘孜，安置在城西一所宽敞的房子里，外边有士兵把守。随后，尽管没有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实际上他们相当于被软禁了。外人不能探望，甚至连送食物都不能，更不能与他们单独谈话，时间再短也不行。



1956年，批斗会首先在甘孜地区展开，目的就是分裂民众。鼓动儿女揭发父母、仆人揭发雇主、农民和寺院的僧人揭发喇嘛和方丈。批斗会上，二十、五十，甚至一百多人一起起来殴打、折磨那些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被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许多藏人都死于这些批斗中。

一天，全镇居民都被召集参加批斗会。几个村民和一个喇嘛被抓。我们非常害怕，因为第一个被批斗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喇嘛卡囊库朔。一个女兵走到犯人那儿，告诉乞丐们要仔细观察她是如何对付喇嘛的，之后他们要照着做。卡囊库朔被迫跪在地上，那个女兵从身后跪在他腿上，一手拿着绳子，勒着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脸上倒尿，逼他喝下去。卡囊库朔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

批斗会继续进行，跪在地上的犯人被迫面向公众。一些镇民看到卡囊库朔被如此折磨，站起来高声喊到：“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士兵过来就把喊话的人带

走了，押上了卡车，关进了监狱。中国人对卡囊库朔说：“以佛陀的名义，你丧尽天良，用你的教义愚弄公众，自己从中捞好处。”中国人就是这样解释他们的宗教迫害的。

目睹了喇嘛和朋友们所受的种种羞辱，会场一片唏嘘，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折磨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有得受了。”



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人，说第二天早晨甘孜有一个审判，要我们参加。驻守在甘孜的中国兵把政协委员会所有被押人员都带了出来，我哥哥奥确和其他一些能干的藏人也在内，还有一些甘孜寺院的喇嘛。他们被带到市中心，跪在民众面前，又是打，又是骂。

这些暴力活动实施前，村里定期开大会。中国人告诉我们，民众被正式划分为五个阶级：宗教人员、大地主、中产阶级——包括商人、匠人、农民（拥有土地的农民）、雇工和仆人。中国人说根本就不应刻有什么富有家庭，贫困家庭之分，大家都应该是一样的。他们说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剥削了穷人，剥夺了穷人的权利。

说教也好，批斗也罢，对我们都毫无意义。共产党似乎一下子完全疯狂了。虽然我们根本不信任他们，却从未想到他们如此残忍。康区的人们经历过许多战争，我们坚信，如果非得打仗，那也要来得干净，打得英勇。

现在人们不再怀疑，解放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开始反抗，不能让他们照着自己的计划把我们的家园公社化。大多数有胆有识的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是该带上枪支弹药退到林区准备

战斗了。只有老人、妇女、孩子、乞丐和一些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留了下来。

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他们说：“你们的财富就是被那些人抢走的，现在是把它抢回来的时候了。我们支持你们。”中国人给了他们一些头衔，让他们穿上军装，手握钢枪，摇身一变，成了官员。对于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女乞丐，共产党说：“我们会给你们很多钱，但有个条件，你们得先去打那些喇嘛。”一些乞丐拿了钱，但不愿去冒犯喇嘛，但有些就很贪婪，中国让她们做什么她们应声儿就去。

我们把新来的官员称为“博森钦波”，意思是卖力干活的人。起初，他们不会用枪，怎么摆弄也摆弄不好，惹得我们直笑，但我们这份好心情并不长久。那些乞丐，以前从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利：新官员中没有一个真正知道如何当官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工作中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引起了许多混乱。

新官儿们把佛教唐卡压在马鞍下做垫子，骑马经过藏人身旁时就嘲笑、讥讽藏人。他们有一首歌，把藏人比作秃鹫，中国领导人是雄鹰，秃鹫竭尽全力去学雄鹰，自不量力地想和雄鹰飞得一样高；把藏人比作公牛，痴心妄想地想像“踵”（野牦牛）那样灵活优雅；把藏人比作胡狼，坐在老虎洞里扮作老虎模样。而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么多马匹被虐待而死，实在伤心。

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得

到这样的提拔的藏人当中，超过半数的人依然认为自己是忠诚的藏人。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食物和其它好处，决定不再反抗。1956年，我们当地的一位乞丐，玉禄贡宝，“脱颖而出”，被提拔到很高的行政地位，讨饭出身的人里头，就数他爬得高。他是秘书级，进入了规划委员会。

佣人和一贫如洗的穷人也会得到提拔，但通常，他们都在努力帮助藏人。当然，即便有哪个西藏人得了某种很高的官衔，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任何实权。一个不起眼的中国官员都会比他拥有更多的实际决策权。

我们的好友，希瓦仓一家，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中。和所有显赫的家族一样，他们被严密地监视着，只要看到有人和他们在一起，这人准逃不过不断监察的危险。希瓦仓的母亲去世后，虽然很舍不得，他们还是决定离开甘孜。共产党公开宣布每人都有出入自由，但是，当然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样一个重要家庭的行踪要想隐瞒过去，做得人不知，鬼不觉，绝非易事。一个驻守在打箭炉的中国要员来到甘孜，希瓦仓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位官员说，他和家人要去拉萨朝圣。一家人走了，再没有回来。我们希望不管怎样，他们能找到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

中国共产党刚到甘孜，康萨尔的土司耶希多杰决定去打箭炉试图说服新政府。他被任命为甘孜自治州总书记，虽然有这个身份，他的一切努力也没有得到回报。此后，他和一些来自康区其它地区的藏人领导被逼着去参加各种会议，从事无休无止的工作，想再回到各自的地区是不可能了，也再无机影响民众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耶希多杰的家人在中国推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



甘孜的形势不断恶化，中国兵把藏人从家中赶到森林边，让他们冲着藏在林中的战士高声呼喊：“如果你们不缴枪，我们就没命了。”林区很稠密，我们的战士们对其中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中国人不可能看到他们的藏身地，但是希望他们听得到家人的呼喊。

不久，所有的人都被逼交出一切财物，包括多数人都有的银首饰，少数人的黄金等都得统统交公。所有的戒指、手镯，衣服上的一些传统饰品，哪怕是一些稍好的衣服，都被统统没收。我们只能穿那些剩下的破旧衣服。士兵们还抢走了藏人家中供奉的神像。他们说：“给它一枪，看看你们的神是不是会上天堂。”说着抬手就是一枪，把神像打得粉碎。

有些家庭设法把东西藏在地下。被发现的，立即处罚。我们村上的一位村民被折磨、毒打，双手绑在身后，吊在柱子上。下面是熊熊的火堆，冒着浓浓的黑烟。他的脚底被烧成红色，全是水泡，脸一片乌黑，一会儿就说不出口，昏死过去。有些人只是被绑着两根拇指，吊在那儿，靠着体重一点点地将肉体撕裂。有的人再也忍受不住这种疼痛，大叫：“啊，是的，我把它藏起来了。我告诉你们在哪儿。请把我放下来。”但是，即使他把中国人带到埋藏点，挖出了财物，他也不会获释。中国人怀疑他还藏有其它物品，掌握其它消息。第二天，他们会再次遭到折磨，仍旧是绑着两根姆指，被折磨的人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只是中国人再也得不到什么满意的回答了。

这些迫害都是解放军在甘孜地区极为普通的作为。但看到有这么多人都快要死了，中国人决定改用另一种方法，“竹签策

略”——将细细的竹签楔进指甲盖下，用力向下按，直到竹签穿透皮肤。这样，既可以保留活口，又可以得到更多消息，还能有效地恫吓其他藏人。

回家乡前，我就已经意识到要帮助那些林区战士，告诉他们洛巴夏和甘孜发生了什么。现在看来这是我采取新的行动的最佳时机了。我联系了几个靠得住的朋友，组成了一支地下妇女小分队。她们又又带来了一些人加入我们的行动。我们决定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进行战斗。我们通常都是在晚上碰面，策划行动，把窗户都挡上，还派人站岗，一边低声讨论，一边提防着是否有公安局的人在街上走过。

最后，小分队已有五、六十人。白天，我们装着若无其事，一无所知，在镇上闲逛。白天碰上了，就假装不认识。有一组人专门负责传递信息。

小分队监视着共产党的军事设施和监狱，观察着他们的整体军事布署，共产党对此一无所知，也从未怀疑。我们探明了这个大院里哪个军官在哪个房间办公，门在哪儿，有多少新兵进来，拿着什么样的枪。有时，一些人因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被抓，获释后，他们告诉我们在监狱里听到、看到的情况。

我主要负责组织联络、交流情况、通知林中战士共产党这边的新动静。我安排一些妇女夜间在指定的地点会面，带上食品衣物，去林区找我们的战士，给他们通风报信。我很少去公共场所，害怕我那饱经磨难、神经错乱的样子引起他们的怀疑。我挺着肚子，头发蓬乱，不再计较穿衣打扮，整个人拉里邋遢。人们都说：“瞧，阿德成什么样子了。”

我姐夫贝玛坚赞，是起义藏人的领袖之一。他常在下午来城边儿跟我互通情况，安排以后见面的地点。临近晚上，林中的一

些战士想下来和家人会面。但后方的人们总是对战士们说：“不要下来，永远不要投降。他们已经把我们折磨成这样了，明天他们还会把我们弄得更惨。我们会一直给你们送食品衣物的。”我们给他们带去糌粑（藏族的主食，由青稞炒面制成）、酥油和一切找得到的食品。

中国人想逼出藏在山林中的战士，这种企图没有得逞，他们开始动用战机。战机通过空中探测可以找到战士们的藏身之所。三个师的装甲兵进驻甘孜，其余的军队紧随其后。此时，藏人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战斗真正展开了。

第七章 殊死搏斗

跟中国军队相比，我们的战士真的是缺枪少弹。抵抗侵略的军火全都是民间私藏，通常只有一二百发子弹，打完，战士们就只能靠大刀和匕首。因此，战斗中只要一看到有位中国兵倒下，藏人就立马冲上去抢他的枪支弹药。等到我们的战士最终弹尽粮绝，他们就把自己的枪毁坏，免得落在解放军手里。

尽管我们殊死奋战，士兵的人数天天在减少。不管有多少中国兵被我们打死，总有更多的新兵源补充上来。增援部队是清一色的新兵，装备着先进的枪支弹药。

1956年，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到今甘孜自治州的村村镇镇——梁茹、理塘、甘孜、德格、巴塘、芒康、色达——无一幸免。尽管康巴人的体质更适合在高山地区作战，但中国军队利用空中打击，找到了他们的死穴。俄国造的飞机从甘孜和成都的基地起飞实施空袭，整个康区一片瓦砾，到处弥漫着恐惧气氛。

那一年，故乡的人民在绝望中苦捱着日日夜夜。这块土地从没有经历过这样残酷的蹂躏。理塘、巴塘、德格、中甸⁵⁰和乡城的寺院都遭到了狂轰滥炸。寺院里几乎所有的财产，包括许多神圣的经卷，都被没收并运送到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宗教物品被一些寺院的喇嘛设法藏起，才得以保存下来。

中国人将社会分为五个阶级，不少属于上三个阶级的西藏人都被捕了，许多人被当众处决。很多喇嘛和僧人被无缘无故关进监狱，或被当众羞辱，或在公开审讯后被处死。在这种所谓的公

⁵⁰ 中甸，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传统上属康区——译注

开审讯上，西藏人是毫无发言权的。1956 至 1957 年间，甘孜地区的几千人因参与反抗或帮助撤退到林区的战士而被处死。

康区各地此起彼伏的藏人起义是由汉人在各地推行的所谓“民主改革”引起的。由此，藏东各地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战斗。1956 年初，像巴塘和理塘这样偏远的地区，藏人的领袖们根本无法相互联络，但是类似的遭遇使各地的人们采取了相同的行动。西藏人很清楚，建立由共产党严格控制的公社无疑会毁掉我们的宗教和文化。

到了 1956 年春天，祸患横扫了康区每个角落，梁茹的人们也未能幸免。每一个村子里，喇嘛和土司都成了批斗会上的主角，遭受羞辱、殴打，当场打死的事儿也不鲜见。在梁茹东部有一位地方土司的家属，不愿意交出家里的枪支而被处决。这件事激起了这一地区的人民的愤怒，人们发誓起来反抗人民解放军。

中国军队在部署上犯了错误：第十八军开赴昌都时，在梁茹留下了很少的兵力。虽然有一些师团隔三差五地经过该地区，但许多地方驻扎的兵力很有限。1956 年三月初，两场大战爆发了。西藏人奋起反抗，袭击了中国的兵营，还在嘉日尼玛的妻子多杰玉珍的指挥下，对共产党的驻防地——雌龙关发起了攻击，围困他们的城堡一月有余。在整个梁茹地区，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从甘孜派来的援军也被打败，到了月底，十八军派来了至少一万五千人的纵队来对付暴动的藏人，局势才扭转过来。经过激烈的战斗，共产党控制了局面，起义藏人被迫退回山中。

日渐减少的西藏军队开始集中兵力对付那些行进在新修的公路上的中国车队。由于藏人的抵抗，中国人运送了越来越多的补给，由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长长的车队接踵前行，西藏人用泥沙石块阻塞道路阻止他们前进。

解放军担心反抗会扩散到西藏内地，又部署了另外的十八个师，多达四万士兵。从康区和安多逃往拉萨的难民与日俱增，人数将近一万人，其中许多是二十五至三十岁的青壮年。



在梁茹，有一片广阔的平原，名叫布纳塘。1956 年底，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零零散散的抵抗战士在这里决定重新组成一个新的队伍。跟随着这些战士的还有许多西藏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根本无法在家乡生活。多数来自康区东部的西藏人已经没有了弹药，只能用手中的刀和敌人搏斗。不幸的是他们被空中巡视战机发现，刚到不久，就被中国步兵重重包围。

在那儿作战的士兵全都是背水一战。他们要保护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他们食不果腹，疲惫不堪。战场上一片惊慌失措，拼死血战的场面，妇女、儿童、婴儿和老人被团团围困在这场混战中。

我们这一地区能够作战的藏人许多都死于这次战役。人们发现他们死去时，仍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藏刀，那么紧，那么用力，手都变成了黑褐色。

这场战役的一位幸存者名叫阿希，住在梁茹。我们家跟他和他的父辈关系很近；他母亲是贝玛和德臣望姆希瓦仓的姐姐，她俩都是我甘孜的朋友。他们家住在梁茹和理塘之间的游牧区培夏。在布纳塘平原的战斗中，阿希失去了父母和所有家人。当时他只有十五岁，双腿和一只手臂受了伤。

战斗结束后，中国兵仔细检查了每一具尸体，确认是不是真

死了。装死的人一经发现就当场枪毙。说来幸运，他们不知为何并未打死阿希。他站在父母尸体旁，举手投降。环顾战场，他看见一具具的尸体就像是数不清的鹅卵石四散在地面上。一位妇女被打死，尸体旁就是她的孩子。不知道母亲已经死去，啼哭着要吃奶，先吸吮一个乳头，又去吮另一个。中国兵过来把那孩子抱走了。

成百的秃鹫在空中盘旋。许多条小河流过战场，四溢的鲜血将河水染成了红色，好多天都没有褪去。

阿希刚被逮捕就被送往医院。中国兵企图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消息，有多少人还藏在森林中，谁帮助他们，谁为他们传递消息，以及其它西藏抵抗战士的计划等。后来阿希被判了 20 年监禁。这期间，在甘孜那边的西藏人仍在森林中继续战斗。

在甘孜北边，康区和安多交界地区的果洛，有一个地方叫色达。色达耸立着一座高山，山峰直插云霄，峰顶常年笼罩在云雾中。藏语把这座山叫作“色吉仲日麦波”，意思是金牦牛居住的地方，被认为是一座圣山，是大黑天神摩诃迦罗⁵¹的居所。1957 年的一段时间，几千西藏士兵隐藏在山区。其中一位指挥官名叫瓦术托洛，原是一位游牧部落的土司。贝玛坚赞曾想加入这个队伍，但是由于奥确处于严密的监视下，他决定留在甘孜附近。

这年冬天，一场激烈的战役就在这个地区爆发了。中国兵从平原带来了马匹，但是在那个地区派不上用场——马匹行走困难，因为它们都上了马掌，总在雪地里打滑。然而，西藏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枪支、刀剑及家中剩余的所有弹药，而且中国的空中巡视再一次发现了他们的所在。不久，他们的弹药耗尽，不得

⁵¹ 大黑天神，传为大日如来的降魔相，是藏传佛教八大护法之一。摩诃迦罗为梵语 Mahakala 译音——译注

不使用刀剑。在这类战役中，康巴人很少投降。要么拼死奋战，要么战死疆场。最后，尽管一些西藏人被俘虏，但大多数人都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瓦术托洛和他的妻子索南卓玛后来也被活捉。中国兵当着其他俘虏的面毒打瓦术托洛，还把他在地上拖来拖去。绳索捆着他的脖子，又沿着手臂绕了几圈，再把双手紧绑在身后。捆绑完毕，把他带到他妻子面前。妻子望着他的脸，知道他已奄奄一息。他一个字也说不出，不多久就死了。几年后，我遇上了索南卓玛，了解到了她遭到监禁的具体细节。

此后，每当人们来到色吉仲日麦波战场，目光所及之处，满地是战马的骨骼、士兵们腐烂的尸体和白骨。浓重的死亡气息笼罩着整个战场，久久不散。



那时，当地有一个中国军官，被我们称为这一地区中国人中最毒辣的刽子手。他是乡长⁵²，比区长低一级，又管军事又管民事。（整个康区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是脱了军装，装上便服的军官）。他的家就在洛巴夏村北的军营外边，我们都把那里叫“住室”⁵³。他经常住在家里，但作为这块儿的要员之一，也经常去兵营和甘孜宗。每当他穿过我们的村子，都显得趾高气扬。他总是全副武装，身后跟着一群士兵。

就是这个官儿，紧跟着第一批共产党军队来到了洛巴夏，随即开始了对甘孜地区藏人的残忍折磨。我这一代的藏人从没有见过如此心狠手辣、老谋深算的人。他似乎是铁石心肠。通过他的

⁵² 原文为 Xian Zhang，当为音译，径译“乡长”——译注

⁵³ 原文 Drushi，当指“住室”。藏人不谙汉语，故把普通名称作专名——译注

所作所为，我们知道了中国人怎样看我们——我们是一文不值的野蛮人——对于非汉人的民族，他们总这样看。虽然有命令禁止他们用“蛮子”这个传统上表示野蛮人的词语来称呼我们，他们还是照做不误。

这位中国官儿不同寻常的残忍行为，粗暴蛮横的本性，对我们身份的诋毁，以及他的一连串穷凶极恶作为，招来了当地人对他的忿恨。在他的管理下，这个地区已变成了一个充满猜疑和恐惧的地区。他对收集珍贵的黄金和猫眼宝石尤其感兴趣，甚至折磨上了年纪的藏人，命令他们交出埋藏在地下的珠宝。一天，我们听到他下命令绞死了一对公开反对中国政策的夫妇，这件事使我们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报复他。

我们通知了藏在他家附近森林中的藏人士兵，告诉他们有多少中国兵在那儿站岗。1956 年底的一个冬夜，贝玛坚赞带着四个士兵洗劫他的家。他们突袭了在外边站岗的哨兵，用匕首把他们刺死。那位中国官儿正悠闲地待在房中，自信哨兵会保护他的安全。贝玛坚赞和另外几个人悄悄潜入房间，找到了那个军官和另外两个当官儿的。他们的枪都挂在墙上，当长长的、锋利的、古老的藏刀在他们的面前闪着寒光，他们一个个面无人色，双手抱头。三个官儿都被干掉了。这次偷袭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所有藏人居住的地区。这次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光芒，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

中国人把那个被杀的官儿称作“烈士”、“自由战士”，是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毛泽东的伟大事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献了许多鲜花，做了许多演讲。他的尸体随后被送回中国，准备接受英雄的葬礼。他死后，盛行在这一地区的酷刑和迫害，在一段时间稍稍平息下来。

一天，我决定去看在甘孜的哥哥奥确。我用衣服把其美暖暖和和地包裹好，我们骑马动身了。他们没有阻拦我见我哥哥，哥哥看见侄子也是喜出望外，这都使我很高兴。但是他们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地方可以私下说话。我和其美走近那座楼里，一个中国军官特别注意我们。也许是看到我一身的破衣烂衫，他提出要付一大笔银洋来买我儿子。我谢谢他的好意，低下目光，摇了摇头。他给我解释说，只要我肯为他做出一些个人牺牲，其美就可以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我一边听，双膝却在不停地颤抖，只怕他看到了惊恐的样子。

那一会儿，我紧紧抱着那刚一岁的孩子，深深地感到他对我有多重要。我和丈夫恩爱一场，硕果仅存的只有我这个一岁的儿子和和肚子里怀着的婴儿了。看着儿子的脸，就看到了他父亲的影子，还有我的影子。其美对我的爱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不能想象他被带到一个别的地方，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父亲，他的血脉；他会和母亲天各一方，在别人的教育下去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虽然那样的生活可能会更舒适，却很可能是活在谎言中。我连忙跑到外边，决计再不把其美带到甘孜来，除非情况发生某种变化。

1957年冬天的一个日子，我哥哥奥确和政治委员会的其它成员被指控杀害了那个中国军官。公告说要把奥确判处死刑。

听到这个消息，贝玛坚赞和另外四个人决定投降。他不想让奥确代他们受死，因为奥确除了是他家的亲戚外，还是社会上一位非常能干、勤奋、务实的青年。贝玛和他的四位手下从山上下来，投了降。他告诉中国人，“我内弟这一段时间一直被监视居住，他不可能与这次暗杀有任何瓜葛。事实上那是我干的。没有理由因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二话不说，手铐就给他戴上了。

那些在场的解放军的官儿表场了他来投案自首，说他做得很好，很快就会释放的。临被带走前，他看了一眼家人。我们的目光接触一刹那之后，他和他的手下一起被押上了卡车。贝玛就这样戴着手铐脚镣被单独监禁了将近一年。

藏在森林中的藏人抵抗战士听说贝玛的事后，引发了另一场战斗。这场战斗非常激烈，躲藏在森林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这一地区只有少数人活下来。

我们的全部希望似乎都已破灭。中国人掠夺了所有的东西。我们想不出他们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我们最坏的预料。战斗中幸免一死的村民在饥饿中挣扎。我们被迫参加政治会议，会上他们向我们灌输中国的辉煌业绩。很庆幸父亲已经谢世，不用经历这些磨难。我唯一的慰藉就是哥哥珠古玛可能还活着，在某个地方地享受着自由生活。



1957 年的秋天，丈夫去世半年，婆婆去世一个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和一些活下来的村民以及这个季节来这里游牧的人们一起回来了。然而，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感觉是来参加那传统庆典的。那么多的亲人朋友死的死，亡的亡，活下来的也是战战兢兢，千难万难。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不得不下山回到村子里了，真无法想像那时我们会如何面对那里的生活。

我和儿子其美一起住在一个帐篷里，离家人不远。姐姐帮我接生了我的小女儿，取名叫扎西坎多。她的出生一下子使我想起了儿子出生时，丈夫给我的体贴照顾。他总在我身边，分享着我的快乐，分担着我的痛苦。但现在没有一个人照顾我和我的孩

子。女儿出生了，丈夫却永远不会再来。两相对比，失去丈夫的事实显得那样可触可感，让人痛苦，让人心碎。我常常为丈夫感到遗憾，他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要是他的灵魂有知，该会多伤心啊！我陷入深深的绝望中，总感觉难以集中精力照顾孩子。有我姐姐色拉玛帮我照看孩子的时候，我总独自一人躲在帐篷里哭泣。

我女儿很漂亮，白嫩的皮肤，红红的脸颊。平时不哭不闹，看上去总那么快乐。看到她的人都会说：“啊，多漂亮的孩子。”在这样危险丛生、局势不定的时候生孩子，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回忆起我自己的童年，我常常寻思，我能给她什么呢？她生到这样一个家庭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第八章 被捕

过了一段时间，贝玛的人里一个叫洛央的被折磨得受不了就松了口，交待说我曾经帮助过抵抗组织。珠古玛的仆人巴觉被召去给汉人做藏语翻译，听到风声，跑到我们在牧区的帐房警告我，说他们可能会抓我；还说，要是我被捕了，以前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或是不喜欢我的人就会狠狠批斗我。他劝我：“不接受汉人领导就得遭罪，你就把嘴巴闭严吧。”他答应我会帮我瞒着点儿，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汉人的统治。

我凝望着四周美丽的草原，心想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看着它们，最后一次感受高山上的自由气息。儿时的我从未想到会离开这片土地，它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属于草原的，就如这花、这云、这点缀夜空的灿烂群星。星光下我们燃起篝火，谈笑风生，讲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想到头戴花环的儿时伙伴是多么幸福，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是多么自由啊！我想起我亲爱的哥哥珠古玛，他对我体贴入微，爱护有加，跟他一起天塌下来都不用担心。我们一起骑马，开怀大笑，分享着非比寻常的相互理解。

我不愿再把恐惧带给身边的人，因此找不到一个人来诉说我心里的恐惧和不安。我没有忘记我丈夫是如何年纪轻轻就死在共产党手里。我知道我像他一样，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等待。

每天晚上我都把孩子们紧紧搂在怀里，不知道何时会被抓走。我紧紧盯着他们的脸，努力记下他们的一切。我随时都有可

能被带走，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或者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身边。小女儿只有一岁大，儿子其美旺加已经三岁了，要跟母亲分开他会受不了。他不记得他的父亲。尽管他还是个小孩子，对我已经产生了某种保护欲。

我想，如果我和丈夫当初能逃到拉萨，儿子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被带走了这个可爱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1958年10月16日，我起了个大早。小其美刚睡醒。我抱了抱他，给他穿上他的黄色小朱巴，系好红腰带，又替他把衣服整理一番。他站在那儿睡眼惺忪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抓着我的发辫。我望了一眼还在睡的女儿，笑了。突然我听到一阵犬吠，掀起帐帘，看到六个汉人武警和三个藏人。“他们是来抓我的！”想到这儿，我的腿开始发软。他们走近时，我认出其中一个 is 珠古玛的仆人巴觉。

一个藏人说：“现在你得跟我们走。”我说我没法去，我不能撇下孩子。话音刚落，一个人冲上来劈头就打，接着又上来几个人。他们对我又踢又打，我的右耳挨了重重一拳。我倒在地上，被人用绳子绑了起来。他们绑我的时候我的小女儿醒了，坐在床上快活地笑着。她一定以为我们是在做游戏呢。

我儿子一直哭个不停，叫着喊着“阿妈，阿妈。”他想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衣服，可那些士兵每次都把他推回去，用靴子狠狠地踢他。我抬起头时看到巴觉哭了。其美眼里满是恐惧，巴觉却无法安抚他。我说什么也不肯走，认定我不能离开孩子，无奈他们就把我生生拖到外面。乡亲们都从帐房里走出来，求他们不要把我带走。可没有用，他们拉着绳子在地上拖着我走了一公里，一直走到甘孜大察尔寺。

他们一路拖着我走，女伴们的哭声和两个孩子的叫声越来越

远。有一会儿，我看到了被吓坏了的儿子那小小的身影飞跑着想赶上来，一边跑一边呼喊着我。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死在那里。

到了寺院，我拒绝合作令他们很恼火。他们抱怨说我不听话，不愿跟他们走。一个汉人警察说：“你只是个女人，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很快你就知道我们谁赢谁输了。我倒要看看你胆子有多大、多强！”

他们把我的手反剪在身后，用绳子绑起来，把我吊在天花板上。我感到手臂快扯断了，胸口闷得发紧。一开始我满脑子都是他们冲我哈哈大笑的声音，之后我就暗暗告诉自己，什么也不能说。我下决心不向他们低头求饶。突然，我感到天旋地转，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巴觉对我说当时我口吐白沫。

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一清醒他们就过来把我拉起来带到院子里。他们说我“不服从”，把我推上一匹马，又把我的手绑在身后，腿也绑上。就这样他们把我送到了甘孜监狱。一路上我身子无法保持平衡，在马背上东倒西歪，每次快要从马上掉下来时，他们就又把我推回去。

在监狱里他们头一件事就是拿掉我的朱巴腰带、靴带、系头发的丝带、念珠，还有我的护身符。这么做自然是怕我自杀。然后我被带到楼下一间关押女犯的囚房。房里的四个女犯人你瞪我我瞪你，什么也不敢说。那里不让谈话，女监给我指定了一块休息的地方，没有褥子，也没被子。

牢房中间放着一个木桶，这是唯一可以方便的地方。牢房长 15 英尺，宽 9 英尺。没水，没电，也没有可以照明的别的光源，只有一个供监管人员窥视我们的小洞。每天上午 10 点和晚上 5 点，有一个人可以出去倒马桶。给犯人的饭又少又难吃，我们也

没办法洗身净面。

有时我们听到外面人们走动的脚步声，偶尔能听到孩子的哭声。这声音总让我伤心欲绝。我彻夜难眠，这时我就幻想着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抱着他们，给他们喂奶，为他们做饭。早晨醒来时，一切都化为乌有，心里不住地问：“孩子们现在怎样了？”

我被捕关押后不久他们就处决了两个藏人。被捕后的第四天清早，我被叫到上面的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五个汉人警察和一名翻译。审问中我了解到贝玛坚赞和我被指控为康区甘孜的抵抗运动的两个主要人物。

当头儿的警察说：“你要知道好歹，赶快招了。要是啥都不说，受的苦可就大了。你外面的孩子没有人照看，如果你讲实话，我们就放了你。”

他们指控我是妇女抵抗组织的领袖，我告诉他们卷进这件事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还对他们说了几条我个人憎恶汉人的理由。我说：“我的父亲还没对你们的政策说几句话，马上就死在你们的医院；我的丈夫是我眼看着死去的；还有我哥哥和姐夫，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让我怎么想？可是没有必要让别人卷进我的事儿里。”那个头头说：“我们已经从你母亲和朋友那里了解了你所做的一切，现在问你不过是形式上的需要。”

参加抵抗组织的会议时，我和朋友们相互发誓决不泄漏我们的行动甚至是彼此的身份。直到汉人把几个参与、了解我们行动的人带到我面前，我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

审讯时我戴着手铐，被他们踢来打去，步枪托砸得我遍体鳞伤。他们强迫我跪在两块削尖的三角木块儿上，双手举过头顶，手臂稍微垂下一点，他们就用枪托打我的胳膊肘。即使这样，我还是什么也不说。

第一轮审讯结束时，那个汉人警长对我说：“你要想清楚是回家照顾你的两个孩子，还是宁愿被判死刑。如果你告诉我们你母亲已经对我们讲过的事，你们的人怎么碰面，谁是头儿，你们还有哪些人，你就能回到家人身边了。”

他们给我三天时间让我呆在牢里考虑，是供出所有抵抗成员然后回到我母亲和孩子身边，还是宁愿因为不合作被判死刑。

我被带到上面，警长说：“现在说说你的决定吧。”我回答说：“你们给我三天时间让我做选择，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我编些话骗你们，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我能怎么样呢？我没什么名字可交待给你们。没什么可说的。”

审讯员说：“你这是自寻死路。”藏语翻译耶希多杰把这句话翻译给我之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警告我说：“如果你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他们会杀了你。”然后审讯员说：“这么说，你还是认为自己很勇敢。”他命令士兵给我拷上手铐，把我带回到监牢。

监牢里的条件很差，地上又潮又湿，房里臭气熏天。这么多天来我不能给女儿喂奶，奶子胀得很疼。我右耳一直痛，听不见那边的响动。老是觉得耳边有孩子的哭声。

因为手被拷牢了，我体会到不能用手有多么不方便，连站起来都觉得困难。如果没有人帮我撩起朱巴扶我站稳，我连马桶都不能上。

晚上我同监牢里的几个女犯会大着胆子小声说上几句话。她们是拉佳、拉摩卓玛、还有卓玛雅措，是和我同甘共苦的狱友。

拉佳来自达吉，是嘉本仓家的女儿，她的家族跟霍尔五部⁵⁴的那些大家族，像桑都仓、恰卓仓等，都有亲戚关系。嘉本仓家

⁵⁴ 霍尔五部，地在今甘孜县境内——译注

也和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臣热振仁波切关系密切。拉佳嫁给了贝理头人家，从那时起她就改名为贝理拉佳。

拉摩卓玛是个尼姑，因为有先知先觉的本领在当地很有名，当地的康巴人策划作战，制定战术时常请教她。他们向她询问在山上何时何地开战，是否该投降等等。因为这她被抓了起来。

我的另一个狱友卓玛雅措，因为 1958 年发生的一件事被抓了起来。当时西藏人用尽了枪支弹药，被迫加入甘孜那儿组建的公社。我们那里藏人的田地、财物、牲畜都被充公，一天要干 12 到 14 个小时的活，还从汉人那里搬来了政治色彩很强的计工分制度。每天社员干多少活都填成表格，换算成一定的工分和一定量的粮食。共产党的政策是要求人们“勒紧裤带”，于是就有了“少吃饭，多产粮！”这样的口号。每个公社都要达到共产党制定的生产配额，达不到的话社员就得受罚。公社的产量超过了生产配额，社员记的分也就高。他们告诉社员，根据挣的工分发钱和票据，可以兑换一定量的粮食和少量的酥油或是别的食用油。

公社要交一部分粮食当农业税，还要以低价买给国家一部分。最后公社生产的大部分粮食都运到了中国。自从实行了公社制度，汉人就开始宣传推广他们喜欢的冬小麦。青稞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不久，就算不在监牢里关押的藏民也很难吃上我们传统的糌粑了。

后来又有了公社食堂，最常见的饭菜就是稀汤寡水加点儿菜叶菜梗。菜也是平常蔬菜该扔掉的部分，比如胡萝卜连着叶子的地方。公社社员一直吃不饱，还有点力气的就得把挣来的粮食分给年老体弱的。那些日子家家都不能有炉子，人人都得到公社食堂做饭吃。

有一天卓玛雅措住的房子着火了，她因为违法有自家炉子还

做饭吃，不但挨了骂而且被人告了送到了甘孜监狱。

犯人被审讯时为了有个交待就说些无关紧要的事，四天后再次提审时我也是这么做的。审讯的警察大为光火，开始对我动粗了。一连四天我都戴着手铐，手还被拷在后面。他们狠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肿了一大块，过了三十九年后还能感觉得到。

我倒在地上，被七八个汉人警察拳打脚踢。除了耶希多杰，其余的人对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有时他们扯我的头发，有时拉我站起来，强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们把竹签子楔进我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把竹签子慢慢地往里插，想要强迫我交代。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家人和朋友的脸孔，现在已经很明白，如果我开口，这样的逼供就会没完没了。最后我疼得昏死过去。

这种拷打开始变成家常便饭。我被叫去审讯，被打了一通后又丢回牢房。监守们都认为我是最不服从的犯人。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向那些汉人供出了他们中的一个，他们最终会问我要其他所有成员和卷进来的藏人的名字。我知道那时我的朋友也将经受同样的关押、折磨。他们也都有父母、子女、丈夫。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一个也不能说。经历过种种残酷折磨和如此多的酷刑，我不能让我的朋友们受这种苦。每天晚上我都会下决心，不管受多少苦一定要保持沉默。

被捕两个月后，洛央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又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了汉人。一天，我被带到审讯室，走进去时我看到洛央在那儿，心头立刻蒙上了一层阴云。我两腿发软，审讯官对我说：“现在你仔细听着，既然你自己什么都不说，洛央替你什么都说了。”

这时，洛央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再没有气力经受任何折磨。他们对他说：“如果你把阿德的事都告诉我们，让她招供，我们就马上把你放了。”于是洛央就说：“阿德，你还是坦白认罪吧，我们在山上时，是你给我们送的汉人的消息；我们把那个共产党官员杀了，是你一直在枕头底下藏把枪，自告奋勇要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可贝玛坚赞不许你参加。”他接着说：“你阿妈教你恨汉人，你还煽动你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干。”

每次洛央说起一件事我就叹口气，意思是他在撒谎。有一回我正叹气时，那些汉人抽起炉边的一根火钳敲我的头，叫着：“你还是不肯认罪！”

我回答说：“你们和洛央都咬定这是事实，我总不能把心剖开了给你们看。洛央说的那些名字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能强逼着别的藏民接受你们的指控。为了给你们一个交待，我就嫁祸给别人，可是人家也不会接受啊。你们想要杀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接着他们再一次说出了最令我害怕的话：“今天洛央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明天我们就把你母亲带来，她也被关着呢。”我心想，这回没有出路了。洛央已经把事情都说了，我母亲也会说的。没有希望了。

我抬眼盯着为首的审讯官说：“杀了我吧。”他们叫起来：“不用你叫我们杀你，你活不成了。”我被他们打了几下，一个大官儿命令他们住手。

那个大官儿走进我，问：“你为什么坚持说自己不是主要人物？贝玛坚赞说你是主要人物，你母亲说你是主要人物，你最好坦白交待，这样才能回到你孩子身边。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想想？不然的话，你的死期马上就到了。”

过了许多天，我又被提审。他们敲着牢门叫着：“阿德，出来！”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他们把我母亲带来怎么办？”我的心砰砰地跳得非常快。我知道贝玛坚赞决不会泄漏半点消息，我绝对相信他。可我担心我的母亲，她老了，犯人要受的那种拷打折磨会要了她的命。被他们又唬又吓的，她有可能把他们想知道的一切都说了。

我走进审讯室，暗暗高兴母亲不在那里。一个官员盯着我的眼睛说：“现在你母亲什么都告诉我们了，洛央也和你对质把你的罪行详细告诉我们了。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回到你母亲身边，另一条路就是被判死刑，不用你告诉我们把你杀了，如果你选了这条路，你就活不了。”

这时我的双手因为连续数月戴着手铐肿得很厉害，连手掌也肿了。狱友们像婴儿一样照料我，喂我吃饭，解手时为我撩起朱巴，帮我站稳坐下。这些事都涌进我脑海里。最后我说：“我很郑重地告诉你们，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能早日回到孩子们身边当然再好不过，可我也不能编造罪行害别人。你们最好马上把我杀了，这也比用手铐拷着我，让我忍受胸部疼痛要强。我不会编故事，对你们的话也没什么好说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从没有被他们关起来，他们只是拿她的名字吓唬我，让我相信不招供是没有希望的。

被关在甘孜监狱的那段日子，他们不许我和贝玛坚赞见面。一开始他被关在汉人建的一间非常小的监牢里，后来他被转到离我不远的一间牢房。

我们牢房里来了一个新狱友布姆雅禄，她的丈夫是抵抗组织成员，她是因为做了和我的组织类似的事帮助她丈夫而被捕的。入狱后她情绪十分低落，对自己曾做过的事非常害怕。她年龄比

我大些，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我感到她比我更需要帮助。

牢房里的卫生条件越来越糟，我们不准用水清洗。那时我没有料到，十一年后我才有机会洗澡。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替换衣服，月经来潮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止住不断流出的经血。我们的朱巴上弄得全是经血，后来等血干了我们就把它刮掉。自然的，我们从没有机会清洗衣服，那件肮脏的衣裙我天天穿在身上一直穿了五年时间。

环境如此不堪说出来真让人脸红。我们这些人从前习惯了户外活动、阳光、广阔的蓝天。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们的景况都一样。外人可能觉得我们过得跟动物一样，可这让我们下决心不降低自己的人格泯灭人性。不管多小的事儿我们都努力做到互相帮助，在黑暗中等待着石破天惊的那一天。



一天，一大早就有人叫我的名字，牢房门外站了很多警察。当时外面天还没亮，好像是半夜。他们解开我面前的手铐又把我的手拷在了身后，我想他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刑场吧。我马上就感到再也见不到母亲和孩子们了，可至少我知道朋友们会照顾他们的。我们爬上楼梯走了出去，一路上我都低着头。

突然我抬起头看到有一群人，十来个藏民，全是男的，手也被拷了。一辆载着武警的卡车开进院子里，他们像装货物一样把我们装上车，武警站在卡车头，我们这些人用绳子捆在一起。车把我们拉到了洛巴夏。

令我吃惊的是那里聚了上千人，比我们村的人加起来还要多。洛巴夏的百姓就站在我们这群人面前，我看到了我的哥哥尼

玛还有许多我们组织里的成员，他们全都哭了。

我们被迫跪下来，头压得更低，不准抬头。每次我想在周围的人群里找出几张熟悉的面孔时，就会挨警察的打。几年以后，朋友们告诉我说，看到我当时的处境之后，他们总牵挂着我，寝食难安。

楚依卓玛、鲍碧、索南俊美是我夫家的佣人，被他们带来打我。后来我知道为了让他们对我下得了手，他们三个一个星期的时间都被灌输“阿德是反革命，她杀死了一个汉人大官”之类的说法，他们用这样的借口好让这三个人恨我，在批斗会上狠狠打我。可是他们三个谁都不愿对我动手，有一个说：“要是她丈夫活着我们会打他的，可是她并没有害过我们。”三个人都不愿打我，汉人就派了一个汉族女兵过来。那个女兵走过来时眼神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站在我身后，猛扯我的发辫，挥着拳头不断打我的右眼，想把我的眼睛打瞎。我感到一阵剧痛，耳朵只听见嗡嗡声。这女兵气急败坏，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我以前的佣人说什么也不愿对我动手。

我们十一个人跪成一行，轮番受到辱骂殴打。我们当中有甘孜的副土司瞎眼巴旦（瞎了一只左眼）和才旺扎西。才旺扎西是我们在洛巴夏的乡邻，他家离我们镇很近。他们两个曾帮助过山林里的武装反抗者。有三个活佛也受到了羞辱。这次的批斗大会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快中午的时候。

那天上午他们给我们松了绑，批斗大会结束后我想拍拍朱巴上的灰尘，这一举动激怒了看守，他们又在我的胳膊上缠上绳子，绑得紧紧的，从两边死死地拉。我手臂里的血都绑得流动不了。就这样，把我用马驮着送回了监狱。

我们被带回牢房之前先是被押到一个屋子里。我试着想挣脱

绳子，却突然昏死过去。醒来后我看到看守们瞪着我，我四处打量这间屋子，看到对面的才旺扎西直直地看着我，眼泪正从他脸颊上滚落。

回到监狱我又被戴上手铐。我右眼被打得又青又肿，只能用左眼看东西。拉佳很担心我的伤眼，对我照顾有加。她坐在我旁边，好心地把我那一份糌粑捏成小块喂我吃。当然他们不准我们互相帮助，但不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过了几天他们传唤我到审讯室，拿我母亲招供了威胁我，然后把我带回监牢去想清楚。不多久又传唤我，他们说：“现在你了解自己的情况和监狱外面社会上的情况了。现在你是社会的敌人。”我当然不相信人民会把我当敌人，尤其是我的朋友们都不愿伤害我。这只是汉人的另一个诡计。

这一轮的审讯持续了好多天，我坚持申辩我是“无辜的”。每一次我都说：“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我还有两个孩子没人照看，我会故意不管他们么？”

一天早上，我和布姆雅禄被叫出牢房带上楼。他们松开我的手铐，手铐因为深深地嵌进肉里很难松开。然后又把我的手用绳子绑在背后。他们把我们用车押到下面的一块儿平地，那里建了一座军区司令部。我们到的时候那儿聚了一大群人，站在最远处的人看上去像一个个小黑点。一块四英寸宽八英寸长的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们被带到司令部楼前一片很大的空地上，那里已经有另外三十个犯人被绑着跪成一行。

不一会儿我听到一阵骚动，然后就看到贝玛坚赞被带了出来。他胸前也挂了个牌子，上面的字是红的，画着一个红叉，而我的字是黑的也没有画叉。他们走过来时贝玛坚赞一直面带微笑，他跳来跳去想甩掉两边的看守，那些看守一只手按住他另一

只手挥着手枪。一路上他给他们不少麻烦。

他们走过来时我们就站起来，那些人让贝玛走在队伍前面，我走在他后面，之后是其他犯人。到了刑场我和贝玛坚赞就被拉开了，面对面跪着，我看到绳子从他脖子上一直缠到手臂，捆得紧紧地，手被绑在背后。因为有绳子勒着咽喉，他说话断断续续，连呼吸都困难，脸也肿了。我俩你看我，我看你，他一直冲我笑着。

被捕以来，我总共见过贝玛两次，都是在出去清马桶时远远看见的，从来没有近到能说上一句话。

一个声音从喇叭里传来：“今天我们处决贝玛坚赞，判决阿德达本仓。阿德达本仓劳改 16 年，永世不得翻身。”

其他人都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子、反抗汉人的暴乱分子等。有被判 5 年的、7 年的，还有 10 年的。

他们把我和贝玛坚赞拉起来，喇叭里响起了汉人音乐，还有一个声音说道：“今天我们要为死去的领导报仇。”我对贝玛说：“快，快向三宝祷告。”他点点头，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两声枪响，贝玛在我面前倒下了，脑浆和鲜血溅到我裙子上。刽子手是从脑后开枪的，这是 1959 年严冬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贝玛遇难时 33 岁。

我浑身一下子没了知觉，我要那些汉人把我也杀了，可他们说：“不，要是我们杀了你，你的下场就和眼前的贝玛坚赞一样，这完得太快了。我们要让你受一辈子罪。现在你知道谁是赢家了吧。”然后他们对着喇叭讲话：“今天你们知道了跟着共产党会怎样，跟着贝玛坚赞和阿德达本仓这些人又会如何。你们说说看谁能救你们？现在你们知道了是美国能救你们，还是达赖喇嘛能救你们。如果你们听我们的，就能过上好日子，不然的话，

你们的下场就和贝玛坚赞一样。”

行刑的场面把布姆雅禄吓坏了，她两腿发抖不能走路。两个看守一边一个抓着她，像当初我被捕时那样拖着她走。回到监狱后她被狠狠地丢进牢房。我想她站不起来也许是被看守用皮靴狠狠踢了一通。我轻声问她：“他们打你哪里了？”她回答说：“他们没有打我，现在我的脚没有感觉，动也动不了。”时间不长，她就完全恢复了。

我被判刑后就不再受审了，只是和狱友们一起在阴暗的牢房里坐了一天又一天。有段时间我很害怕受伤的那只眼睛失明，所幸最后痊愈了。有时我们会在深夜冒险轻声交谈几句，不过说太多是不可能的。

我们坐着，靠听外面的声音猜测都有什么事发生。失去了获取信息的自由，外边的最微弱的声音对我们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表示有人要受刑了，或者表示有送饭的来了，枯燥单调的一天要有一个间歇了；鸟叫声说明外面是白天；只言片语就能传达一点点新闻；如果听到有卡车声，那就意味着一个重大变动正要发生。

我因为担忧我的孩子和家人，也因为对贝玛坚赞的回忆而备受煎熬。他被枪毙以前，我知道他还活着，因为我能听到他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时的镣铐声，那天之后我再也听不到那种响声了。

第九章 “永世不得翻身”

1959年六月末或者是七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个看守给了我们一些蒸馒头和两大壶红茶。每人发到的食物只有一小点，我们一般要喝下许多茶尽可能把肚子灌饱。正在喝茶，听到外面有卡车开过来的声音，突然看守们开始点犯人的名字。我们这间牢房里只有我和布姆雅禄被叫出去，带到院子里的那群犯人中间，然后把我們押上卡车。其他犯人都是男的，其中就有瞎眼巴旦，甘孜的副土司，我们曾一起到过洛巴夏的批斗大会。大多数犯人都是高级喇嘛，我们被两个两个绑在一起，和我绑在一起的是个陌生的喇嘛，上了年纪，个子很高。卡车最前面站着个手持机关枪的武警，还有两个武警爬上来站在卡车后部。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卡车发动了，那几个士兵朝下面车边站着的几个士兵喊了几句告别的话，然后我们摇摇晃晃地朝东南方向出发了。我们都转过头，透过后面站着的士兵的缝隙回望，直到甘孜寺、我们住的山谷、卡瓦拉里山顶一一消失在视线里。车载着我们走了一整天都没有停，也不准我们休息，而一个女人要是在卡车上当着—群和尚、喇嘛的面小便是很失礼的，心中有佛的人绝不会这么做。所以当车在陡峭的山路上颠簸行驶时，尽管我感到极不舒服难以忍受，可还是没有让自己出丑。早知道要走这么长的路，我们当然不会喝那么多茶。十个小时之后，车终于慢了下来，驶离了川藏公路。几个年长的僧侣在车上实在忍不住就尿了裤，我为他们感到十分难过，我知道他们也觉得很惭愧。

车停在了一家旅社门前，一个士兵扶我们下车，其他两人用

步枪对着我们。我们仍旧被绑在一起，缓缓地朝房子走去。点过人数后才让我们去方便。一个年轻汉人士兵把我、布姆雅禄和在卡车上绑在一起的喇嘛解开，把我们俩的手重新绑在一起，带我们到旅社屋后让我们方便。完了，我们走进旅馆，汉族招待给我们端了顿饭，还有热茶。我和布姆雅禄想方设法把饭和茶送到嘴里，一不小心食物就有可能从我们绑在一起的手里滑落。晚上我们就睡在搭起的台子上，算是床，台下烧了火取暖。第二天一大早汉人的讲话声就把我们吵醒了，很快就有人拿步枪枪托捅我们。我和布姆雅禄又分别和男人绑在一起。随后全部的人都上了卡车，又出发了。天晚些时候，车行驶在群山间狭窄弯曲的山路上，一路缓慢下山，最后我们看到山谷里的一座小镇。“你看，”离我最近的喇嘛说，朝目的地微扬了一下下巴，手抬高了一两公分想指给我们看，“我们到打箭炉了。”

卡车开进了纳确寺大院，这座洗劫过后的寺庙曾是当地最大的寺庙之一，如今成了一座监狱，被完全封锁，外人不得进入。我们看到有许多房间都改造成了牢房。大约 60 个僧人囚犯，包括很有学问的格西（获得佛学体制最高学位的僧侣）、活佛和一般僧人，统统关押在往日的会议厅里。非僧侣男犯被关在院子周围一圈的房间里，那里本是上演神圣的羌姆舞的地方。

我们到那儿后每人分到了一块蒸馒头和一杯茶，然后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登记。晚上我被带到牢房，里面关了一群女犯。那里同样没有铺盖，有几个狱友设法带进来了点东西盖。我被捕的时候仅有的就是身上穿的衣服，朱巴就是我的床，袖子被我当枕头用。我躺下来，打量着四周。

牢房约 15 英尺长，9 英尺宽，关押了 16 个女犯，两边各躺 8 个人，每人有一英尺半见方的地方睡觉。牢房正中是个木马

桶，无论是小便或是大便都毫无隐私可言。由于吃不惯这里糟糕的饭食，许多犯人得了痢疾，臭气熏天。我尽力想赶快睡着，可封闭的牢房里熟悉的恶臭令人窒息。第一天晚上，我躺在我那又小又冷的栖身之地，脑海里浮现出这一天的种种画面。然而，疲倦很快战胜了我散乱的思绪，我沉沉地睡熟了。

第二天还有之后的每天早上，犯人们 7 点钟被叫醒，8 点钟我们会分到一碗水一样稀薄的粥，9 点钟在院子里集合，然后在监守的监护下两人排成一队去劳动。通常劳动四个小时后我们会分到点吃的东西。午饭后大多数看守要休息一个小时，犯人要再干四个小时活。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搬石头建新牢房。寺庙不够大，容不下送到这里来的几百个犯人。在纳确寺关押的男囚大约有 800 人，女囚是 300 人。1959 年仲夏，那里一共关押着 1,200 个藏人。

我们从采石场把石头搬到监狱的建筑工地，可能要走上一公里路。石头靠一种木板运输，板上打了洞穿上带子，还有个木头的基座，要放四块石头。一条带子固定好石头，人拉着其余几条带子走。我在采石场的头一天不知道这种工具怎么用。第一次时我拉颠倒了，监守马上冲我吼了起来，跑到我身边开始打我，有几个打我的脸，问我：“你为什么拉反了？这么做一定有原因。你想干什么？”我回答说：“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东西，从没有干过这种活，我怎么会知道？”

相对来说，我还算年轻力壮，这种活对我而言并不太苦。但我忍受着另一种折磨：每天都看到年迈的喇嘛搬运沉重的石块，还要被人用脚踢，用步枪托打。

自从佛教传入以来，西藏人懂得了活着有比挣得每日口粮更重要的事。我们极力领悟生命之和谐，求佛普渡众生，积德行

善。喇嘛们遵守清规戒律，潜心钻研佛法，感悟佛祖之真理。他们用几年时间背诵佛教的经文原理，通过辩论还有数年的苦思冥想，学习如何将经文运用到为人处事之中。现在，这些为我们的人所尊敬的喇嘛竟然被如此作践，这让我和其他犯人感到非常伤心，因为我们都无能为力。

监狱外的西藏百姓也看到了这一幕，见到喇嘛们遭如此虐待，他们哭了。在监狱搬石头时我可以看到外面，看到那些自由的人。我想起了童年，想到和家人们度过的幸福时光，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经受这些？我哭了，总想问个明白这世上怎会产生如此折磨和暴行？对我们如此残忍的目的是为什么？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土地，劫掠了我们的财产、家人、我们的生活、信仰、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然后又逼我们给他们当牛做马，到头来却说我们反对他们是坏人，我们能干什么？

为了能在苦海里活下来，我和狱友们认为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向佛祖和神明祈祷。到了夜晚，我就一个劲儿地祈祷。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了庙里大部分神像和其它宝物都被运到了中国，泥像被砸碎，寺庙的石头神龛被捣毁，木头做的圣物以及所有的经文被付之一炬。庙里的和尚喇嘛和早先关进来的犯人悄悄地向其他犯人讲述发生的一切。人人都渴望探听点消息，迫不及待得找机会交换信息。

搬运石头时趁看守不注意，我和布姆雅禄就偷偷说话，比如告诉对方甘孜监狱最近又出了什么事，又有哪些人被处死了。只是短短几句话就得小心翼翼才行。大多数女囚都很挂念自己的孩子过得如何，我们总是相互询问是否有孩子在外面。女囚们来自西藏不同地区，有康区各地的、安多地区的，还有从大老远的拉萨来的。她们被塞上卡车拉到格尔木和西宁，转火车到成都，再

由卡车拉到打箭炉。每个人都操着自己的地方话，彼此理解起来很费力。一个安多的女犯人悄悄向人打听安多人的事，拉萨人还有卫藏其它城镇来的人寻找是否有知道他们家乡消息的人，牧民们也是四处询问打探。

我们干的活非常消耗体力，大家都饿得没有力气。监狱里的饭又少又难吃，很快我们就对一日三餐一个样儿的饭菜——劣质大麦或是燕麦加玉米面做成的一小杯粥——倒足了胃口。日复一日，囚犯们饿得要命，也吃起了草叶和树根。

我到那里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被赶到寺庙大院里开会。一个叫土登达杰的藏人被拉到前面跪在地上。原来，这个快要饿死的犯人想要吃一个死囚的腿，被汉人医生抓到了。那具死尸最近刚被扔到停尸的木棚里。当着我们的面土登达杰挨了一顿毒打，外加一顿臭骂。该他交待罪行了，他说：“我啥也没吃到，死人身上啥也没有，只剩下张皮，可我连把皮咬破的力气也没有。”此后，他们曾发了这样的通告，藏人除非是接到命令，否则不得到停尸房去。

开完了会，感觉像做了场噩梦，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好像身边的事在慢慢地展开，慢慢地我们走着，好像没了重量，变成了烟雾，连话都说不出了。”布姆小声告诉我她的感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时隔不久，一天下午，我开始感到身体很虚弱，后来在搬石头的时候竟然昏倒了。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听到有哗哗的水流声，想不起自己是在哪儿。我睁眼看到天花板的皱褶和木墙。头沉沉的，扭一扭都很费力。环顾四周我才明白自己被丢到了停放死囚的木棚里。

我随即想起了母亲和孩子们的脸庞，恐惧和孤独感迅速笼罩

了心头。一个人经受了这么多磨难，很难再掉眼泪，所以我没有哭，然而木棚里的景象真是触目惊心。那些尸体看上去只剩一副副骨架，眼睛黑洞洞的，颧骨突出，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令人窒息，在这块地方走路只有掩上鼻子。有好一阵子，我吓得动弹不得，又叫不出声。最后我慢慢从死人堆里挪了出来，跪在一个角落里。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声，是几个来处理尸体的人。他们打开吱吱嘎嘎勉强支撑着的门，光一下子照到我脸上，他们看到一张活人的脸，都大吃一惊。“这是什么？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他们问。我什么也说不出。一个西藏人对他的同伴们说：“她一定是昨晚我们扔到这儿的最后一堆里面的。”两个男的扶我站了起来，另一个指着那些尸体平静地说：“看，扒下衣服后除了头看上去非常大，别的全是皮包骨头。”尽管眼前的景象这些人已经习以为常，可还是对要面临的工作感到又震惊又悲伤。一个男人看着我说：“来吧，在马车回来之前你就坐在那边晒太阳吧。”

打箭炉市郊是三条公路的交叉口：向西去的米纳塔果通向米纳拉嘎冈地区，向东的嘉义塔果通向中国，还有向北的雅拉塔果穿过山区通往甘孜。三条公路上都有驻军，要想出入打箭炉又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犯人们在向北的那条公路上边上，离监狱不远处挖了一个露天深坑，枪毙的和饿死的囚犯尸体都扔在里面。每天饿死的犯人至少有 10 到 15 个，卡车每 24 小时就来把尸体拉到露天坟地去。这个坑填满了就封上土再挖另一个。

几天后我又能像平常一样活动了，我被转到猪圈干活。我高兴地发现没过几天我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因为我可以偷吃点猪食。汉人喜欢吃猪肉，在每座监狱和劳改场都盖了猪圈，猪养肥

后就杀了供他们吃。

那时我看到监狱里许多喇嘛都在挨饿，很多年迈的喇嘛都受不了派给我们的体力活。到了最后那些年龄最老的喇嘛被关在牢房里，只有年轻点的被叫出去干活，分给老喇嘛的伙食减少了很多。于是，我开始带些猪食放在喇嘛们看得见的地方，每天他们出来两次倒马桶，看到看守不在我就打暗号给他们，他们就把猪食捡起来吃掉。

在那样的环境里，有一天我再次遇到了我们家的宗师，群培嘉措仁波切。他跟我父亲和哥哥珠古玛交情非浅，我父亲死后他曾给我们家写信，告诫我们要牢记父亲那些关于西藏未来的话，并建议我们早做安排，不宜久留。信是由甘孜大察尔寺的一个喇嘛带来念给我们听的，可惜信到我们手中的时候要逃走已经太晚了。为了不给我们的精神导师带来任何麻烦，那封信被销毁，谁也没有对外人提起。

1957年汉人命梁茹所有喇嘛都要出席在雌龙关举行的一次会议，那些官兵们从与会喇嘛中选出最受人们尊敬的，逼他们穿上女人衣服，进行长时间的公开批斗。群培嘉措也在其中。那时梁茹有六十多座寺庙，和尚、喇嘛都被囚起来，大多数送进了监狱，再没有活着出来。群培嘉措先是在梁茹监狱关了一年，然后又转到了打箭炉。

群培嘉措碰到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无论何时他戴上手铐，手铐就会自动解开。他害怕挨打、怕看守找茬儿说他是故意的，就想把手铐再锁上，可怎么也锁不上。他求看守锁上手铐，可马上就又开了。后来看守也就不再要求他戴手铐了。



批斗囚犯之前要先审问。审问开始，汉人总是拿犯人当小孩耍。他们说：“你把干的事招了，明天就能回家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了。”然后又说：“如果你把打算逃离西藏还有反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藏人名字告诉我们，我们就放了你。”通过承诺种种好处，他们诱使一些犯人在监狱里给他们做内线。

有一次，一个给汉人通风报信的藏人发现我给喇嘛们吃的，告发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在纳确寺受批斗，我被带到一大群囚犯面前，狱长要我跪在削尖的木头上。宣布了对我的指控后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决不会理解我的想法，在那个时候不做任何反应是上策。于是我就一声不吭。他们对我又打又骂，翻译在一边絮絮叨叨地说我帮助罪犯，说我是毛泽东的敌人。

第二次批斗发生在我和其他九个犯人被派去清理军用卡车车库之后。我们注意到卡车满载着佛像和其它圣物，打算运往中国。大部分犯人吓得不敢抬头，不过有几个人却仔仔细细地四处打量了一番。我们把看到的告诉了别的几个犯人，不知怎么就被汉人知道了，于是我们就成了批斗对象。

第三次批斗和两个新到的德格地区的藏人有关。他俩在战斗中伤了腿，落在了后面。一天，我正在猪圈干活，听到有人用康区方言叫着“阿罗？阿罗？”，意思是“嗨，你好。”起先我朝四周看了看，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声音。后来我又听到了“阿罗？阿罗？”，我循着声音走到猪圈旁边那座房子的一扇窗户边，从窗户里望进去我看到有两个人，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很快他们当中的一个问我：“你是珠古玛达本仓的妹妹吧？”我哥哥和我模样长得很像，大多数人见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感到一阵恐惧，哭了起来。我一直都在为哥哥祈祷，我担心他

已经被杀害了。

那个受伤的人对我说：“别哭，达赖至尊和你哥哥都已经平安逃出去了，他们到了自由国家——印度。可惜我们不能跟随他们一起逃走，我们的腿在汉人轰炸边境地区时受伤了。汉人把我们抓住，现在靠给我们注射一种针让我们活着。别的治疗什么也不给做，只是利用这点机会审问我们，这就是他们让我们活下来的唯一理由。”

我为他们的遭遇和无助的境况感到难过，于是我一有机会就往屋里扔些吃的东西。我把吃的扔到他们胸前或是手能够得到的地方。

监狱里的藏人谁也不知道达赖至尊去了哪里，得知他逃了出去，我哥哥也自由了，我简直喜出望外。我们大家一直都很牵挂达赖喇嘛的安危。从卫藏来的囚犯告诉我们，拉萨形势日趋严峻，我们都向神明祈求保佑他的平安。

从 1954 年年末，我就再没见过我的哥哥珠古玛了。最后一次联系是在“民主改革”前夕的一次通信。有好几年我都担心他已经死了，再见他一面是我的一个奢望，它给予我力量让我熬过了这些漫长的白天和痛苦的黑夜。现在我确信总有一天能够梦想成真。

我开始反复吟唱一支父亲教我的歌，是由一条有名的格言改编的：“假如今天下大雪，千万别忧伤，大雪过后，太阳会更明亮。”

我无法直接把达赖平安无事的好消息告诉狱友们，于是就在喂猪的时候停下来把这两句歌唱上好几遍，然后接着干活。狱友们一听到歌声就想凑近了听歌里唱的是什么。

不幸的是这件事让一个囚犯给汇报上去了。汉人曾经向这个

囚犯许诺：“只要给我们递信儿，就把你放了。”这个人终于没能抵挡住诱惑，他告诉监狱办公室的人：“那女人唱的歌有意思，犯人们听后非常开心，他们好像在分享什么秘密。”一群当官的和一名看守来到我干活的地方，拿起一个喂猪的小食槽命令我跪在上面。然后一个看守打我的手肘，喝令我高高举起手臂。我就以这种姿势接受审问，一连跪了四个小时。一个当官的说：“第一次，你不喂猪而是把猪粮给喇嘛吃；第二次，派你去打扫车库，你不干活却偷看车上的东西；第三次，你唱那些歌妄图诱导其它犯人死抗到底。歌词是什么意思？更幸福之时是指什么？”

我一口咬定说那首歌没别的意思，只是一首歌唱自然的老歌，是小的时候父亲教我的。我反问他们：“失去了一切，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更幸福之时呢？”那个当官的说：“犯人里头就数你坏，你是所有人当中最反对改革的顽固分子。这座监狱的女犯里你罪恶最大，要是你还不悔改，就等着吃枪子儿吧。”他要我“好好想想”，然后我被提溜了起来（因为我的膝盖被打伤正流着血，根本站不起来），连拖带拽丢进一个小屋里。他们警告我好好想想这些事的后果，随后让我一连蹲了好几天的小号。

回到牢房后，布姆雅禄和我一有空就谈话，我总给她打气。我们从一个狱友那儿得知她丈夫已经逃了出去，现在住在尼泊尔。我告诉她活佛达赖喇嘛已经逃出去了，我们过上好日子还是有指望的。依靠国际上的支持，达赖和追随他的藏人有能力把共产党赶出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像从前那样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两个人还讨论着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土地从汉人手中夺回来。

群培嘉措仁波切总是安慰、鼓励我。他曾说过：“我们经受的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必须坦然接受，要坚信真理就是它本身的

见证。”



每天晚上要两个小时的再教育大会，让我们害怕。会上犯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指控，也许是某个犯人说了几句经文被人听到了，或者是有人干活不卖力。这种会议常常变成了统计会，因为那些当官的在会上滔滔不绝地谈他们研制的各种炸弹的名称。他们说：“美国都没有这些炸弹，只有我们有。”这些说法很难让我们信服，因为我们听说过投在日本的原子弹惊人的破坏力。汉人还对我们说他们的军团“取得了这个”、“配备了那个”。他们说：“我们发现了新油田，像水一样遍地流得都是。地大物博、储量惊人。”

他们还说：“我们在西藏发现了许多种药材。我们需要草药，你们需要钱。我们的药是出了名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求着我们要呢。”我们不相信他们会给我们的百姓钱。他们如数家珍地讲着中国出口挣了多少钱，从世界各国收到了多少订单。

反过来倒过去，开这些会的目的就是让犯人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走在世界前面。给人留下了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中国相比的印象。这些就是教育的基本方针。

监狱长张苏队（音）是共产党官员里少数几个能说一口流利藏语的。他是四川一个国民党门房的儿子，共产党当家后他不知怎么就被提拔为高官。他三十不到，圆脸、凸眼，对年轻、漂亮的女囚很感兴趣，常叫她们给他打扫房间、洗衣服，然后乘机一再强奸她们。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除了我，还有另外三个也让挑选上给他干活：一个是囊措旺姆，家住靠近理塘地区的灵卡夏；另外两个是卓嘎和央钦，俩人老家都是乡城的。我们轮番被他叫去强奸。害怕我们怀孕，完事后他逼我们马上喝麝香水，他威胁我们谁要反抗就会被狠狠修理一顿，甚至被打死。我们只能屈从，一句话也不敢说。

对我们来说这是最不堪的事。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家人和孩子生死未卜，我们的人成了做苦力的努力，但是我们被逼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无法忍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越来越恨张，他总是残忍粗暴，故意说些让我们难堪、无助的话。尽管这种行为表面上违反共产党的军规，却没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说话。向上级汇报？想都别想，结局一定是把我们关起来，饭也不给吃，更何况张苏队本人就大权在握。

无法安慰自己，我们就把每一次都当做一次死刑。有人被叫走了，其余的人就为她的不幸遭遇流泪。我们尽力彼此劝慰，过了一段时间，张开始害怕我们会说出去。我们注意到他看到我们偷菜会转向另一边，假装没看见。每天晚上的夜校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是被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政府解放了，我们坐在那儿，心里想的就是这些遭遇。

群培嘉措仁波切为了安慰我，常说：“你一定要记住活佛达赖喇嘛已经逃了出去。尽管我们正经受最艰难的时刻，他们要想毁掉我们的信仰和文化是不可能的。藏族佛教教义最终会有盛行的一天。”

监狱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七位仁波切在同一天死去。没有发现是外力致死，看来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这件事让汉人吃了一惊。这七位仁波切中包括群培嘉措仁波切和来自靠近甘

孜地区的纳耶和绒坝岔镇的东果尔夏仲。



1960 年秋的一个早晨，我们正在干活，突然一辆辆卡车开进大院，车上下来了许多医护人员，我们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他们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排成队，然后有人记下每个人的基本资料，比如哪儿来的、被判了几年等等。当然这些事他们都一清二楚，全都在他们手上的报告里。这样审问是想看我们说的是否属实。每一个藏人被逮捕、判刑、随便到哪个监狱蹲监或是劳改队劳动，都会有一大堆文件档案。

这天早上医生和军官们跟犯人谈完话，又检查过我们的身体后，我们全都被叫到大院里。他们叫着：“集合了！”意思是所有囚犯要迅速集合。他们对我们说：“叫到谁的名字谁就站在这边。”三百个女囚有一百人被叫到了一边，我也在其中。

他们告诉我们：“你们这群名字被叫到的，会去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在那里单是水果就能把你的肚子填饱，不用再吃别的东西。”一些人听了这话信了，很开心。我却告诉自己：“谎话，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残酷的暴行。”我什么也不相信，只是默不作声。

我们和其他犯人隔离开，不许再有接触。我只能匆匆瞥了一眼我的朋友布姆雅禄，我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带上我们自己的东西——谁的东西都不多，也许只是几件衣服、一个碗、一只杯子——我们准备上路了。我只有一个杯子和身上穿的衣服。

离开打箭炉时我们排成了两行，前后左右都有士兵监守。我们五六个或六七个一群被绑在一起，谁也不能脱离队伍。白天一

直都在赶路，直走到一座名叫“恰松”⁵⁵的桥边才停了下来在那儿过夜。过了一会儿，有士兵给我们每人一杯稠粥和一块蒸馒头。我因为天冷又无法入睡，这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

我唯一的渴望就是从桥上跳下去自杀，看守们接到指示，谁敢跳桥，格杀勿论。绳子绑得很紧，怎么也松不开，当然，我也明白自己的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会连累到那些和我绑在一起的人。过了桥又经过四天的艰苦跋涉，有时候要穿过很难走的隘口，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果塘嘉果。路程并不太远，但由于没有吃多少东西，我们都没什么力气了。

⁵⁵ 恰松，藏语意为铁桥或铁索桥——译注

第十章 果塘嘉果

第四天，我们沿着陡峭狭窄的岩石小路，缓缓上山。走了一会儿，看守们指指点点，互相叫嚷着：“果塘嘉果”。朝着目的地行进，一会儿便被延绵不断的大山重重包围，那情景给人极深的印象。傍晚时分，顺着险峻的山路而下，远远向山下望去，终于看到了劳改营，整个营地由三座山围了个严严实实，到处弥漫着荒凉和挥之不去的孤独感。离营地越来越远，看到谷底劳改营中的囚犯，像蚂蚁一样，来来往往，穿梭不停。终于，到达了营地，走进大门。

看看四周的囚犯，好像都是藏人。后来才知道大约有四百汉人囚犯也被关在此地。

囚犯的脸个个看起来都像骷髅，深深凹陷的双眼，瘦棱棱的颧骨，行动异常缓慢。转念一想，我明白了：“噢，他们是要把我带到这儿受死。那些囚犯看起来就像来自饿鬼之乡。”

环绕监狱的是混凝土高墙，四周隔一段就是一个瞭望塔，里面是站岗的士兵。我没见到他们如何安置这批从打箭炉来的二百人，但是，最初所有的女人都被带进了由木板、稻草、小树枝搭成的茅屋，随便找了个地方，疲惫地躺下来。我们感到十分恐惧和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变得和果塘嘉果中那些不幸的人一样。打箭炉的记忆已经够悲惨了，可是面对着眼前的现实，那些记忆显得算不了什么了。我本来就不期待这次换监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命运的残酷依然让我浑身冰凉。

晚上，我们被带进了一座长方形混凝土建筑，里面有一个个

的小隔间，押着一批十个、二十来个囚犯。接下来便是漫长饥饿的夜晚，有一会儿，似乎身体已不再是自己的身体，我不再感到双腿疼痛、饥饿难耐，慢慢地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有人把我们叫醒，领进了一间宽敞的房间，发给每人半杯照出人影的玉米掺合着燕麦的稀粥——这样的饭就是我们全部的营养来源，直到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天天都吃。朋友和我个个变得迟缓愚钝，对周围的一切迷惑不解。回头看看一排排就座的人们，不管向哪个方向看，清一色是脱了人形的囚犯。

身旁的一位妇女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不太愿意同其它囚犯交谈，即使与离得最近的囚犯，中间仍有一段距离，囚犯们个个无精打采，真难想象我已是其中一员了。

在我们来之前，劳改营中已经押了很多囚犯，据估计大概有一万到一万三之间。虽然劳改营是1959年初才建立的。

我们慌慌张张吃过饭，管事儿的要我们立正站好，一个中国军官过来训话。他一边讲，一边由一位西藏看守用扩音器为他翻译，告诉我们在劳改营该做什么。“把你们这些囚犯带到矿区，是给你们提供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你们赎回自己对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你们不理解把你们从旧的、邪恶的道路上解救出来的重要性，不理解旧事物一定要灭亡，要为新事物的发展开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很快会建立，使你当家作主。现在你们在矿区劳动，正是为新中国做贡献的机会。”那位军官看了一下囚犯中的新面孔，击掌为号，喊到：“集合！”

之后，全副武装的看守押解着我们前往矿区。果塘嘉果是一个边界地区，离成都不远。劳改营就在山脚附近，矿区内挖了一条长长的坑道，很多囚犯在开采铅矿石。我所在的小组只能守着

坑口，不得到处走动。囚犯们用扁担挑着两筐满满的铅矿石，送给在坑道口等待的囚犯。他们也给了我们同样的篮子，让我们挑着，把铅矿石送到矿井那边的几个地方，那里有囚犯负责分离矿石。在矿区附近干活时，我看到里面有些囚犯拿着锤子和铁凿，把矿石从石壁上剥离下来。我从没有听到矿区传来任何机器的噪音，但很难说这儿没有机器，因为劳改营附近有两条湍急的河流，一条就在营地边，水流很响，人们说话都要扯着嗓子，否则，什么也听不到。整整一个星期，我没和任何人说话，除了给我分派任务，也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话。

接下来那一周，我被安排到山下半公里处劳动。含有青色生铅的矿石相当坚硬，很难分离，只要有铅石从山上运下来，囚犯们就十个人一组地被派去用锤子将铅石敲成粉状，将铅从石中分离出来。开采出来的铅被送往“恰桑卡”（汉人叫“泸定县”），然后用卡车运往中国内地。

囚犯们干活时从不交谈，都在保存体力尽力完成所要求的开采任务。完不成的囚犯只给半顿饭，有时根本没有饭。军官会说：“你没有做完工作，有什么资格吃饭？”

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这儿只有两种囚犯：健康的囚犯和健康极剧恶化，来日无多的囚犯。干活时要去厕所必须先喊：“报告解手！”然后等待看守许可的眼神。不能直呼看守的名字，协议上已经写明我们是低下的流放者。看守示意收到你的请求，你才可以离开。否则，必须在那儿等着，直到得到指示。有时，我报告解手，看守没有理睬，我就在看守岗旁边就地解决。连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随随便便、反反复复地拒绝，我非常气愤，成心想破破他们这个规矩。

劳改营的时间安排是上午劳动四个小时，午饭后再劳动四个

小时，晚上参加两个小时的再教育会议。会上他们经常告诉我们：“毛泽东是每个人的父母，”因为他帮助乞丐和穷人。还说：“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了，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喊：‘我们也需要像毛泽东那样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俄国跟中国作对。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达赖喇嘛能从外界得到帮助，做梦都不可能。达赖已经黔驴技穷，只能向美国人摇尾乞怜。美国只不过是名字，不过是只纸老虎，看起来非常吓人，把它扔到水里，一下子没了。”

“你们这些囚犯，要过上幸福生活，必须要听党的话。仇视、憎恶共产党，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他们一再向我们灌输的主要思想。

除了晚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再教育，我们还经常受侮辱，许多人被批斗。中国人对政治犯异常残酷，却根本不关心政治犯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被囚禁的第一月里参加了一次会议，他们叫出一位藏族囚犯，宣布：“这个人为谋私利犯罪，但现在他已经承认了过错，已经被完全改造，不再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还发誓要与“坏分子，坏行为”做斗争，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反革命罪犯在监狱中的谈话，我们决定释放他。”然后，当着所有囚犯的面，释放了那个囚犯。



坐监的这些年月，我一直努力向我的保护神——度母祈祷，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无法集中精力背诵父亲教给我的、长达二十一节的祈祷词。或许是饥饿导致心力不济，祈祷时脑子里有时

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起来，实在令人懊恼。空闲时做祈祷也有问题，就是总被看守或别的囚犯打扰。

一次，我终于有了机会向一位被抓的喇嘛嘎塘司徒仁波切请教这个问题。嘎塘司徒仁波切是宁玛派的喇嘛，来自嘎塘贡巴寺，位于昌都和德格之间。他工作之后曾继续在拉萨深造。眼前的一切他都默默地接受，对我们这些人实在是一种慰藉。他依旧穿着喇嘛袍子，虽然已经又脏又破，这也给了我们不少的安慰。有时我着他，只见他注视着囚犯们互相配合地劳动，从他的表情上看，我知道他在为囚犯们祈祷。他的眼睛，与其他囚犯那毫无生气的眼神截然不同，像鹿的眼睛，宁静深邃，洋溢对周围一切事物的兴趣和慈爱。我去找他时，很害羞，但心里明白他或许根本不会介意。听我讲了我的困境，他很感动，缓缓地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做传统的修行，我教你一篇短祈祷词，你可以用同样虔诚的心来背诵。在目前情况下你仍然如此看重精神信仰，真让人高兴。”然后他教了我一篇简化得只有九行的度母经。后来，不管是面临审讯或是身处孤独，这个经文都成了我心灵的避难所。



连续几个月的劳动，我越来越虚弱，一次，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我知道这儿的规矩就是你只能干活，不然就挨饿，甚至饿死。我觉得自己已经是无牵无挂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最后，一个看守拿着枪来到我的监狱，问我：“你在干什么？大家都去劳动了，你为什么不去？”

我回答说：“我不能去。没力气。肚子里没一点食物，干不

成活。”

他一听就想拽我的头发把我扯到监狱门口，准备掏枪威胁我。就在他拿枪的一瞬间，我想：“是时候了。”亲身经历的巨大折磨、姐夫被处死的场景、发生在甘孜和打箭炉的逮捕、暴行，一切都历历在目。那一刻，我明白了：“就让他们把我打死吧，死了也比继续受他们的折磨好。”我扯开朱巴，指着胸口，喊到：“好啊，来吧，打死我！”看守被震住了，没有开枪，却把我打倒在地，用靴子踢我的臀部和腿。我倦成一团，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他踢完。踢完最后一下，他也没说什么话，站在那儿看了我几分钟，走出监狱，呼地一声关上狱门。

我仍然决定不去劳动，但是囚犯们个个都饿得半死，这种方法没什么用。我只有一个想法：“我会死在这儿。”我从衣服底部扯下一条布，打了一百零八个结，做成一串念珠。我觉得修行是唯一要做的事了，单独囚禁的时候，我一有精力就背诵度母经。

有时背着背着，昏了过去，醒来后，试着边走边背，又摔倒在地上。直到我再回去干活这段时间，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吃的，对我说：“只有你去劳动，我们才能给你东西吃。”最后，有一天，我感到不应该强制结束我的苦难。我想到了那些同样处于同样境况的其他狱友，想到了我的家人，想到了那次在打箭炉被扔在死人堆里，多么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啊！我决定再去劳动，我别无选择。



囚犯中还有一位来自我们梁茹某地的藏人。他知道我曾嘲骂

监狱看守让他杀了我。一天，我还没被解禁，他也决定不再劳动。他报告解手，看守没有回头，认为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不是要找麻烦的人，心不在焉地给了许可。这位藏族囚犯快速走到看守后面，没有解手，拿起一块尖尖的石头砸昏看守，迅速夺了枪，脱下朱巴，换上看守的衣服，设法逃跑了。

共产党派了很多搜查小队也没能抓到逃犯，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一个官员指责我在煽动，教唆他，说：“这个女人拒绝劳动，想让我们杀死她，非常可恶，但是我们不会杀她，我们就是要她活受罪。”然后，一个官员宣布：“我们已经抓住了那个囚犯，已把他处死。”我们知道这是撒谎，按常理，每当他们抓住逃犯，枪决后，会把尸体展示给大家看。

渐渐地一些没有完全屈服的狱友开始和我交谈，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曾拒绝劳动遭到惩罚。由于中国人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罪该万死的囚犯，无论何时何地，我与他们接触都十分小心。有新的囚犯来和我说话，我至少要花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去了解他们的出身、背景，再确定能不能信任他们，能不能和他们谈话。

我认识了一位汉人囚犯，很幸运，我们成了朋友。她名叫喜，来自成都，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跟国民党关系很近。整个人怪怪的，有些暴躁，或许她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喜很痛苦，被自己的同类这样关押着，她的感受我能想象出。喜被抓前，她的哥哥曾经公开批评共产党，被说成是“思想反动”，就设法逃到了台湾。共产党把他们家划为最严重的一类反动派，不久，全家被捕，财产全部没收，被判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很胖，之后，当然，大家都一样了。她过去常对我说：“以前我胖的时候，大家都叫我‘胖子，胖

子’，可是现在，瘦成皮包骨了。”

喜跟我很合得来，因为我总是不愿服从命令。一天，通过一位会讲中文的藏民做翻译，她拉着我的胳膊说：“你让那个看守杀你时，他愣住了，因为他们有命令，必须让你受尽折磨。看到他这样吓住，真令人高兴。那个看守走出你的监房时，脸气得涨红，直踢墙。好在我当时没挡着他的道。”

我们成了相当不错的朋友。她人很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关心别人。她教我学汉语，对我帮助很大。一起劳动时，她经常边指着实物，边说出汉语名字。比如，指着一只水桶让我拿给她。我们离开果塘嘉果，在另外两个劳改营时，她仍这样教我，效果非常好。

喜总是想反对共产党。有一次，囚犯们听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虽然两个国家一度关系密切，在传播共产主义理念的方法上分歧越来越大。或许是因为两个国家都在为各自打算，希望通过共产主义控制整个世界。最终，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称俄国人是“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可以通过一些非暴力手段实现。这条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囚犯，希望这样能多少削弱些共产党的嚣张气焰。



一天天还没亮，我们三十来个囚犯被集合在一起，他们说让我们去稍远的地方劳动。黎明时分，我们由五十个士兵押着，离开劳改营走进山区。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士兵威胁我们，有谁不守规矩，当场枪毙。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没有绑在一起。一路上，喜和我默默地相互扶持，艰难跋涉，我总在想会不会在路上

碰上藏人，他们看到我们会怎么想呢？但是虽然看到了远处有些人家，却没见一个人出来。我们的目的地是座大寺院，藏名叫“果塘贡巴”。踏进寺院，立刻让我觉得阴森、恐怖。虽然整个寺院外观维护得很好，却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寺院迹象，连个僧人的影子也见不到。整座寺院一片荒凉，当地公社把寺院当仓库，贮藏玉米。

我们这组人是劳改营中第一批被派去收玉米的，也是最后一批。因为人人饥饿难耐，收割时总是一声不响地吃生玉米。看守发现我们吃玉米，嚷道：“你们不是在劳动，是在偷吃。”他们叫喊着，毒打我们，逼我们赶紧集合，离开收好的庄稼。喜气急了，向地上吐着口水，诅咒说：“要是命定要生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不如生成一头猪。虽然迟早都是死，但是至少还会给喂点儿食。”

我们尽量赶在天黑前返回营地。但是因为不习惯长途跋涉，喝了过多的水，吃了生玉米，肚子开始发胀，背着沉重的玉米麻袋，行走更加困难。第二天大部分人都患了腹泻。那天晚上，我勉强睡了一会儿，胃一个劲儿痛，我紧紧捂着肚子，尽量让自己放松。闭上眼，梦见自己在寺院游荡，召唤着能有人来，却不见一个人影。我穿过黑沉沉的寺院、经堂，走过大寮、庭院，回答我的呼喊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沉寂，我不知道人们都在哪里，都出了什么事儿。

去寺院那次，我注意到了一位年轻女尼，名叫伊尕，来自康区的道孚一带，一路上她没说一句话，总是少言寡语，哀伤地默默看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总想和她说话，多少帮帮她，但我又能说什么呢？那个时候，任何的鼓励都会显得很无情，很荒谬。每个人都要面对内心的矛盾，都有坚强与脆弱的时候。虽然

承受着同样的折磨，每人都独自寻找着自己生存下去的理由。伊尕被派到菜园捡石头，当时我没有什么活儿干，时不时地被派到菜园去帮忙。我身体虚弱，根本无法走路，只是坐在那儿，有时远远地看着她。

伊尕总是尽量避开看守，走到菜园靠近河流的一个角落。看守看她时，她低下头，假装忙着捡石头。大概这样持续了一周。一次，她走到离河边最近的地方，等看守离她足够远的时候，女尼向我这边望了最后一眼，又望了望看守，跑过去，跳进了急流中。我坐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尸体被卷走。

像每位囚犯一样，她一直深受压抑。汉人诋毁西藏的宗教，最先针对的就是僧人和尼姑们。饥饿当然是另一个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有佛教教义，认为人的肉体是最大的恩赐，自杀是极大的罪恶，她还是认为结束自己的生命会更好。

那时，囚犯们都这么想。60 年到 62 年，境况最差。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出人类竟然可以如此生存下去。听说有一场灾荒，但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原因，我们不理解，按照中国的农业政策，西藏多种了那么多庄稼，而这么多人却仍然饿肚子。



果塘嘉果厨房内有只大木桶，盛着发给我们的汤水。囚犯们个个虚弱无比，走路都要拿木棍当拐杖。一领到稀粥，当场就喝下去，怕端着碗走开，保不准走路时滑倒洒了汤，洒了就洒了，没人会再给你。看到囚犯们摇摇摆摆，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移动，不由得觉得是在看鬼魂跳舞。

汤分完后，厨师把锅往囚犯中间一扔，尚有力气的囚犯马上

冲上去抢吃的。一些人把整只手都放在锅里抹，抹完再舔舔手，有的只用手指抓些东西。

囚犯们有的把锅拉到这边，有的又拉回到那边，为了最后一点点吃的，你争我夺。看守们站在一旁饥笑，嘲骂。那时，我身体虚弱，无力去争，只能看着这一切。看守们的所作所为令我愤恨，却又无可奈何。

那时候，我们大多数都吃过鞋底。鞋底是一整张厚厚的皮子，我们用石头敲打鞋子，把鞋面和鞋底顺着针脚撕裂开来，再继续敲打鞋底，让皮变得柔软。一有机会，就拿出鞋底大嚼，总算能吃些硬实的东西，大家已经心满意足。鞋底分割成小块分发给大家，大家就这样嚼着，嚼到最后就软得可以咽下了。

或许果塘嘉果中最痛苦的考验是看守虐待囚犯，从中寻乐。有时，看守和官员们在地上倒些茶叶，堆成一小堆，然后在附近再倒上些茶叶，囚犯们个个饿得要死，几乎每个人都争着去抓些茶叶，但又没有力气，拿茶叶时摔倒在地，打成一团。最后，终于有人凑到了茶叶旁，抓住就吃，脸和嘴立刻染成一片黑色。官员和看守站在那儿不住鼓掌，怂恿着一个又一个的囚犯。他们个个兴高采烈，相互推搡着，大笑着，比划着，欢呼着，

有位藏族看守我们叫他丹增图塔，“图塔”是一种头衔，大约相当排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前，他曾是康区巴塘地区的乞丐。丹增帮了囚犯很大的忙。我们偷蔬菜、偷猪食，他总是假装没看见。中国人拿囚犯取乐，丹增独自站在一旁，看上去很不高兴。他站着，紧握双拳，一脸怒气。我很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很明显，他不是一位无情无义之人。他过着舒适、安全的生活，但眼前的景象却在不断提醒着他，自己的同类正承受煎熬，自己就是从这些人中出来的。他独自站着，目睹着中国共产党是解放西

藏的许诺到底是什么货色，但却无能为力。我并不羡慕他。



劳改营中那几个中国囚犯从地里挖出了两种虫子吃。营中到处都是蟑螂，但很难捉到，蟑螂跳得很快，很多囚犯还是想尽办法去捉一两只，一把捏碎吞下肚。我无论如何也吃不下蟑螂，但见到绿色的小草小苗，抓起就往嘴里填，也不在乎有毒没毒。菜园戒备森严，只是偶尔可以从中抓些吃的。饥饿将人折磨得近乎疯狂，不眠之夜里，只有睡着那几个小时能忘记饥饿。就连睡着，都梦见吃东西。夜里，经常可以听到弥留之际的囚犯说胡话：“能再给我一些糗粑吗？请给我一点面包，一杯茶。”也有呼唤达赖喇嘛的，求他在离开人世的时刻保佑自己。

最初，我们非常担心缺乏营养会导致四肢无力、精神不集中。劳改营中人与人交流很困难，后来，即使有了机会，大家都已虚弱不堪，为了保存体力，个个沉默不语。最后，胃部剧痛不止、随之全身虚弱，脑袋里所有的想法都变得晦暗模糊。只是想着如何可以站着不倒，如何左扭右扭地向前挪一步，如何在寒风彻骨的夜里睡着觉这类事情。早上醒来时，经常发现身旁能多少借些热气的狱友已在睡眠中死去。为了让自己勉强活下去，我订了些小目标：扯掉朱巴的衬里当作铺被。白天，找一些草或一切软的东西放在铺被下，多多少少隔些寒气。



朋友和家人五年没见我了。他们打听到我被押到果塘嘉果，

鼓励哥哥尼玛来看我一趟。哥哥独自动身了。

到了劳改营大门，看守说他不能进去，因为囚犯不能探视。

劳改营中有位国民党医生，人很好。出于某种原因，他很关心我。听说我哥哥来了，他设法让我到大门处和尼玛见了一面。尼玛看到我就哭了起来。我很后悔让他看到我这副模样，他回到家里一定会向乡亲们描述我的情况，都会认为我会活不下去。

我非常伤心，眼前这个几乎辨认不出、饿得半死的人或许是我给哥哥的最后印象了。有一会儿，我握着哥哥的手，凝视着他。早有人警告过我，不能说任何有关我们在劳改营的事情，当然一切都已一目了然。最后，他回去了。

虽然，通常藏人不能探视囚犯，但有时会有人来探望，给囚犯带来一些食物。送来的食物，有时囚犯能得少部分，也有时什么都得不到。官员不想把尼玛带来的食物给我。那位医生出面调解，对共产党说：“把食物给我吧，我一点点地给阿德。”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劝我说：“你最好冷静下来，不要和官员、看守争吵。做一个普通的囚犯，我或许还可以帮你。假如你坚持处处和他们作对，我也无能为力了。”

起初，他只给我少量的酥油糌粑，说：“要是在这个时候吃得过饱，会死的。我会把你哥哥带来的食品一点点地给你。”狱友们在一起时，他们说：“啊，阿德有股糌粑香味。”更多狱友过来围着我问：“你得到了什么了？你哥哥给你带了什么？”这样问我，让我觉得自己非常自私。我很不安，因为我知道每位狱友都饥饿难耐。不管我去哪儿，大家都盯着我看。

我觉得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去找那位医生，我告诉他，我想用哥哥给我的食物为所有的狱友做顿饭。他对我说：“这怎么可能？那点儿东西根本不够。”哥哥送来的东西有小包的糌粑、酥

油、小肉块，奶酪和茶叶。我告诉他：“我想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给大家熬一锅稠汤。”

他又问：“你真得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我说千真万确。这样他开始准备为大家做汤。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帮的我，但他是主治医师，知识渊博，很受中国人尊敬。他向厨师要了一口大锅，亲自帮我做饭。我们在囚犯的厨房把汤一碗碗分给大家。那位医生，穿着白大褂，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给每一位狱友盛汤。所有的狱友都高高兴兴地领了汤，虽然很还烫，马上就喝了下去，脸上一下子泛起了红光。有些人舔了一遍茶杯，再倒进点儿水，涮涮茶杯，再喝下。大家都向我道谢，一些人还亲了亲我的手。他们说：“至少在死之前，还能吃上一顿家乡饭，多亏了你。”

果塘嘉果中，有许多来自拉萨地区的喇嘛，教我度母经的嘎塘司徒仁波切，就是其中之一，给大家发汤时，他也在现场。他对我说：“西藏还是独立国家的时候，总有许多富有的家庭给一些大寺院施舍斋饭、茶叶。因为他们有钱，那样做也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在这种情形下，你把食物和大家一起分享，更有意义，更为难得。你做了一件极有功德的事情，会活下去的。至于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想逃出这种暴行是不可能的。”

有位藏人，在拉萨被捕，先被带到了安多的一个劳改营，然后又到了果塘嘉果，总是带着一顶特别的帽子。我认识他时，他身体虚弱，站不起来，走不成路。或许因为什么原因，他经常看着我。那时，我衣服破成了一片一片的，经常绊倒，朱巴总是挂着鞋子，把前边都扯破了。鞋子也不成样子，鞋底早被吃完了。

这位藏人也领了汤，他几乎没有力气摘帽子，只是慢慢地抓住帽子，拽下来，双手合十，做着祈祷，把帽子送给我。我想或

许这顶帽子是某个喇嘛的，被赐过福，非常高兴地戴在了头上。晚上，我感到帽子中间好像有个钮扣似的硬东西，摘下帽子仔细一看，里面有一个纸卷，用线缠着，展开，里面是一幅达赖喇嘛的头像。从那以后，一直戴着那顶帽子。我故意把帽子弄脏，免得落在看守手上。否则，如果他们看到我戴了一顶温暖，好看的帽子，很可能会占为己有。这顶帽子是最宝贵的礼物，它给了我希望。



果塘嘉果的监狱长是马股长⁵⁶，既是军队警察的头儿，也是劳改营的头儿。不管什么时候，马股长总以一副全世界只剩下他这一个官的样子走进来，把自己当成皇帝，统治着这些饥饿垂死的民众。他的脸又圆又胖，闪闪发光，和那些骷髅般的藏人有着极大的戏剧性反差。由于饥饿，我们的脸看起来没了人样，脸色腊黄。劳改营中没有任何洗浴设施，也根本不可能有新衣服，人人气味难闻。马股长来时，总是用洒着香水的手帕捂着鼻子和嘴。

1962年，马股长要调走，接任他的人姓裴。俩人一起检查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其中一个囚犯的名单。马告诉裴，三年内，共有一万两千零一十九个囚犯死去。丹增排长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就告诉了那位医生，两个人都很震惊。当时医生正在巡诊，其他的狱友无意中又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不久，有一天，我们听说嘎塘司徒仁波切去世了。和他同监的人说，他死的时候正在祈祷。一大早，人们发现嘎塘司徒仁波

⁵⁶ 原文 Ma Kuchang，不似汉语人名，疑为“股长”音讹——译注

切的尸首正襟危坐，做着手印，仿佛一尊雕像。

听到这个噩耗，他慈祥的目光和对我的关爱一齐涌上心头，他的声音、他给我的鼓励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他说过我会活下去，我不敢想象他的话怎么会一语成谶。我们经历的一切都那么没有道理、没有正义、没有意义。但我坚信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了他，不会忘了他平静的话语中显出的坚定信念。



在果塘嘉果劳改的前前后后，我基本只想三件事：达赖喇嘛、流放的藏人以及他们是否能得到支持，让西藏重新获得独立。想着被监禁的自己和所有垂死的狱友，想知道无法见面的亲戚的情况，我孩子们的情况，不知道何时才能和他们见面。母亲在监狱中挨饿，他们会怎样生活？同时，我也期待光明能够到来，我能以自由之身离开监狱，和孩子们团聚。但是想象的自由终归是想象的，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机会再去享受自由，身边的人都奄奄一息，我也很可能会死在这儿。等到我再次换了监禁地点时，果塘嘉果只剩下了六十位活着的囚犯。

1963年的一天，共产党召集了剩下的全部囚犯，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必须返回打箭炉，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此时，1960年和我一起押到这儿的一百个女囚中，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个活了下来。当地政府意识到，囚犯们太没用，太短命，让他们作这里的劳动力太不划算了。

我们站在那儿，身体重重地压在拐杖上，河水的咆哮声撞击着耳鼓，等待着看守发号施令，我们好从山谷径直而上。出发令传来，我们排成两列走出山谷，每个人的包袱都小得可怜。我们

慢慢地走着，脚下这片土地埋下了所有死去的狱友的白骨，我很清楚自己的尸首也很有可能埋葬于此。走过墓地时，我默默地对故去的狱友说：“假如你们能更坚持一会儿，今天会和我们一起走。”我向西藏众神祈祷，愿他们的离魂安息。

通常，藏人去世，都要为亡灵举行特殊的祭奠仪式，一般持续四十九天。藏文化中，一场合宜的葬礼是将灵魂从尘世的迷茫和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关键。我边走，边为那些死去人的祈祷，希望他们有幸福的来世，并承诺今生都会为他们祈祷，就像是自己的亲人葬在此地，因为我们经历了同样的苦难。作为见证人，目睹了这么多人悲惨离去，每一位走过的藏人都深受感动。墓地一片荒凉凄惨，行走其中，我禁不住失声痛哭。

沿着山路爬了一段时间，我转回头，看看身后。终于，劳改营被完全撇在身后。我和其它囚犯沿着一条未知的道路向前走。看到生命如此短暂，内心的空虚一下被唤起，那么多熟悉的声音突然消失，让我想起了宗喀巴法师《甘露精滴》⁵⁷里有关通往佛陀之路的经文：

细观世界万物，芸芸众生，高贵也罢，贫贱也罢，而今只有空名尚在人间。现世众生，终将逝去。

一切身外之物，身份、房屋、亲人、朋友、财产，乃至整个身躯都不会长久，现实如梦，孰为吾恋？

真正有价值之人生，实难探寻，即便找到，终不能长久，像草叶上一滴露水，转瞬即逝。

法师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世界的短暂，生命的脆弱。藏人一直

⁵⁷ 此表述不确，请参照作者序言中有关《甘露精滴》的介绍及译注——译注

认为按照个人能力，学习教义，非常重要。虽然我从未想过要经受如此痛苦，如此冷酷的考验，我仍继续祈祷，为自己和他人，请神灵赐予力量，指点方向。然而，即使修行时，我仍忘不了那段受审受难的日子，忘不了那么多无缘无故失去生命的受难者。活着未能享受安宁，愿他们的灵魂早得安息。

第三部

湖中莲花

第十一章 枉费心机

有阵子，我和果塘嘉果的另外三位幸存的女犯人，还有其他大约六七十位西藏妇女一起，囚禁在纳确寺院。在那里，我得知多数入狱的喇嘛都已去世。新的囚犯源源不断，监狱区的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听说 1962 年新来了一位监狱长，接任前监狱长张的工作。岗位交接时，新任的监狱长接到了囚犯名单，上面显示那时共有 2319 名囚犯。一位中国官员与来自理塘的囚犯丹增桑波关系不错，告诉了他这些情况，丹增桑波又告诉了大家。

一位朋友想办法给我弄了件朱巴。那时，我已经 5 年没有换衣服了。有了衣服，我平时穿新的，每月不方便的几天穿旧的。能有件衣服都是天大的福，原先的朱巴已经完全破成布片了。

在打箭炉的寺院式监狱中，我们被简单地分了组，带到且托克的什玛岔劳改营，就在米纳拉嘎冈附近。米纳拉嘎冈是打箭炉的五个行政区之一，称为“区”，现在的汉语名是新都桥⁵⁸，在打箭炉西边，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两个地区之间的有座山口叫玉拉。整个米纳卡鲁嘎卡尔地区，共有二十一处监狱和劳改营。什玛岔劳改营就在玉拉山口下方，距米纳向东大约一公里，与军用机场相临。1954 年达赖喇嘛去中国曾在这里做最后停留。共产党入侵之前，藏人把此地看成一片福地，过节时总在这儿野营，赛马，或搞些其它活动。现在，飞机场和通向甘孜与理塘的两条南北叉路口之间，沿公路设有六个劳改营：什玛岔，女犯队，

⁵⁸ 新都桥监狱规模极大，曾为四川之最，现在仍是甘孜州最大监狱——译注

Xaya Dui⁵⁹，砖瓦队，面粉厂和监狱改造中心，都是新都桥监狱的下属单位。

我们到劳改营之前，营中已押了五十位犯人，大部分来自拉萨和安多南部的玉树。我们很快就感到这儿的条件比果塘嘉果的好。在果塘嘉果，囚犯们睡觉都是身子贴着身子，根本无法翻身，如果哪天睡在旁边的囚犯半夜死去，只能一直躺在尸体旁，任身上的热量一点点地被尸体吸收，直到第二天早晨。在什玛岔，至少睡觉时有足够的地方。

那时，几乎所有的狱友的衣服都是补丁摺补丁了，而且还是各色各样的花补丁。在西藏我们把这样的衣服称为“塔塔”，意为“像斑马那样”。我们被逼干活时，衣服经常被荆棘划破，大家只要看到树丛上有小布块，就一把抓过来，拿到监狱，缝在衣服上。

算上我们这组新来的，什玛岔劳改队共有六十名女犯人，一百名男犯人。我们所在的区，只有女犯，其中一些我已经认识了。身体健康的囚犯被派到菜园种菜，上了年纪和卧病在床的一直锁在监狱里，他们的任务是用纺锤把羊毛纺成毛线。

劳改营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曾经被捕的国民党人。他们服完刑，没地方可去，继续留在劳改营，当了任人指使的雇员，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从外边给劳改营的菜园运粪肥。我们和这些人碰上时，尽量托他们从市场上买些酥油，糖蜜，或针线之类的东西，然后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一些衣物和小物件和他们交换。

哥哥尼玛不知怎样得知我被转到了另一个监狱，托人带给我一点儿钱。我拿出十分之一买了根针，如获至宝。

在菜园干活，可以偷蔬菜吃。我们在朱巴前摆的下方缝了一

⁵⁹ 不知所指，暂存疑——译注

些隐藏的口袋，趁看守不注意，把蔬菜放在口袋中。收工时，看守会仔仔细细地检查我们是否偷了蔬菜，但是他们从未发现那些秘密口袋。回到监狱，我们把蔬菜给卧病在床的囚犯，他们除了吃狗食般的监狱饭，别的什么也吃不到。

这里的女犯我被捕前没几个认识的，不过一旦走到了一起，大家彼此非常理解，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类似的暴行，很合得来，彼此都像是姐妹一般。

如果哪位囚犯觉得不舒服，卧病在床，仍被逼着纺毛线，她会想：“今天我的朋友会给我带东西来。”在菜园干活的人自己找了点儿东西吃，也会想：“我的朋友在监狱等着呢，我一定要给她稍回点什么。她希望吃到这些东西，要是空手回去，她会伤心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

女犯关在一所有五间牢房的建筑里，大家又一次地睡在了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就在这儿，我开始缝制了一条真正的褥子。大家走路时都是不断四下张望，希望找到一切可用的材料。有囚犯去世了，我们把他的衣服拿来用，那时候，根本没人考虑什么吉利不吉利。平时毫无用处的小东小西都成了宝贝。我拾了一些布片开始做褥子。从果塘嘉果带过来的朱巴衬里再加上捡来的布片作面，布条、稻草，碰到什么我都捡来塞进去，抵御从坚硬的地板上透出的阵阵寒气。

我在什玛岔押了三年，不像在果塘嘉果，没有囚犯饿死。三年间，我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体力恢复了好多。

我的汉人朋友喜也被带到了什玛岔。我们简直不敢想象对方还活着，而且越来越健康。虽然喜还是爱小声抱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她还是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天天转好。渐渐地，我觉得她更爱笑了，尤其是我们用隐藏的口袋骗看守时。

耶什卓玛是我在狱中最好的朋友，才令玉顿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都很值得信任。我们在一起不管谈什么可能违反监狱规定的事，都很放心。大家相信如果任何一个人被抓，不管看守用什么样的惩罚和酷刑，永远不能让我们出卖对方。

耶什卓玛来自打箭炉北部地区，嫁给了一对兄弟。1955 至 1956 年间，打箭炉附近最大的寺院——夏丹寺遭破坏，僧人和喇嘛遭到逮捕。于是她的丈夫们就加入了反抗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和当地人一起参加了在林区同共产党的殊死搏斗。像我们一样，耶什卓玛也进入林区，为战士们送食物，提供信息。后来被捕了，判了十年刑。

才令玉顿的父母双双饿死在狱中。一天，她得知了父母的噩耗，就独自一人去森林边放牧。她担心牲畜不久会被解放军征用，很清楚家中的任何财产也不可能为将来的生活带来任何益处，因为她根本无力保护那些财产。想到这里，她决定把整群的牲畜都送给林区内与共产党作战的藏人。她跟一些林区战士的联络人员一起做了安排，将牲畜全送了过去，这才感到欣慰，因为有了这些牲畜战士们一段时间内不会挨饿。共产党一发现她的牲畜不见了，就开始怀疑她，审讯时她供认不讳，被判九年劳改。

我们三人住一间牢房。耶什卓玛年纪很大，从没有被派出劳动。白天，她被锁在监狱里，一边纺纱一边不停地默念着真言经。才令和我经常被派到菜园干活。

种土豆时，我们尽量每种一株土豆就偷一小片。等到土豆稍大些，每一株上都可以偷好几片，但是土豆生吃很难消化。我先是在打箭炉吃了那些猪食，现在又吃生土豆，肾脏出了毛病，一吃东西就疼。

囚犯们吃的蔬菜都是最普通不过的，红萝卜、莴苣和土豆，

外加一块儿馒头。因为可以在菜园里偷吃蔬菜，才令和我都只吃一半饭，把剩下的留给耶什卓玛。

监狱中不只我们三个人，所有的交流都要悄悄进行，看守总是强迫囚犯们说出他们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告诉他们哪个囚犯和哪个囚犯关系密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时间说些私事。我一直记得我是如何向朋友们发誓的：“总有一天，时机到来时，我要把在中国人手下经历的一切公布于众。等到离开这儿，我发誓要让世人都知道这些事。”

在监狱和前两个劳改营的几年悲惨生活把我的身体全毁了，自从换了这个劳改营，我的身体已恢复了好多，可以轻松地穿戴帽，走路也不用拄拐杖，行动自如。不到一年之前，这些事简直是不可可能。



有时，监狱看守和当官的酒喝多了，开始侮辱囚犯。一个当官的坐在桌上，端着酒杯，责骂我们。他们讲话时我们不能抬头，只能躬着身。看守们经常挑一些长得较漂亮的囚犯，派去给当官的洗衣服，当然，免不了遭受强暴。我刚到什玛岔的几个月里，有两位女囚怀孕。之后，所有的男看守和官员都换成了女性。从那时起，我们干活时，女看守就在旁边责骂、监视。

除了果塘嘉果，我待过的监狱每次饭前都要求囚犯们唱一首革命宣传歌曲，其中一首叫做“上士李富（音）”。李富是一位中国士兵，战斗中杀死了许多藏人，我们被迫复述他的功绩，唱歌颂扬他。另一首歌唱道：“世界上所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都不过是破纸一张。”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唱这些无聊的歌

曲时，我就小声嘀咕。唱完歌我们才能吃饭。

我亲眼看到藏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遭受的种种苦难，下决心要把这些记它个清清楚楚。心中有那么多不堪忍受的记忆，我唯一可能去做的是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让我像其他囚犯那样传声筒似地去重复他们的宣传。

会上，我们要听当官儿的讲解毛泽东关于藏人生活和西藏未来的指示，他们还要求我们要听得津津有味，情绪高涨。干了一天的苦力，现在还要千方百计打起精神。肌肉和关节都已累得发僵，听讲座时却仍要坐得端端正正，不能随便活动，否则会被认为是对夜校的课堂内容不尊重。



1966年，我和耶什卓玛、才令玉顿一起转到女犯队，新都桥劳改营中管理女犯的主要单位，位于米纳拉嘎冈。整个囚禁过程，从甘孜到打箭炉、再到果塘嘉果、什玛岔，现在又到女犯队——我的服刑档案一直随我走，因此不管到哪儿，他们都知道我总是违反狱规。每次换监时，我都想：“噢，或许这是个新地方，他们不知道我。”但是我的档案总是会引起当官们的注意，他们总把那些事拿来当例子，向其他囚犯证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现在再看，这种一次次地翻旧帐倒有积极的意义，虽然他们想通过我的自作自受警告其他囚犯，但也正是这些内容给了其他囚犯希望，使他们更坚强，更坚信要互相帮助，不要被反复加在我们头上的“下等人”的标签压垮，不要被共产党所宣扬的“谁不接受共产党，谁就注定受惩罚”的口号吓倒。

女犯队监狱有八座牢房，每个牢房押有十名女犯人。所有能

干活的人都派到菜园劳动。规定是上午劳动四小时，午饭后再劳动四小时。晚上，参加两小时的会议。伙食甚至也比在什玛岔的时候好一点儿：馒头看起来比那里的要大一点儿。

早晨，监狱工作人员起床，洗脸，吃过早餐后，把我们带到菜地开始上午的劳动，干活之前，先点名，所有的囚犯站成一排，清点人数。每次出去，都有报告记录多少囚犯出去劳动，多少全副武装的看守跟着。回来时，同样要点名，查人数。男犯的监狱里，试图逃跑的囚犯都被当场击毙，女犯中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

上午干完活，开始午休，监狱工作人员午睡一小时。我们用这段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缝补衣服、褥子，找新的稻草或铺床的布片。大家用各种方式共享着彼此的东西。一块布或许会给一点布都没有的人，或是帮助上年纪的人。那段时间，我经常去找耶什卓玛，看看有什么可帮她的。

两点，返回菜地。劳动分段儿进行：比如一部分需要三个小时，另一个部分需要两个小时。然而，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活儿没干完，就不能回去，直到干完为止。

星期天监狱工作人员要出门儿，我们只能在上午十点和晚上五点吃饭，专门剩下半个馒头，留着中午吃。大家经常见到死去的狱友口袋里装着干馒头，二话不说，抢过来就吃。

有机会我就和耶什卓玛、才令一起谈论监狱里发生的事情。才令胆子非常小，耶什卓玛胆子大，一生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情，但从没在监狱中张扬过。他俩都把我当成唯一可以信任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从未因监狱中的不公平和当官的争吵，但听到有这样的事儿总是告诉我。

晚上喝过玉米粥，囚犯们被召集起来参加两个小时的洗澡

会。有时官员们责骂我，说我是最顽固不化的人，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不知悔改的人。然后又对其他囚犯们说：“但是，如果你们这些人改变思想，你们就能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公民，过上快乐的新生活。”负责会议的两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监狱工作人员，另一个我们都叫她“女看守”⁶⁰。他们从不叫我们的名字，把我们统称为“牛鬼蛇神”。中国旧传统中，人们过去常信奉一些天性善良的动物。后来，这个词语用来形容赋了人形的邪恶鬼神，一旦被识破，就原形毕露了。毛泽东用这个词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在西藏，这个词指阶级敌人，包括：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美国等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共产党要求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背“红宝书”上的语录。不识字的人要背一些短语，如“我们是恶魔”、“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者”、“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不过是一张纸”以及“毛泽东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他们要求我们能倒背如流，随时能站起来背诵一大段。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让人叫起来背语录足有几百次，但是我总说：“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些东西。”他们告诉我：“你连一句语录上的话都背不出来，是说过去的。这说明你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再教育，仍怀着反革命思想。你是个花岗岩脑袋，因为你总是想要是有把刀，就把中国人杀了。”

休息时间，监狱教导员带着囚犯学毛主席语录，我经常朝语录本儿上吐口水，然后坐在屁股底下。一次，十个囚犯坐在一起，听我诉说心事，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国民党囚犯赵绍意（音）听见我跟狱友说“就是枪毙我，我也不愿学毛主席语录。”我对

⁶⁰ 原文 Nu Kasu，不似汉语人名，当为“女看守”音讹——译注

狱友说：“他们能把我怎么办？再说，他们怎么能指望一个根本不识字的人去背书？”第二天，赵看见我坐在书上闭着眼祈祷，马上报告了当官的。就在那时，我们才发现她是个特务，这样的特务在女犯队里司空见惯。

三天后，共产党召开会议，许多当官的参加了会议，我和另外九个狱友被带到会议上。他们责骂我，逼我跪了两个小时。我说啥也不承认把宝书坐在屁股底下，我说：“这样的指控我不会接受，你们可以问所有的囚犯，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坐在书上，要有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就承认。如果只是一个人说，我不会接受这么荒唐的栽赃。”

当然，狱友们都尊敬我，和我很合得来，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证。即便那样，赵绍意还是说：“阿德不喜欢毛主席，憎恨汉人。”我反驳说：“我是在嘲笑赵绍意，不是在嘲笑领导。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而且，其他人都知道我没做过那样的事。”

有位藏族女监狱看守，我们叫她丹古排长，共产党进驻她的家乡时，她非常穷，现在成了一位工作人员。共产党鼓励中国人同藏族妇女结婚，丹古嫁了一位中国丈夫。和中国人结婚的人会给予特殊照顾：提供较好的伙食和住房，提高工资，还给予一些其它方便。劳改营中还有几位藏族妇女工作人员和中国人结了婚，但是她们仍设法帮助我们，我们偷蔬菜，她们就把脸转向一边假装没看见。但是，有上级在时，她们表现得很严厉。

对于赵绍意的揭发，丹古认为我是无辜的。她询问了其他囚犯，然后向官员们汇报：所有的囚犯都说赵绍意是在胡说八道。丹古说：“因为我们总是严厉惩罚阿德，我想赵绍意是在撒谎，尤其是阿德自己否认了这个检举。我觉得这是赵绍意在故意编故事骗取我们的信任。”对我的检举没人支持，这件事就不再提

了。

有位名叫萧卓玛的女人，母亲是藏人，父亲是中国人，因和情人一起谋杀亲夫被拘押。后来才发现她其实是个最麻烦的特务。只要她在，我和朋友们都很谨慎。她监视我们的行为，即使有人偷了一点点蔬菜，她就立即报告，令大伙非常讨厌。靠检举揭发，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奖励，对我们的监视更加严密，大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监视。大伙最终设了一个圈套，使共产党不再相信萧卓玛。几位女犯人设法让当官的相信萧卓玛是个两面派，我们一起说：“我们看见她偷蔬菜”、“我们听见她说汉人的坏话”。后来，她再试图揭发谁，说谁值得调查时，当官的会对她的话掂量一番。最后，萧卓玛只落得个在人前抬不起头。这很不幸，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生活已经很困难，再碰上这种趾高气扬的共产党眼线更加让人不可忍受。

不是所有的特务都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我的中国朋友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招来了杀身之祸。喜和两位国民党犯人成了朋友。三个人都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经常说如果机会到来就如何如何：“哪天我们要像宰畜牲一样，活活地剥了那些当官的皮，谁让他们如此折磨羞辱我们。既然中国与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我们报仇的时机到了。”虽然采取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喜仍然从这样的想象中找寻安慰，有时当着别人兴奋地谈论她的想法。她被揭发了。

像往常一样，当官的召开了一次大会。喜举着手，跪在地上。胳膊支持不住，一滑下来，看守们就用枪把打她的肘部。她的双臂承受不住，颤抖起来，面色苍白，泪珠顺着脸颊缓缓流下。共产党对她说：“赶明儿你给我们讲讲你的计划，你究竟想怎样剥我们的皮。”当天晚上，喜上吊自杀了，年仅四十来岁。

1966 年起，断断续续整整一年，共产党要我们用灰泥来糊木屋的内壁，灰泥里掺合着珍贵的藏族宗教经书，非常古老，用金银两色墨水写成。劳改营里有间房子专门存放经文，堆着成堆的藏经。共产党要我们把经文撕下来，泡在水中，把纸、泥、稻草放在一个大型锡制容器内搅拌混合，用这种灰泥来填补木板间的缝隙。虽然才令玉顿和我不识字，所有撕经文的囚犯都觉得每撕一下都是在犯天大的罪。听着耳畔传来的纸张撕裂声，我们说话都不流利了，不知道这些宝贵的经文是否还能挽回。才令说：“我敢肯定我们在犯罪。将桑杰（佛）的圣名扔到泥里。”



1967 年的一天，一组医疗队来到了监狱，给女犯人体检。他们选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二十位最健康的人，把我们带进了一公里外监狱工作人员和官员们的医院里，让我们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等着，房子中间有供暖设备，非常热。两个助手拿着水壶和茶杯走了进来，让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的甜饮料。大家等着，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让我们待在一间这么舒适的房间里？共产党突然良心发现了？真是不可思议。”房间很热，再加上喝了饮料，我们的脸开始发热，手臂的血管开始胀起。突然，一组医生进来检查我们的胳膊，然后掏出注射包，拿出注射器，娴熟地从每人身上抽了很多血。之后我们被留下休息。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麻木地坐在那儿，对着墙上的影子，不停地看自己的胳膊。不一会儿，助手回来了，拿着水壶，给我们重新倒满一杯饮料，让我们多喝些。几分钟后，我们的身体又开始发热。医生进来又抽了同样数量的血。大家都感到很不安，现在正是我们身体

最需要血液的时候，却偏偏被抽去了。后来，我们被带回了监狱。

抽过血后，没有人立即生病或死去，一个月后，我们觉得脸开始发疼，身体有种不正常的僵硬感。当然，如果有足够合理的饮食，或许身体可以再造失去的血液，但是我们的伙食远远低于基本营养标准，根本无法提供恢复体力所需的热量。

慢慢地，我们越来越虚弱。康区乡城的仁青卓玛当年就去世了，梁茹的云忠贝姆也死了。从抽血到狱友们陆续死去之间，医生从未给她们或别的女囚看过病。甘孜的才令拉嫫在次年死去，同年去世的还有一位康区道孚地区的妇女。来自康区亚曲喀⁶¹的瑞可总是跌倒，有一次重重地摔伤了头部。抽过血，她总是头晕，干一会儿活儿，就浑身没力。我被抽过血后，一直到今天，总感到头昏眼花，还经常有心率不齐、肌肉抽搐的毛病。

几个月后，一天早晨，看守打开了牢房门，把我们带到外面集合，带进了一个大厅。我担心他们又要抽血，起初没有进去，只站在门口看着。两个监狱工作人员拿着剪刀走过来，进门时，把我拉进了大厅。他们命令囚犯们站成一排，有条不紊地给每个人剪发，把长长的辫子一下子剪到齐耳根，还发给我们一些胖胖大大的蓝色裤子、上衣和蓝色无沿帽子，带连个耳罩，前面有一个纽扣。然后，共产党烧掉了我们的破旧朱巴，我的那串用布条做的，从果塘嘉果就一直戴着的念珠不幸被毁了。幸运的是，好几年前从狱友那儿得到的，藏在帽中的达赖喇嘛画像，已经被我藏到了安全的地方——刚到什玛岔，一天我假装到外边上厕所，把画像藏到了山上共产党找不到的一个干净地方。

之后，当官儿的告诉我们：“从今天起，你们不管是谁都不

⁶¹亚曲喀，今汉名雅江——译注

能说藏语。必须一直讲汉语，如果今后有谁说一个藏语词，或是背一句经文，都要被审判。”

那时，我在监狱已经待了好长时间，学会了一点儿汉语。刚被捕的三四年里，我一个汉语词也听不懂，逐渐地，通过喜的帮助以及不断地听和观察，我已经可以理解共产党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可仍有一些新抓来的囚犯，当然，他们不懂汉语，也不可能马上就学会。这些人不得不保持沉默，好几年不能说一句话。



1968 年，上面下达命令要把所有不能再劳动的和一些继续反对共产党的棘手囚犯召集在一起，强化共产党思想再教育。包括才令玉顿、耶什卓玛和我在内的一组人被转移到监狱改造所。这个监狱专门关押二十五年至无期徒刑的囚犯，也被称为“监狱改造中心”。改造中心是新都桥劳改营五个分部中最严格的一个，位于新都桥镇上，临着公路南沿儿，离军队司令部和医院很近。

监狱院子很大，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每隔一段就站着一位全副武装的看守。监狱也是劳改营，接受劳改的人被派到不同的车间工作：木工、铁工、缝纫、建筑和机械车间。在木工车间，犯人们制作搁板架子、箱子、桌、椅、床，运到中国销售。中国政府根据市场的需求给这里安排生产任务。

大多数女犯人都在菜地干活，但是我和耶什卓玛、才令被关在专门关押重大政治犯的监狱，1968 年整整一年，我们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上思想政治课，几乎一直关在室内，食物从另一个劳改营运过来。共产党无休止地警告我们，说我们没有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再教育。

有位共产党官员，名叫李坦达（音），是负责政治课的主要教导员，大伙都非常讨厌他。白天，我们参加三次共产主义宣传，每次持续两小时。囚犯们要一个个地站起来，联系个人情况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被认为是再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对这套东西极为反感。他们基本上就像对待淘气孩子那样对待成人。坦白一些事情，就被认为是实实在在地努力接受改造；一点儿不暴露自己的思想，可能会导致更多口头上的麻烦，于是，囚犯们都想方设法在这两者间巧妙地保持着平衡。

有时，教导员给我们读报，让我们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文章基本内容都是在说：“共产党主义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和我们相比，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值一提。”

那些教导员们总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么强大，幅员多么辽阔，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上多么先进；还介绍世界上都有哪些反革命；还说，一切资本主义迟早要被粉碎。他们天花乱坠地描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的绚丽画卷。他们告诉我们共产党在西藏各地都取得了成就，还特意提到那些有意阻碍西藏进步的人，不厌其烦地讲述他们如何被折磨、被行刑，还给我们展示被抓获的林中战士的照片，威胁我们。

宣传画贴满了整个房间，画上全是微笑的工人、农民、新型拖拉机，下面是生产口号。当然，还有一张巨幅慈祥地微笑着的毛泽东头像。他们告诉我们：“没有外界支持，达赖喇嘛现在势孤力单，他去找美国和其他国家——可惜美国软弱无能，其他国家都瞧不起美国。”

李坦达告诉我们：“指望从外界得到帮助，纯粹是白日做梦。我敢保证，你们很快会发现共产主义比你们的旧传统好得多，我们欢迎你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幸

福。”他还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宗教信仰，等待你们的只有一条路。”

虽然李和其他教员为了强化再教育，花了他们还有我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可是根本不起作用。课间休息时，耶什卓玛、才令和我说他们的方法就像是往石头上浇水：石头里面根本不会湿。同样，我们的头脑也不可能被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说教改变，忘记修行。即使我们这辈子或是下辈子都要继续忍受这种痛苦，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头脑改变过来。我们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神灵、文化、宗教等一切造就我们民族特质的东西，只为了去换一辆拖拉机？只为了去换可能被没收的，至少是税赋沉重的庄稼地？

偶尔，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也拿共产党的宣传开玩笑。整个再教育中，正是那些玩笑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人性和个性。记得下雨天，我们常拿“纸老虎”的话题你问我，我问你，好像纸老虎也在风里雨里拼命挣扎呢。

回到课上，李对我们说：“我们来之前，西藏没有汽车和飞机。现在有了你们从未见过的宽阔大路，建了飞机场。以前，你们连火车都没见过。我们刚到西藏时，你们见了我们的车就跑到一边。”我怎么也搞不懂这种谬论，他们建路是为了掠夺西藏的财富，把军事力量扩张到沿喜马拉雅山诸国和印度。一些来自卫藏的囚犯告诉了我们修路的事情。什么时候他们提起这些事，我都很生气，很不耐烦，一个字都不听。我曾亲眼目睹他们如何将财宝运出寺院，不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说自己为藏人做了多少好事，带来多少益处，他们的话——那些不断添油加醋的谎话——从未打动过我。李经常说：“神和鬼都是一样的。”他和其他教员叫我们“黑老鸱”，说“飞遍天下都免不了挨石头。”还说，

我们的后代就像狼一样，一长大就会袭击其它动物。我们的后代同样会仇视中国，但这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中国作对。

虽然我们根本不接受那些说教，晚上睡觉时，那些话总在耳边回响。藏人被捕的情景历历在目，统计数字、花言巧语、轻蔑言辞，以及教员单调的声音在心中翻腾。没有什么外力可抵制这长时间无休无止的残忍说教。我们不知道说教会持续多长时间。晚上，我尽力背诵经文，来驱散课堂上留下的种种残存记忆。



1969 年再教育结束，我们回到了女犯队。再次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没有人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用尽一切办法向你灌输你永远不可能接受的东西，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一年年过去，藏族女看守丹古开始有些敬重我了，在许多小事儿上给我帮助，她对当官的说我又整洁又能干。一天她对我说：“我安排你在监狱的厨房作个帮工。你去了那儿，至少可以吃饱。他们抽了你们的血，你需要一个恢复体力的机会。当然，如果你总想着和当官的理论，他们会把你赶出去，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在厨房管蔬菜。要是让做 20 公斤的菜，我想法做 30 或 40 公斤。说是只能给囚犯半碗饭，我都给他们盛得满满的。大伙都非常高兴我得了这样一份新差事。

大厨过去是位国民党，名叫李胡叶（音）。她对共产党的官儿唯命是从，必恭必敬，不停地磕头叩拜。李胡叶和“女看守”，就是女牢的监狱长，关系很好，女看守非常贪吃，不停地

吃各种美味佳肴是她最大的消遣。李胡叶变着法儿在吃上巴结这位监狱长，因而得到了负责食品供应的差事。

李胡叶经常责骂囚犯，和那位监狱长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有时就像一个人似的。李总是明目张胆地违反监狱规定，见到犯人伙食中有肉时，马上给女看守送去一部分。

一次，囚犯厨房要为监狱工作人员做二十块烤猪肉。一天，就在烤肉前，才令玉顿拉着我的胳膊，小声说：“阿德，我觉得大厨肯定会想办法为女看守偷些猪肉，如果有人发现肉少了，一定会把责任算到我们头上。”我走进厨房，看到李胡叶背着一只妇女常背的篮子。她见我怀疑地看着她，喊到：“你看什么？我要去拾些柴火。”她碰巧是监狱中唯一一位可以去外面拾柴火的人。我看了看篮子，虽然用布盖着，可以看出里面装着东西。

我心里有数，掀开布，露出了篮子里的猪肉。为了夺回猪肉，我和她打成一团。她拿着篮子拼命左躲右闪，不让我抓到，一边喊：“救命啊，来人啊，犯人阿德要杀了我。”才令玉顿就在附近，不清楚事情的真像，照我的后背就是两拳，担心地小声说：“阿德，你干什么？你完蛋了。”守在门外监狱四处的看守听到有骚动，大声招呼监狱工作人员过来，听到的喊声的那些管事儿的纷纷来到厨房。一会儿，房间就聚满了人。就在看守把我们两个拉开的一瞬间，我一把从李胡叶手中抢过篮子，紧紧地抱住。

女看守走了进来，像往常一样，叫我“罪犯阿德”、“该死的阿德”。我和她吵起来，说：“我也许该死，但我是罪犯吗？李胡叶要偷猪肉，明天，你们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控告、毒打我们，让我们蹲小号。”说着，我掀开篮子让大家看里面的猪肉。他们都很吃惊。后来，丹古告诉我：“你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你斗不过她，下次猪肉丢了，她会想一切办法把责任推到你和其他囚犯身上。”后来，我和丹古单独在一起时，她会突然想起那个场景，想到女看守尴尬的模样，就开怀大笑。

猪肉风波过后半年，1970年藏历新年来临前夕，我们得知可以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个个激动万分。监狱有个地方养着从游牧藏民那儿没收的家畜，是专为监狱工作人员准备的。过年时会宰杀几头牦牛，已经决定给囚犯们一些牦牛肉庆祝新年。女牢可以得到五只牦牛头。大伙谈论着自己的好福气，很高兴由我为他们烹制牛头。

要做牦牛头，需先烧一下，再清洗干净。“洛萨”节（藏族新年）前一天，我清洗好了五只牛头，放在案板上。李胡叶负责踩牛头，我注意到她把牛舌煮好，然后放在一边。厨房还有其他帮工，虽然也时刻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但他们很害怕这个女人。我们都很想知道她打算如何处理那些牛舌头，在西藏，牛舌头被认为是上乘美食，牛最好的地方，极为珍贵。

我想：“噢，她要把牛舌头送给女看守。”我想到了所有期待这顿美餐的狱友，如果牛头中没有舌头，狱友们岂不是只能吃皮和骨头了？我决定要看个究竟。她用一块白布把牛舌头包起来，放在包里。我马上用汉语问她：“你干什么？”她说：“你没有资格说话，更没资格问我。这是给女看守的。”我说：“你不能拿走这些东西，这是给犯人们过年吃的。你也知道不该拿走。”她没理睬我，径直向监狱门走去，我跟上她，一把抓住她。她又喊了起来。

女看守听到了叫嚷，急忙来到厨房，为了制服我，也和我打了起来。女看守要捂我的嘴，我拼命喊叫：“这两个女人偷了囚犯们过年的肉。这怎么可以？”丹古走进来看到了发生的事，

问女看守为什么拿囚犯的食物。女看守不耐烦地问丹古：“你现在和阿德一个鼻孔出气了？”当时，我拽着女看守的头发，踢她的小腿，把她打倒在地。我完全豁出去了。其他监狱工作人员跑进厨房，女看守开始哭嚎，说我不仅打她，还打大厨。最后，囚犯们得到了两条牛舌头，我被绳子捆着，在众多好奇的目光注视下，被带到了监狱的另一区域，一间无窗的单独监禁室。

几个小时后，丹古偷偷地过来，打开门，走进牢房。房内一片漆黑，她站了一会儿，向四周望了望，让眼睛适应一下黑暗，她看到了我，跪到我旁边，低声对我说：“阿德，我发誓一定揭发女看守偷囚犯的食物。我会做一切事情帮你，但你必须明白当官的现在非常生气。”

我被关在号子里，一扇窗户都没有，非常难受。三天后，一个官员进来问了几个有关那件事的问题。我把那件事又讲一遍，告诉他在一年最快乐的时候吃上一顿饭对囚犯们是多么重要，还告诉他女看守总是要吃饱喝足才肯罢休。

那位当官儿的说检举偷牛舌头是一回事，我打了看守和大厨是另一回事。他说：“阿德达本仓，十二年的监禁，你没有一天表现得很好，你最好小心点，改变你的态度。如果你敢再动任何工作人员一指头，就是死路一条。”

从监禁中放出来，我被撤掉了厨房的差事。

没过多久，监狱的伙食又稍好了些，饭中有时可以见到一点儿肉了。但是大厨还是继续克扣份量，比如，肉的总量应是五公斤，她马上扣下两公斤，不动声色地放到包内，拿给女看守。一些狱友看到这种事，告诉了我。我问她们：“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她？”她们说：“你要知道，我们没你那么强壮，不敢像你那样做。”

女看守又矮又胖，短发，残忍的天性表露无遗，她糟蹋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让我们过得更痛苦，自己从中取乐。女看守每天必做的事就是大声叫嚷，吓唬恐吓我们。有时一进牢房就开始了一天的谩骂，手里拿着从寺院弄来的唐卡，铺在椅子上当坐垫。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人，她完全否认、嘲笑宗教。她个人认为藏人，尤其是囚犯，就是敌人，必须受打击，不得抬头。

丹古和女看守的态度完全相反。虽然出身贫困家庭，她对我说她更喜欢藏人而不是中国人。她还小心谨慎地坚持修行。她是位非常虔诚敏感的女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默默地帮助我们。她曾经告诉我：“不管当官的表面怎样做，除非你自己放弃提防，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到你心里。”

我失掉了厨房的差事，就被派到菜园和其他囚犯一起干活。菜园和一条主干线离得很近。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条公路上经常可见往返于汉藏的车辆。卡车上装着木材、从寺院抢夺的雕像和一些其他物品，还有药材，羊毛，矿石。卡车返回西藏时，车上坐满了监狱及劳改营工作人员的妻儿老小。中国耕地不足，西藏土地富有，还有大量自然资源可以开发。共产党给汉人分了土地，可以自己建房子。交通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把希望生活得更舒适的老百姓源源不断运到西藏，他们带着要卖的廉价商品，货车一到，立刻拿下自己的货品，在路边摆起小摊儿。中国人把质量好的商品都用于出口，想在国际市场上为自己的商品树立形象，质量最差的都拿到西藏卖。

有时我们干活时，亲眼看到许多卡车装着从寺院里掠夺的、比真人还高的雕像。在打箭炉时我见过这种事，但那些雕像要比这些小得多。有时卡车会在菜园很近的地方稍停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雕像已被亵渎，头上和身上全是斧痕，手已

破损，面部完全被毁。干活时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看到装着雕像的卡车，就招呼别的人来看。大家默默站在菜地里，眼泪夺眶而出，想知道被掠夺的寺院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眼看着汽车隆隆地驶向中国，珍贵的金银雕像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劳改营外，我们看到男囚犯们正在为在西藏定居的中国人建造房屋，当地藏人的房屋已被征用或拆除，失去房子的家庭只得到了一笔很少的赔偿费。

每晚两个小时的会议上，女看守总是有意恐吓我们，对我们进行心理攻击，来削弱我们的意志。一天，我们看到雕像被运到远方，她走了进来，兴冲冲地坐在唐卡上，脚往小桌上一放，眼睛朝屋子里一扫，面带得意的笑容说：“今天你们看到了我们运走了烂成两半的和破损的雕像，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用经书做成灰泥刷墙，我自己现在就坐在唐卡上，也没有遭到任何报应。你们的神连他们自己的像都保佑不了。因此，从今天起，你们必须承认根本不存在神和宗教。”

开过会，一些狱友，尤其是我的朋友才令玉顿和耶什卓玛，围到我身边，耶什卓玛说：“噢，阿德，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你为什么反抗女看守，听了今天晚上她讲的话，我们真正理解了那些监狱看守是什么人，粗鲁无礼，虚张声势、故意折磨我们。”后来的几个星期她和其他狱友不断向我道谢。有时大家说着说着，悲从中来，为自己悲惨的处境痛哭起来。我们开始叫女看守“女魔头”。

几个月后，坐了九年牢的才令和坐了十年牢的耶什卓玛被释放了。才令的全家——父亲，母亲，兄弟都已被共产党杀害。她无依无靠，只好去另外一个劳改营，跟一些同样没有家人的二劳改待在一起。才令告诉我：“你不能再跟工作人员和女看守作对

了，这样下去，就是你刑满了，他们也不会放了你，反而会利用那个机会进一步整你。如果可能的话，阿德，我会想办法往监狱给你送东西。”

耶什卓玛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她可以回家。她也提醒我：“我们单凭拳头是不可能与中国人抗衡的，你要好好保重自己，不要再做以前那种事情，我也觉得他们在你刑满后不会释放你。”她也向我承诺说，如果她的日子好过了，会来监狱给我送东西。看到自己最亲密的、最信任的、一起分享过那么多喜怒哀乐的朋友离开踏上各自的道路，我感到十分难过。我不知道在新的生活中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

1972 年，包括我在内的一组男女囚犯被送往纳曲卡，位于理塘和米纳拉嘎冈的交界处。在那儿，共产党要求我们伐树取木材，让我们装劣质的圆木到卡车上。由于劣质圆木无法销售就运到监狱作柴火。离这个地方不远，被共产党雇佣的藏人在烧制木炭。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成堆的木头，整个森林都被砍伐。回到狱中，我们要用斧子和楔把木头劈成小块。最麻烦的是刚开始干我的双手就起水泡，疼得几乎握不住斧子。可是，不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就不能休息。伤口化了脓，流着水，从未真正愈合过。

一天，劈木头时，我感到有位男囚犯在看我，他叫阿希，在布纳塘的战场上被捕时还是孩子。他看起来一身病态，衣服很脏，像个乞丐。当时他 31 岁，在米纳的林区那儿，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和后来被捕的事情。阿希曾是一位非常敏感的男孩，即使被监禁了这么多年，依然善良仁慈。他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和所经历的苦难。我很关心他的健康；他宽我的心说：“要知道我从

十五岁时就在监狱了，在监狱的时间比我在外面的时间还多出两年。这么艰难我都活过来了，我肯定有一天我们会在狱外相见。”

1974 年冬天，我被送回到了女犯队的主区。一天，女看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开始责骂我：“现在你服完了刑，但是不像其他囚犯，我们不能释放你，因为在检查你的记录时，我们看到你从甘孜，直到女子劳改营，都一直在反抗我们。因此，我们要继续拘留你。你的态度和所作所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么多年，受罪的是你，不是共产党。最终你仍没能理解。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不小心点儿，不放规矩点儿，你什么都不能做，连行动权都没有。每个人都会看着，阿德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另一方面，丹古告诉我：“你是一位非常坚定的藏人，我支持你。中国人总是找借口让你受各种折磨，让你过得更惨，但你决不能气馁、沮丧。”

第十二章 重逢

1974 年春末，我被移交到面粉厂，跟米纳其它监狱坐落在同一条路上。临走的那天早上，两个看守把我带到女犯队的监狱长办公室，给我的文件盖章，办理移交手续，然后我们就走了出去。有辆车停在外面，有人打开车门让我坐在车尾。司机发动车时转头看了我一眼，把车开出监狱，车头转西朝甘孜方向开去。我看到路北边监狱后面有条小河，在阳光映照下泛着银光。不一会儿车就过了军区司令部和道路南边戒备森严的监狱改造中心。我把背贴近座椅闭上眼，不愿去想我和朋友们在那里度过的这一年。经过一个军区医院，车从道路的南侧驶离主干道，开进面粉厂大门，这一路用了不过 15 分钟时间。

办了报道手续之后，一个看守让我独自呆在分配给我的牢房里。我坐在那儿，回忆起 16 年前初次被判刑那天。想到这么多年已经过去，自己都有点儿吃惊。很快，又进来一个看守，来给我下劳动任务。我们边走他边给我讲：“全区 22 座监狱的犯人、看守都靠这座面粉厂，包括军人、狱警、犯人，也给甘孜辖区的其它地区输送面粉。

面粉厂是一座巨大的自动化工厂，我从没见过这种机器。在工厂各种部门一路走来，听着机器隆隆的噪音，看着它们庞大的外形，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被分到磨糌粑面粉的车间。

“瞧，”看守解释说，“你的工作就是拿一个口袋让面粉流进去，装满后系好袋子放到这些架子上。”看守走开让我单独干了几个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从那以后我发现工作

的时候我可以吃到糍粑粉了。我能吃饱肚子也就不需要吃饭，我开始把粮票送给别的犯人。有糍粑粉吃，不到两周我的身体就变得很结实了。

一天晚饭时，我正坐着喝茶，一个在运送部门干活的女人给我搭讪。“你是个包装工。你比来时看起来好多了。这里不坏是吧？我的工作就是检查糍粑粉和小麦粉，分出不同等级然后送到不同的地方。最上等的面粉送狱警和军队；次等的分给在工地或其它部门工作的汉族平民，还有狱警家人；最差的麦面当然做成蒸馒头，所有监狱的犯人都吃这个，剩下的糠皮喂猪。你瞧，我们在这儿有用着呢。”

我惊奇地发现面粉厂和之前我待过的几座监狱有几个主要不同之处：没有武装狱警，牢房门从不上锁，想方便也不必在牢房里了。

面粉厂的犯人都可以挣钱，我们每人每月发 29 块钱。这些钱的一部分用来买粮票到食堂吃饭。如果不精打细算这些粮票半个月就用光了。这种问题男犯比女犯更常碰到。我们吃得很俭省，有时粮票还能剩下些，那些男犯却要常常饿肚子。剩下的工资就买衣服和其它所有基本生活所需。

星期天，汉人监狱长就给我们开会，问犯人这一周都想些什么。我当然没什么可说，大都回答：“今天我在面粉厂干活，我干得很好。我整个一周都干得很卖力。我没别的可说了。”然后他们就问别的犯人：“阿德的表现怎么样？她给你们说了什么？你们都讨论什么？”他们还对所有犯人说：“把阿德看严了。”

那时候我从没对别的犯人透漏任何东西，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所幸尽管没有亲密的朋友，同屋的人没有一个讲我坏话。有时为了敷衍那些长官，他们会站起来说：“阿德今天干

活很卖力。”



一天我惊喜地发现，我大姐色拉玛的丈夫普尔巴也关押在面粉厂，而且和我分到一个部门干活。姐夫年纪很大了，只是做缝补粮袋的工作。厂里没有武警，只有不多几个配手枪的长官，我们可以趁劳动时悄声说话。我们大多是讲各自遭受的折磨，也会说起其他同室狱友的牢狱经历，以便了解到周围发生的事。有时我们会在一起回忆家人。普尔巴因为大都和年纪大点儿的藏民关在一起，从没学过汉语，如果有长官冲他叫，可怜的普尔巴就显得很迷茫，悄悄问我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一天我被叫去狱长室，一个长官对我说，虽然我 16 年坐牢期满，但我被划为专政对象。我坐在那儿盯着地板，他继续说：“虽然你现在不是犯人了，但你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因为你仍旧坚持反对我们，放你回家是不可能了。”我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这时，一个看守过来把我带了出去。



1975 年，我被安排到砖瓦队劳改营劳动，给我戴了“黑帽”，也就是“四类份子”，包括四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戴帽”的和成了“份子”的人都成了政治和社会贱民，坐车只能坐行尾，站队只能站队末，看人只能看腰以下部分。我们这些人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也不能参加某些会议。戴黑

帽的犯人每周都要做思想汇报，要交待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被召集去劳动。

我的牢狱生涯似乎是没有尽头了，我安慰自己说这些年来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我想念有朋友陪伴、相互鼓励的日子，不过我总算在牢里见到了一个家人。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学会在孤独中生活，必要时就保持沉默，只能不停祈祷，看看新的一天能带给我点什么。值得安慰的是普尔巴也被转移到这里了。



砖瓦队的营地坐落在川藏公路北线通往甘孜的岔道附近，那里有许多红黏土。有一队犯人整日忙着挖土，六头牦牛套了缰绳转着圈在土上踩，牵牛的犯人很可怜，即使在刺骨的严冬也光着脚在那儿站着。

我最开始的工作是和一群犯人一起做瓦片。一个犯人给我看怎么把泥放进细木条做成的模子里，模子可以盛四块瓦片。我们干活时，就坐在一个硕大滚圆的砖窑旁边，窑底生着一堆火，露出一个小洞可以添木料加火。窑顶用土封得很厚实，土盖上浇上水可以调节窑内温度。瓦坯烘干了，模子就自动脱落。砖瓦也用另外一种模子来做，不过烘干时需要人工拿木片把砖瓦挖出来。砖瓦在窑里烤一个星期就烧成了，大部分被收拣起来装好运到中国。

工作节奏十分紧张，特别是许多时候都要蹲着把泥土填进模子，想换换姿势，改个地方都不行。每个人每天要烧一千二百块砖瓦，为了完成任务，犯人们要从早上五点干到晚上七点钟。大家都一心想着自己的工作配额，大部分时间都在静静地干活。唯

一的不同体现在天气变化上：高温酷暑我们就离砖窑远点，秋风吹透衣服时就挨得近些。冬天冷得和泥、搬砖都很不方便。泥和得不均匀，手冻得麻木不灵，常常失手打碎瓦片。

我们似乎是在机械地工作，未来没有定数不会带来什么安慰，犯人们显然都清楚自己的生命如蜉蝣一般。过去，听到鸟鸣曾经感到很多安慰。现在在外面干活，对这种声音反倒充耳不闻了。周围的一切变化如此之快，竟然把曾经熟悉的东西从记忆中抹掉，这让我深感困惑。我也说不清我们的狱中生活固定在一个目标之上，这种安排到底有什么深意。为了能在这种紧张、单调的日子里活下去，每个人都变得有些麻木。即便如此，在那个时候，只要精力许可，除了面前的工作我们还专注在一件事上：有犯人开始默默向观音菩萨和达赖喇嘛念诵祷文，很快别的人也开始祷告了。我在砖瓦队关押了 5 年，挖土、制砖瓦、背石头、犁地、伐木的活都做过。

有的犯人被派到洛果松都林区伐木。我们每天要走 4 个小时，20 公里路到库什拉果山上的伐木场。当时整片林区都要伐光，犯人们要辛辛苦苦干上八个小时，主要是砍小树和树枝为工厂的高炉提供燃料。一群配备手枪的看守一路押着犯人，无论我们在哪儿干活，都被四面八方地包围着。树砍下来就扎成捆装进推车，一辆车能装 500 公斤木材，犯人们用绳子拉着车一路运回到营地。

我因为过去的不良记录，常常是他们派出的唯一女犯。我得用镰刀，砍起来很费力。男囚犯挥上三四下就能把树砍倒，而我无论怎么砍都砍不断。男人在砍树前都会把镰刀磨光，有段时间我却不懂得这个诀窍，他们不准我和任何人讲话。还有，我常常滑倒。男人知道在山上爬上爬下砍树，要走“之”字来保持平

衡，而我有段时间和他们分在不同的地方干活，不知道这么走的好处，总直上直下地爬，很快就累得筋疲力尽。

我们在清早上山前发了一块蒸馒头，就是一整天的干粮。我姐夫普尔巴也和我们一同上山。他没力气跟年轻点的一起砍树，就负责给伐木营地烧茶，为看守们热午饭。

每个犯人一天要砍 600 嘉玛⁶²重的木材，相当于 300 公斤，而且要自己拉车。山路陡峭难行，上山下山非常吃力。拉车上山，车的重量会把你往下拖，感觉随时都会摔下去。尽管看起来不可能，我还是得把车装得满满的，一个人拉着走。看着我又跌又滑，挣扎着拉着车，那些看守们就笑话我。

我们回到劳改所就称木材，如果有犯人完不成任务，晚上开会时监狱长就会问：“为什么你那份没做完？”自然的，我总是那个遭盘问的人。狱长说：“你不管在哪儿劳动都不好好表现。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实际上你身强力壮。”——我的体型看似如此——“你是因为反对我们所以不想干活。”

有件事我终身难忘。一方面共产党一直把我当作世上最坏的人，贱得像头牲口。实际上我连牲口都不如，至少牲口不能干活他们会一枪把它打死，而不是慢慢折磨。不过另一方面，同屋的狱友认为我是最爱国的藏人，为了同胞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又一次和狱友们结下了友谊，总有人设法帮助我。不知为什么，无论我在狱中蒙受多少羞辱，总有些东西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有段时间，我的这种力量来自我丈夫家的亲戚仁青桑珠。我发现仁青桑珠也关在砖瓦队，也被派去为砖窑砍树。看守不注意时仁青就帮我装木材，还劝说其他人也来帮我。有仁青和普尔巴在我身边，相互信任，相互关怀，我又一次感到

⁶² 嘉玛，西藏传统重量单位，约合一市斤——译注

生活的幸福。

有时，仁青要帮我拉车，那些看守就呵斥他，说：“她会犯罪，不会拉车？不准你帮她！”

仁青就和他们吵：“一看就知道她没力气拉这车，你们为什么要逼她？我要是不帮忙，车动不了她的任务就完不成。”

这时我就说：“你们干脆现在就把我枪毙了。我拉不动车，你们最好杀了我，省得浪费时间。”

可他们没把我毙了，就这么着又折磨了我两年，那段时间似乎总也没有尽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命那么对我，可是老实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一直以虐待我为乐。当然，别忘了按照他们被灌输的思想，我是罪恶之源，对共产党赋予他们的权力和威信造成了威胁。他们让我为共产党唱赞歌而我总是拒绝，虽然想起来挺恼火，他们也不得不认识到他们也是人，并非战无不胜。他们完全相信我是他们一个最坏的敌人。

我们劳动的地点有的离百姓住的地方很近，每天人们都看到我被刁难折磨。当地人有时会让一群年龄在 15 到 20 岁之间的姑娘去和看守打趣，那些人趁女孩们和看守调笑之际赶忙帮我把车推到半山腰。看守们没有发现，即使发现也没再说什么，继续和姑娘们玩笑嬉闹。

外面的群众给了我很大帮助，周围每个人都听说过我的故事，许多人都亲眼看见我受的折磨。有时女孩们过来帮我，她们走过来一边和看守说话，一边飞快地往我裙子里塞糌粑、面包，或是用布包着的一块肉，那些看守还以为女孩们真喜欢自己呢。

有个当官的名叫罗看守⁶³，是晚上开会的主要发言人。明显对我抱着偏见，还没怎么认识我就开始指责我，我怀疑是有人给

⁶³ 原文 Lho Casu，不似汉语人名，似为“罗看守”音讹——译注

他下令让他找我麻烦。他在会上问犯人们：“这周阿德都在干什么？”他像女犯队的女看守一样骂我，总是鼓动犯人们打我报告。一天晚上又是如此，散会后仁青很生气，他告诉我：“罗看守刚来这儿时派我给他提行李，那时候他的家当只有一条洗脸毛巾，我们还因此都叫他‘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成了一个有钱人。”



仁青桑珠是 1974 年到的砖瓦队，也被戴了黑帽，33 岁的年纪有近一半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我、仁青、普尔巴有时劳动完后就想法在夜里碰个面，诉说被汉人统治后各自的一些经历。仁青告诉我们他 16 岁时曾应邀参加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了一个月，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民主改革”，为了消除任何阶级观念残余，人民不准穿好衣服。对国民党和富人的清算运动正在开展，共产党把市长级以上的领导人都处决了。

仁青回忆说：“有 300 个来自各个地方的西藏人参加了那次访问。我当时还小，对正发生的一切都不理解。年龄大点的人总说：‘这样搞看起来对我们没好处。’尽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观摩工厂里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安排去四川省的城市逛街也是一项教育内容。我们看到囚犯被卡车带走，路人告诉我们，那些人是国家的敌人，要被处死。”

尽管代表团没有多少机会和一般汉族百姓直接接触，他们还是有机会看到人民是怎么生活的。仁青告诉我们，一次代表团去重庆附近的一个动物园参观，午餐是在周围一家餐馆里吃的。正

吃饭时，仁青看到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朝他们走来。他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饿得那么厉害的人。那女人什么也不顾，拼命地想抓点吃的。她抓起一只盘子开始大吃，餐馆里有几个人想拦住她，可不管他们如何对她又骂又拉，她也不肯把吃的放下来。她无视那些人，眼睛只盯着盘子拼命往嘴里塞东西。没等多久，她就被几个餐馆服务员拉了出去，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又把她狠狠摔在地上。共产党的向导对我们说：‘这些人从前都是上流社会，现在他们不能劳动，所以没饭吃。’”

代表团被目睹这一幕搅得心烦意乱，不过还是礼貌地吃完了盘里的饭。从饭店里出来后，代表中一个会讲汉语的向那个女人打听情况。她说自从共产党清算了有钱人家，她家大多数男人都被处死，其他家人只好四处流浪。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变得一无所有。有很多年龄大点的女人因为小时候曾缠过足，连行走都很不方便。

仁青继续对我们讲。代表团下一站到了四川的成都，看到人们为了买一小块带核桃的甜面包排成了一条条长队。“队伍长得很，要排几个小时才能买到一份面包，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面包就卖完了。我们这些西藏人别有专门的徽章，想买多少都可以，所以我们一到那儿就先卖给我们。有的汉人就过来请代表团里的人帮他们买。面包一元钱，汉人出 10 块钱让我们帮忙买。我们多买了一些面包分给排在我们后面的人，一分钱也没收。

仁青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里的人主要关心的就是买吃的东西，没人注意穿着或别的東西。仁青和别的人都想买些好点的工艺品带回家，可有人告诉他们，那些东西以后只会被共产党没收充公。

市场全部国有化，代表们看不到一个私人商贩。年长的藏人

说：“今天的中国和国民党在的那些年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了兆头，要不了多久汉人就会失去自由。今天人民的表情还放松着，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比作太阳下新剥的皮革。一开始又松又软，时候一到就变得又皱又紧。那次访问没有藏人公开说共产党不好，不过几个年长的代表吃得很少，想到灾祸也许会降临到我们的土地上，他们很伤心。代表们一直被警告说：“你们回家后必须对藏民说共产党中国十分强大，党是你们父母，你们绝不能造反。”

仁青说：“我们回家后，代表里许多人都被提拔为领导，工资很高，但没有实权，也不常接触群众。慢慢地这些领导人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又总是劝说藏民上缴武器。”

仁青桑珠的大哥是个喇嘛，迫害宗教团体开始后没几年就被抓去了。仁青和几个朋友策划把哥哥救出监狱，逃到山上，然而计划不知怎么没有执行就被汉人发觉了。1959年十月的一天，八个解放军和警察闯进仁青家里把他抓起来，他被带上手铐押到打箭炉的地区监狱。这座监狱面积比纳确寺监狱小一些，两个监狱在同一个城镇。仁青被捕时，那座监狱关着八十多名囚犯，等待着受审。那年他十八岁，此后的二十四年都是在监狱度过的。

被捕后他被带到监狱审讯室接受拷打审问。那些官员问他：“如果你拿鸡蛋碰石头，哪个会碎，是鸡蛋还是石头？”他们说他们得认识自己所犯的罪是什么性质。“你这种思想，这种反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没走正路，走邪路到头来只会是死路一条。连美国那样的大国都怕共产党掌权的中国，你不过是个小蚂蚁。蒋介石带着三百万军队逃出中国，你能做什么？你只是一只想爬柱子的老鼠。这世上谁反对共产党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们有很多朋友，像雨点一样数都数不清。”

仁青说：“我和同屋的狱友都觉得，他们一再提到美国是因为对我们西藏人来说，美国是最受我们欢迎的国家。许多人都觉得如果汉人欺负我们，美国会给我们援助的，就像当初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一样。为了抵制藏民这种思想，汉人总是从反面宣传美国。”

当官的想知道都有谁参与了仁青的营救计划，为此仁青经受了多次审讯。他曾跪过带棱角的木棍，也跪过碎石子。冬天，他和打箭炉监狱的其他犯人一起，站在刺骨的水里受折磨。汉人常常问：“你们和共产党作对，现在感觉如何呀？”还有两个折磨他们的法子，一个是把犯人手腕绑起来吊到天花板上，一个是用棍子打。

“刚开始的三个月，”仁青说，“我每天都被审讯。确定要我继续坐监后，审讯变成了一个月一次。”仁青桑珠就这样在打箭炉监狱呆了一年。

监狱的饭菜很差，份量又少，每顿饭前犯人们都要唱首共产党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唱道：

他的罪恶比天大，
每天都想毁灭世界。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⁶⁴

跟别的监狱一样，晚上开会时犯人们要交待罪行，分析自己过去的行为是多么邪恶。谁敢反抗，马上就成了批斗大会的批斗

⁶⁴ 此歌曲似难觅其汉语原本，径据其原文直译而成——译注

对象，那时所有犯人都在枪口下逼迫着斗争这个不服管教的坏分子。

有个同屋的狱友叫嘉米萨，她的哥哥巴丹是米纳的果瓦喀寺院的住持，已经到拉萨去了。她被捕后不久，被脱了衣服，绑住手腕，吊在天花板上。又在她身子下面生了一小堆火，烤着她的双脚。没过多久，她就因烟雾窒息而死，被拖下来投到冰冷的河水里。她没有活过这场折磨，很快她的死就成了监狱里的人们的谈资。



在打箭炉监狱待了一年后仁青桑珠被判了十五年劳改，和许多藏人、汉人一样被投入了那场大规模社会实验——共产党想通过“思想改造”控制个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当然那场实验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除了成为实验品外，他们还被强制剥夺劳动力，来挽救中国的经济。仁青一共转了十所监狱和劳改队，其中有米纳卡鲁嘎卡尔以东 20 公里的嘎巴林场，那是一个林业部门的主要办公地，周围的林区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砍伐。中国政府在那里有 3000 汉人劳动力，又征用了大量的西藏犯人来伐木。砍倒的树有许多都很粗大，一棵就把整个卡车塞满了。

仁青也曾 在打箭炉的萨藤区下属的西窝绒劳改队待过。那里也有差不多人数的汉人和藏人囚犯一起伐木。共产党入侵之前，藏族人认为那片地方非常神圣，依照传统禁止打猎伐树。



按说犯人刑满，就可以恢复自由，重返社会，中国的监狱却总是找各种理由不放人。就像他们常对我们讲的：“犯人永远不要忘记该听谁的话。”同时共产党发现，用很少报酬或者根本没有报酬就让犯人劳动，这很能提高生产，这种体制被称为“留场就业，”实际上是劳改形式的延伸，只是没有任何期限。我们找不到方法向公安局报案，或者是寻求外界法院的帮助，这些机构实际上是一丘之貉。被强制就业的犯人往往在同一个劳改所继续劳动，或者服刑期满的人数很少的话，也可能会转到别的劳改所和其他转去的犯人一起劳动。虽然他们已经恢复自由却没有获准离开，要按照劳改营的生产计划继续劳动，还隔三差五地被逼着证明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已经改造好了。

有些犯人长期关押不放，是为了不让他们对外面的人讲民族主义思想或是狱中所受的苦难。仁青桑珠 1974 年 2 月 5 号服刑期满，人家告诉他，释放他的话会引起社会骚乱，所以他最好是留在监狱里。于是，十天后他来到了砖瓦队劳改营。

仁青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他的牢狱生涯，声音一贯都很平静。一个晚上，砍了一天的树后，仁青念起古老的经文向山神祷告，诉说我们从前和现在的相悖之处。“这就像有人逼你砍掉自己的手臂，然后又砍掉你朋友们的。我家就住在那片神圣的森林附近，我第一次看到的树就是家门前茂密的白桦树林。我父亲和我站在树林里，他握着我的手，我闭上眼静聆听风穿过叶子的声音，父亲教我这样感受树木的生命。孩提时我常躺在林地中央，看阳光在摇曳的树叶间嬉戏。树干和枝条上的白树皮像是把从天上拉下了一片蔚蓝，做成衣服裹在自己身上。叶落时节，光秃秃的枝条伸在空着，捕捉那黯淡的玫瑰色和珊瑚色的彩云，再把它们撒播到天际。节日的早晨或是夜晚，我喜欢走在树林里，看焚

香形成的浓重烟云从房顶飘下来，缓缓地在树林间伸展，弥漫。

“现在我只要砍倒一棵白桦树，就感觉像是我的生命的又一条根——那根和我们土地的精灵和神祇交织在一起——被强行拔掉，砰地一声扔在地上。我很好奇过去做过的一个梦：我见过的事儿，认识的人全都消失了。每天被逼着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不知有多少次我宁愿自己死了。当然我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死去的意义比活着更微不足道。”

听着仁青的讲述，我悲哀地想，我们在劳改所里看到的每个藏人的生和死都是见证着亡国的厄运，见证着无休无止的苦难。这些苦难，除了这些犯人很可能再没人能知道了，而这些犯人却无力对未来做出任何改变。



在砖瓦队，判了两三年徒刑的犯人通常在山上扎营伐木，十年徒刑以上的犯人要在清早大约六点钟从劳改队走路去伐木，每天平均劳动时间 12 个小时。我和仁青碰面时，我们正在一个叫果洛托的地方劳动。

不同山上的林地被分给不同的单位砍伐。这座山可能让犯人来砍，那座也许是归当地政府管。虽然大部分树用来做木柴了，档次高点的木料会带回劳改队，让木工部的无期徒刑犯人给办公室做家具、建看守室和牢房。

犯人们接到命令到一个叫娄县的原始森林去砍伐大树，那儿的树以前从没砍伐过。到处是参天大树，每棵都是五人合抱。这些树被装上军用卡车运到中国。

木材买卖的钱用来给监狱看守发工资，或者投资新的基建工

程，包括建新的监狱。根据汉人的制度，劳改营承担一定的经济指标，通过犯人的劳动，每年要给中央上交五万块钱，这笔钱无论如何都得交足。

山上被汉人们一扫而光。我们这些藏族犯人情绪基本上一直都很消沉。共产党把我们的一切没收了之后，现在又开始摧毁我们的土地，好像中国没有自己的木材似的。我们互相都这么说：

“他们当然拿不走山和土地，不然的话，他们什么都会拿走。山上没有了林木这些珍宝，就好像一个人被剥得赤身裸体。”许多明白这句话涵义的长者说：“我们的土地要许多许多年都不会高兴的，会有不少自然灾害，收成也会一再减少。”我们这些犯人就祈祷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西藏能保全下来。不然，我们感到汉人会把这里的一切都连根拔起，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

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藏又一次面临粮食严重紧缺，当时汉人用他们的冬小麦基本取代了传统种植的青稞。许多土地管理不善，失去了往日的丰饶。西藏经历了一百年来最严峻的干旱，50 年来最恶劣的雪灾。到了 1972 年，几个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地震，全西藏的粮食大面积减产。细数着那一桩桩一件件旧事，深感它们会以悲痛告终，我们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助。

粮食最紧缺的时期，一连三年当地的百姓没有一个女人生孩子。藏民吃的东西严重缺乏营养，女人们很难怀孕。



每到星期天，我们劳改队的大部分犯人可以获准到外面市场上买点东西。有时候普尔巴帮我买，有时候是仁青，我从没获准到外面去。

星期天出去购物，仁青结交了劳改队的两个汉族犯人。华晨（音）曾是个工程师，现在代管砖瓦队的商店。共产党掌权之前他家非常富有，是国民党的高官，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然而，共产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清洗富人和国民党官员，凡是曾在国民党里身居要职的都被戴上“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面临监禁的惩罚，即使那些人并不真的反对共产党。

华晨很快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工程师，很有能力，特别受上司的青睐。解放军开始入侵西藏时，任命他担任负责康藏公路建设的一个要职。

然而几年后，他亲眼看到的一切实在让他无法接受，于是，他开始公开反对他信仰的政党。华晨后来也信了佛，他是说：“这个体制做的一切都没有正确性可言，因为它是建立在掠夺和谎言的基础上的。他们不考虑自己的作为，也不关心因果律。”老人常毫不掩饰地对看守人员说，他认为是制度出了问题。他在砖瓦队的时候常被戴上脚镣，可他逢人便说：“我永远不能接受共产党做的事。”他告诉仁青不管牺牲有多大，他也应该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他说中国占领西藏是事实，他不会掩饰他了解的一切。

华晨把仁青介绍给另一个汉族犯人李，他也曾是个党员，50 年代末入狱，因为他曾公开反对共产党的体制和思想，他的学术背景也使他成为反右斗争的打击对象。有时他握着仁青的手说：“将来西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走遍了全世界，通过他西藏人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了解。他们访问不同的国家，很快获得了知识，这对西藏的将来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些流亡者将一直为西藏独立奋斗，因为他们有资格，而且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还说：“你们的领袖在印度很安全，不

要失去信心”

仁青和李关系逐渐变得非常亲密，他们一有机会就谈心，把自己的饭分给对方吃。他们的亲密友谊主要建立在他们面对共产党的共同立场上。李对仁青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他赞扬了在美国人民享有自由和民主，还介绍了他的几个朋友青年时代在美国学习的情况。仁青给我讲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还有他听到的西方世界的情况。我们坐在一起，努力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仁青讲的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事让我非常高兴，帮助我认清了我们反对的是一个残忍、腐败的政治体制，而不是某个民族。我和仁青、普尔巴每每在一起讲话总是相互激励，希望共产党能有所改变，明亮的阳光能再次照耀西藏。我们当然不在犯人面前随便讲这些，只有当我们和另外一个有一致想法的狱友在一起时才会讨论这些事。普尔巴常提醒我们：“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基本核心是错误的，它所做的一切最终将毫无意义。如果政党是建立在权力掠夺基础上，到头来那些反对派系会在领导层发展起来。这样的政党最终无路可走，只有灭亡。另一方面，西藏人民坚信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即使他让我们到最高的悬崖边跳下来，我们也将欣然前往。”

一个星期天，仁青走过劳改队的院子，朝外面公路望去，看到一辆马车缓缓朝砖瓦队驶来，车上是几个新囚犯。他停下来望着马车，想知道这群新犯人从哪儿来的，他们能带来什么消息。车进了劳改队院子，犯人们下了车，他盯着那几张疲惫的脸逐个看着。

突然，他看到了他的哥哥阿旺库朔在车上，就是他少年时试图营救却引来首次牢狱之灾的那个哥哥。他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大声喊出哥哥的名字，朝马车奔过去。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仁青一把抓住他，两个人抱头哭了起来。仁青把阿旺库朔带到我的房间，我正在缝补东西。我抬头看到一个瘦高的男人，有着一双幽深、和善的眼睛。望着这双眼我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心中随即泛起对他的关怀。他很显然是累坏了。我们喝着茶开始讲起各自的生活。阿旺库朔告诉我们，他原来关在夏劳改营，位于米纳的尕塔尔地区，也在曲洛宗和西窝绒伐过木。

阿旺库朔回忆说：“对我来说比挨打、挨饿、受冻、强迫劳动更难理解的事就是当众受辱。有好几次，解放军女兵逼我喝尿，我不喝她们就把尿淋我头上。我们这些喇嘛被逼到简陋的厕所里清理粪便做肥料用。厕所就是在地面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上面横了两块木板。我们经常爬进洞清理粪便，解放军女兵们为了取悦监守就故意在上面撒尿，尿在我们脸上。”

阿旺库朔被判了18年，可一直坐了20年牢。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他很虚弱，所以仁青就尽力帮助我们两个。一个星期天，仁青从市场回来，把一个小包放我床上，叹道：“阿德，有许多年我用仇恨来积蓄力量，我想和他们对着干，我的青春还没开始，就被他们剥夺了。当我听到我刑期满了也不能获释，我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世界被一种体制霸占，我们认为给予人生命之尊严的东西被他们证明是幻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无可选择的赤裸裸的现实。后来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为你和我哥哥被关在这里感到难过。可是如果没有别的出路，我很高兴有你们相伴，很高兴我可以在一些小事上帮帮你们。”

从那时候起，我对仁青有了新看法，我完全信任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善良和友谊对我有多么重要。

第二年的一天，阿旺库朔被叫到狱长室，我和仁青、普尔巴

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晚上才能和他说上话。他盯着地面，然后慢慢抬起头，望着我们的眼睛，说：“我怎么也不相信，我记不住也不理解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早上他们告诉我，过了明天我就自由了，可以走了。”

他获释后做了一名隐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作祷告。他现在住在一个石洞里，离他出生的村庄不远。他偶尔会到附近一间寺庙参拜，有时会有当地人去拜访他，特别是孩子们。



米纳拉嘎冈有座神山叫夏杰拉，传统上是所有节庆、宗教庆典的朝圣地，那时候当地人常去祷告，进香。20 世纪 70 年代初，有三百多个犯人被派到山上采铅矿，山脚有座湖，1975 年夏那个湖发生了件西藏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一天，有人发现湖中央的水下出现了一个牧民帐篷的映象，汉人用双筒望远镜在山上监视映象是否在移动。他们看出了那个映象不是自然现象，这让他们很害怕。一星期后帐篷映象逐渐消失，原来的地方长出了很大一棵绿色的莲花，花不断生长，把整个湖都铺满了。人们说花的形状和颜色有着很深的寓意：绿色和至尊达赖喇嘛有关，他出生那年是木猪年，绿色是树木的颜色。

藏族人开始带着哈达成群结队地来到湖岸。过了不久，汉人决定把湖炸了。山墙高的水从湖中央掀起来，人们都冲过去拣漂到岸边的莲花碎片。那些把花瓣保存下来的人说，花瓣跟草一样柔韧。我们西藏人觉得这幻影和开得出奇地大的莲花是一种预兆，预示着好日子快要来了。

一年后的 1976 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死了，7

月份又传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死讯。那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长达 40 年的集权统治粉碎了。不到一个月，极左派的“四人帮”成员在自己的总部被解放军反对派系拘留起来，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尽头。中国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1977 年 7 月中旬，西藏土地政策的改变初露端倪。这让那些在部署在西藏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非常不解，也给藏族人民内心带来了春意荡漾般的期盼。

第四部

不息的声音

第十三章 走出图图

第一波自由浪潮始于 1979 年三月，376 名囚犯宣告获释。汉人在洛巴夏召开了一次大会，后来我哥哥尼玛到砖瓦队告诉我，他们打算放了所有犯人，但几个头目除外，我就是其中之一。汉人宣布说：“就是阿德这样的头目煽动藏人反对我们，这不是普通百姓的错，所以除这些头目外所有人都会释放。”他们说：“以后谁也不要企图保护阿德达本仓，这个女人罪大恶极。”

我们注意到劳改队管理人员态度的改变。他们告诉我们，邓小平不让再用“黑帽”这个说法，他们说：“给你们扣黑帽子的是四人帮一伙。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牛鬼蛇神，是真正的人了。以后你们可以穿干净体面的衣服，可以抬起头，有行动自由了。你们再也不是批斗的对象。”

中国政府同意达赖喇嘛的请求，允许流亡政府的一个官方调查团入藏，目的是重建同藏族同胞之间的联系，至此西藏人与外面世界隔绝了 20 年。

早先，不管洗衣服洗澡，只要洗点什么都会引起不满，谁洗东西就会遭看守盘问：“你今天为什么洗头？今天为什么这么干净？你有什么企图？”然而 1979 年我们被告知：“现在你们得洗洗衣服，洗头、穿干净点儿，达赖喇嘛的调查团今年就到了。”

他们通告藏民：“你们要面带笑容，要带着转经筒、念珠四处走动。”当地的和尚都没了，他们就问谁家有和尚的衣服，然后开始做僧袍。为了营造西藏一如从前的假相，他们下令一些人

身穿僧袍在公路上走来走去引人注目。

1979 年上半年，他们强制藏人参与寺院快速整修工作，只整修那些靠近公路的寺院，对那些偏远地区的寺院就却不闻不问。有时一座大寺庙的旧址上会建起一间小庙。那些金身、银身塑像被掠走了，于是就新塑几个来代替。庙墙依照传统方式粉刷，墙上挂的是西藏神明的画像。可那些庙里主持法师的活佛，甚至连会背诵经文僧人全都杀的杀，抓的抓，没一个活下来的。藏人看着这些新修的死气沉沉的庙堂，不禁落下眼泪。

达赖喇嘛的哥哥罗桑珊登是首次调查团的一个成员。尽管集会自由被禁了 20 多年，上千名群众列队站在道路两旁，只为看调查团，尤其是罗桑珊登一眼。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没有被遗忘，在劳改队外面的世界里，汉人面对藏人高涨的热情无计可施。

调查团到我们劳改队的那天，犯人们被召集起来在一间大厅里开会，其实是把他们都锁在里面。我一听到开会的消息就称病回到房间。我让一个同屋叫来仁青桑珠，让他向上面报告我病得下不了床，请他们准许我不参加会议。仁青桑珠和普尔巴向看守报告说：“阿德身体不好，她病得厉害，走不到大厅。”看守说：“她要是病了就把门锁上，不能让她到外面去。”

这时我蒙住脸走到外面的公路上。我的打算是，不管能见到什么，只要有时间说几句话，我也要讲。罗桑珊登在 20 辆车队的护送下来了，我看到他在朝群众招手，我尽了最大努力靠近他乘的那辆汽车。也许他看到了我想和他说什么，可没有时间，车队继续前进，我没有讲话的机会。尽管我很失望，但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即使我们不能和调查团成员之间讲话，我们知道他们通过眼睛足以了解我们的土地发生了的变化。他们会看到被

毁坏的寺庙，我们穿的破衣烂衫，至少他们能看到人们的表情，肯定能通过种种迹象认识到我们蒙受的困难。

那次访问后，我们这些犯人在一起说话，感觉时代真的在变化，我们大胆地设想将来情况会有所好转，甚至希望有一天至尊达赖喇嘛会亲自访问西藏，来到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被摘掉黑帽后有了一次 15 天的探亲假，劳改队留下普尔巴和仁青以确保我回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探亲证明，到了家要给当地政府看。走了一天半后，车开进了甘孜，我感觉浑身冷得发麻，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些熟悉的地方，小时候的许多时光就在那里度过的。另一些回忆也涌了上了心头：我被捕的情景，我被拖着到寺院的景象，还有我的儿子哭着要妈妈的叫声。

真的过了 21 年了？我儿子长大了么？再过几小时我就能见到他？公车开进甘孜车站，我吃惊得看到大街上有那么多的汉人，似乎所有招牌上都是汉字。我知道的那个甘孜怎么了？那么多和我的生活相关的建筑都已经成为废墟。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想见我母亲，我的心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那么虚幻。

我到洛巴夏后得知我们的房子、全部家当还有我们的田地都被没收，再也没返还。我直接去了我的哥哥尼玛家。快到他家时，尼玛开了门，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阿妈在哪儿？”他对我说：“阿德，阿妈已经过世了。”“出什么事了？”他说：“你被抓走后不久，他们就把一切都没收了，连一只碗也不留给我们。家里人一个个被抓走了，除了阿妈，她太老了，还有布姆，她那时正生病。我被抓到一个公社强制劳动。从那之后阿妈什么也没有了。当时甘孜正是粮食严重短缺的时期，朋友们想帮忙可大家都匀不出多少吃的。阿妈没有再活下去的理

由，也不愿因为她让年轻点的挨饿。她变得非常虚弱，没过多久脸就瘦得塌陷下去。她在 1968 年慢慢被饿死了。

我下一个想知道的就是儿子的消息。尼玛对我说：“阿德，其美已经不在。”我急忙问：“我儿子被汉人抓走了么？他出什么事了？”我弟弟发誓说其美不是被汉人带走的，而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可是不知怎么我觉得他讲的掩盖了一些事实。就这样，短短几句话回答了我二十一年在恐惧和盼望中等待的答案。就像这短短几句随风而逝的话，我的等待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

我大妈博琼玛死于第一次饥荒，大妈的二儿子夏乐和三儿子阿索在甘孜的一次批斗大会上被打死；我哥哥奥确在 1961 年饥荒时去世了，死的时候还被软禁在甘孜家中。我被捕后不久，哥哥珠古玛的妻子阿塔被告发，说她没有把我们家里所有财宝首饰交公。经过连番批斗、威胁要判她死罪，她被逼着说出了我们家其余财宝埋藏的地方。阿塔是个非常胆小怕事的女人，这件事之后，她一直生活在无休无止的恐惧和极大的悲痛之中。后来她被扣了黑帽，直到我回家前不久才摘除。她的两个孩子只有女儿拉吉活了下来。拉吉有一个儿子，是珠古玛唯一的孙子。我们家只有我的女儿扎西坎多和哥哥尼玛还留在家中。

我亲爱的二姐布姆是贝玛坚赞的妻子，在贝玛坚赞死后不久就疯了，死得很凄惨。大姐色拉玛被抓到公社劳动，因为她身子骨儿很弱，腿也有病，她干的活儿就是烧茶，还给田里干活的人看孩子。她经受了常年的折磨，所幸其他几个孩子还留在公社，离她很近，尽可能地帮助她，所以她活下来了。我们一见面就抱头大哭。色拉玛以为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了。那时候她很老了，腿也很难站立。她对我说，她非常抱歉当初自己和其他家人不能

帮助我、保护我。

我被捕时侄子侄女们都还年幼，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我儿时的朋友只有六个人还活着，我们从前的女佣楚依卓玛也还活着。朋友和剩下的家人对我说他们在等我回来，回来照顾我。他们把自己的儿子带到我面前，让他们保证不管母亲们出什么事，他们都会欣然承担起照顾我的责任。孩子们一个个和我握手，这是康巴人做出许诺的方式。

不一会儿我女儿走到了门廊。我被抓走时她才一岁，现在她22岁了。我们都没认出对方。尼玛拉起她的手说：“阿德，这是你女儿扎西坎多。”我吃惊得看到一个成熟的女子站在我面前，她也同样惊讶地看到一位母亲。起初我们俩都很害羞，手脚都没地方放，慢慢地她走到我身边摸着我的手，我们相互望着对方的眼睛，一会儿俩人都哭了起来。

河还是那条河，也是我唯一看起来还熟悉的东西。我从前认识的人几乎都不在了，当时社会上最博学多才的人都死了，是最早死去的一批人。卡囊寺、甘孜大察尔寺，还有德贡布寺，我年轻时香火那么旺盛，如今完全被洗劫一空，成了一片废墟。甘孜大察尔寺的原址上长满了野生的灌木丛，我年轻时的那些喇嘛、住持都不在了。

文革有段时间，甘孜寺——包括那宏伟的都卡尔唐卡——都被毁了，只剩下一间小房子。这之前汉人抓了看守寺庙的恰荣索南多钦，寺庙被毁后，他被拷上手铐脚镣，在强制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示众，被打成反革命头子。后来他被枪毙了。为了镇住普通百姓，汉人宣布任何人不准给他收尸。他手脚上的镣铐因为勒得太久嵌进肉里，骨头都露了出来。那些看过他尸体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全都忍不住绝望地哭出声来。

甘孜寺的两位活佛蓝达仁波切和西雅祖古幸运地逃到了印度，后来蓝达仁波切在瑞士住了一段时间，几年后又回到西藏。然而另两位喇嘛——萨拉哈仁波切和洛荣纳卡坚赞——却都被迫害致死。

就是看看森林，看看山岗，也能看我们的药材和花木被滥采滥伐，大山都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山。这样的掠夺让我伤心至极。这样完全无视生命的举动该如何解释？

明明是奴役藏人，怎么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美其名曰把我们从一种制度里“解放”出来。那种制度虽然不甚完美，却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家人、房子、财产、土地、宗教、文化，还有我们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他们毁掉我们的森林、动物、花草，企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坏人，没有做人的资格，对我们施以暴力和羞辱，这在汉人到来之前是无法想象的。汉人仿佛是一个被没有灵魂的制度驱使着的民族，这个制度充满了掠夺、破坏、仇恨和谎言。



起初我让我哥哥尼玛带着我的文件到甘孜政府，可他们说要我亲自出面。我走进公安局，被领到一间办公室，一个汉人官员坐在桌子后面抽烟。我把文件交给他，他看了之后警告我说：“你不能和社会上任何人讲话，你要非常小心，不得发表任何会激发甘孜年轻人反对汉人的言论。如果有示威或任何形式的骚乱出现，你都要责任。明白么？”我慢慢点了头，他接着说：“你要是规矩点，就可以待满十五天；要是惹麻烦，就得提前回去。”

我活着的朋友们怕被人看到和我在一起，就趁晚上来找我。我们说着过去的二十一年里各自遇到的每一件事。他们伤心地对我讲起和我一起参加抵抗运动的女人，她们的命运大都一样。有几个和我从小相识，那时我们生活得自由自在，她们是我最勇敢、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可是现在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说起这些事，听的人都哭了，哭得眼睛又红又肿。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和参加抵抗运动的其他女人常说到对我有多感激，感谢我从没把她们的名字告诉汉人。她们总想着今天、明天，或是后天就轮到自己被带走了，所以她们常说我一承担了所有事，为她们受苦受难。可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因为我们是“朋友中的朋友”。最后，虽然对她们的身份我绝口不提，可大多数人我也救不了。那么多人往往只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理由，或者没有理由，就受尽了折磨，最后被迫害致死。我后来听说，那些受折磨死去的朋友甚至把我的事情告诉她们的孩子，说我是如何为了西藏人民的事业和汉人作斗争的。他们曾说，希望对我的感激和敬重之情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白天有警察我们不能去墓地，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我和一个侄子还有几个家人去了我们家族的墓地。我依照旧俗带了各种点心给死者上贡。我生起一小堆火开始对死去的亲人讲话，告诉他们我的遭遇，回忆他们的生活点滴和一起度过的时光。我告诉他们我们所受的压迫，把心里想到的一切都讲给他们听。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对着亲人的坟墓讲了多久，希望他们能多少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

尼玛为我安全着想，劝我离开。他说：“阿德，你不能老沉湎在这些事里，你得学会在现实中生活。”待了一会儿后，我的家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建议说该走了。又过了几分钟，我觉得该做的都做了，于是就走了。



我让一个朋友发誓告诉我儿子的真实死因。我对她说：“我到过墓地了，看到我阿妈、阿爸、哥哥奥确、阿索、夏乐、姐夫贝玛坚赞和姐姐布姆的坟墓，我所有死去的亲人都一个挨一个埋在一片墓地里，可我儿子不在那儿。今晚你必须告诉我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我发誓不会哭，于是朋友向道出了实情：“你被捕后你儿子就疯了。他开始四处跑着叫你，谁都不让碰。他只是独自坐着又哭又叫，谁上前哄他，他就把谁的手咬破，然后撒腿就跑。出事那天他在河边跑，身子失去平衡掉进了河里。没人能救他，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没有人知道我亲爱的哥哥珠古玛的消息，这些年来我听得到的有关他的唯一讯息就是他逃出去了。回到家却不见他，这有多怪啊！我记得我们在一起时的所有快乐时光，千方百计找借口只为能一起待在家里。我记得他的笑容，他的耐心，还有源源不断倾注到我身上的爱。我不知道这辈子能否再和他相见，似乎是不可能了。

我了解到我儿时的伙伴措拉，为我家做出的了不起的善事。措拉是一个牧区的女子，我被带走后她把我女儿带在身边，把她养大。那时她自己也有个孩子，她就给两个孩子一起喂奶。我那

些活着的朋友们悄悄给措拉送黄油、牛奶、奶酪，他们说：“请照顾好阿德的孩子，你们都要活下来。”

我还听说我女儿很快就要和我认识的某个人的儿子结婚了，当然，我没法参加她的婚礼。我不想告诉她太多我的经历，让她相信现在一切都好了，希望她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让她知道笼罩在我心头的愁云。尽管我和女儿都感到了母子连心的亲情，我们却从未真正了解对方。我希望她尽可能地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不让家园被人占领的仇恨毁了她。我担心她对过去的过去知道太多，激起反抗汉人的情绪而招来危险。不管怎样现在措拉是她的母亲。

令人伤心的是，我该准备回砖瓦队了。再次坐上汽车，经过甘孜，我满脑子想的是：“一切都没有了。”所有的痛苦、分离、失去的二十一年时光一齐涌心头。曾经是难以承受的这一切，如今都化为乌有。

回到砖瓦队，仁青和普尔巴都急着想知道家乡的消息。考虑普尔巴年纪大了，我讲的时候尽量避重就轻。我这些年来挣扎着活下来所希望的一切都没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就默默坐在床上，罗看守命令别的犯人拖我去干活，他们却只能站在我旁边无可奈何。

罗看守走进我房间，站在我面前，我从床上抬起头平静地对他说：“枪毙我吧，没关系。”我不能不去想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不在了，想他们受的苦，想一切都是怎么结束的。什么都不见了。这么多年我活下来却什么也没了，现在我不必做任何努力了。我控制不住，大笑起来，有时唱有时哭。一种可怕的狂躁感压抑着我，我开始四处乱走，喃喃自语，完全忽视了周围的一切。我不愿再坐下来，只想不停地动，走路，无视一切，直到再

也走不动了。我的这副模样让劳改队认识我的藏族人很伤心。

一天普尔巴和仁青带我去见一个被关在这里的喇嘛，他非常有同情心，曾学习过一些藏医。他给我施了艾灼（在我身体穴位上烧一种香草），为我祈祷。过了不久，慢慢地我不知不觉开始恢复过来。思想又开始接受周围的事物，我能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无休止的狂躁逐渐消退，又有了坐、放松、活在现实里的感觉。



砖瓦队里有个叫阿索的喇嘛，深受犯人敬重。一天早上他过来对我说：“阿德，我一定要跟你讲讲昨晚我做的一个有趣的梦。”他接着说：“你知道格桑花吧，那种花芳香怡人，我最喜欢了。我梦到自己正经过你的牢房，看到旁边就长着朵格桑花，我想你要好事临头了吧。”那时我从没想过那朵花意味着我将获得自由，而现在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梦的寓意。

1979 年底，我的朋友索南卓玛从砖瓦队获释也让我有了些心动。想到她回到家乡果洛将会看到的现实，我不由得为之发抖，但是能回到家乡毕竟值得庆贺——至少她熬过了这 21 年的炼狱，保住了力量和尊严。我们曾一起被关押在女犯队，当时在田里干活的力气最大的五个女人中就有我们俩，所以我们往往被派去拉犁。这种活又苦又累，我们常常跌到，特别是田地湿滑的时候，不过我们俩都不停鼓励对方要坚持住。索南是个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意志也十分坚强，她不愿在再教育会上讲一句对藏人不好的话。熬过了漫长、疲惫的一天，我们常常在夜里聊到很晚。有时她会给我描述 1956 年在色达“金龙殿”山上的大屠杀。汉人把她丈夫瓦术托洛冰冷的尸体拖到她跟前，警告她这就

是反抗的下场。她一讲起这些伤痛和不幸就会痛哭，仿佛她生命的一部分留在了那座山上。从那时起，她从来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生活。

她快要离开砖瓦队时久久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们俩都明白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远，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她对我说：“我肯定总有一天你会自由，我觉得你不会无声无息地活下去。记住我跟你讲的话：我肯定你会自由，即使整个世界都把你忘了。”



一天晚上干完活我们一起坐着，我姐夫普尔巴转头对仁青说：“我有个请求，希望以后你能和阿德生活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尴尬，我对普尔巴说：“真的用不着，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事，我肯定能照顾好自己。更何况仁青比我小十岁，这在社会上会很难堪的。”但是普尔巴是我们家族活着的少数几个长辈之一，坚持说我该有人照顾我。他说：“仁青心地善良，他会在需要时像弟弟一样照顾你。”

那年晚些时候，普尔巴等大部分犯人都被释放了，我则又被关押了五年。

晚上开会时，曾强制执行旧制度的同一帮人又改口赞颂新政策：“现在邓小平的政策是好的。”每星期不必再做汇报，看守们也不再找我们麻烦。形势更加宽松了。我的家人知道我在哪儿，有数不清的群众支持我。当地百姓不断想办法送黄油、奶酪、肉、糌粑给我。可是我还被拘留着，这是我唯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1980年，我的工作放12头牦牛。早上把牛牵去把泥巴踩

熟了做砖头，我就打扫牛棚、清理前一天晚上吃剩的饲料。到了中午，几个犯人来把牛赶到山上吃草。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向度母祈祷，感谢她让我活着，我也为那些不在的人祷告。祷告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开始期盼自由到来的那天。

到山上去只会让人愁绪满怀，四周全是林木砍伐，环境被破坏的迹象，山坡上只剩下一些树干。一些年长的放牛人说：“共产党没来之前，树林茂密，老虎、豹子、熊也多，人很难在里面走。可现在，瞧瞧他们都干了什么。”他们讲起了这片地方的野生动物是怎样绝迹的。



我最终获释了，大部分是因为我哥哥珠古玛的努力。我的家人知道了他在尼泊尔，一个侄子到加德满都去找他，同行的一个藏族人建议让我哥哥给打箭炉最高权力机关写信，问他们为什么所有人都被放了，只有我还被拘留着。珠古玛写了信，说如果我能出狱，他就到西藏来见我。很快信就到了打箭炉区政府，然后又交到我手中。我读完信，看守问我：“你怎么想的？”我只是直视着前方，然后疑惑地看着他。他说：“你哥哥现在想回家乡了，你准备出狱吧。”

珠古玛还活着。有多久了？我终于知道（几乎是肯定的）我们又能见面了。我突然有种累极了的感觉，不过同时一丝快乐的感觉悄然涌上心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抱任何希望能再见到他。现在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的容貌，好像他一直就在我身边似的。尽管我想解释，可监狱的看守又怎会明白，得知我亲爱的哥哥珠古玛找到了我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低着头，直到让我

离开。

出狱前，砖瓦队一个名叫朱树杰（音）的高官警告我说：“你要千万要小心，不得向外面透漏任何有关你的经历和中国的劳改方式。只要你说了犯人挨饿或是你亲人的遭遇，我们就可以定你的罪。”他接着说：“要是发现你说了这些话，我们就把你再抓起来。”

1985年冬天，过了藏历年后的一天，我和仁青出狱了。

许多犯人来跟我道别，凡是能对我出狱后生活有帮助的东西都尽可能匀出来送我。我有三包行李，里面装了我在果塘嘉果就开始做的小褥子、别人送我的一条较新的褥子、一条棉被、一个杯子，还有几件衣服。有个女犯给了我一件质地很好的朱巴。我获释没有收到一分遣送费，只有几张要呈交给甘孜公安局的文件。

一个侄子来接我出狱，我们坐上了到甘孜的公共汽车。沿途的景象沉闷压抑，一路上经过许多近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堡垒和其它历史遗迹，西藏当地常见的经幡和嘛呢堆⁶⁵（刻有经文的石堆）都看不到了，四处一片凄凉、荒芜。我打量车上的乘客和经过的路人，却失望地发现他们都穿着汉人衣服，脸上没有一丝幸福的光彩。到甘孜的路上我们越过了一连串满载木材的卡车和许多中国军车。

我对侄子说，汉人平民数量迅速增多而藏人人口减少的现状令人忧虑。我问他：“藏族人怎么穿汉人衣服？”

他解释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汉人不准我们穿本民族的服装，羊毛价钱很高，许多人都买不起。现在汉人衣服比藏服更容

⁶⁵ 嘛呢堆，嘛尼石堆砌而成的圆锥形石堆。嘛呢石是指刻有六字真言经的石头——译注

易买到，而且价格便宜。他们也开始卖西式的低档服装，价钱却不便宜。汉人在西藏建了纺织厂，生产四种档次的衣服。前三个档次都运到中国，质量最差的在西藏出售。而且这些年来他们强迫我们剪头发，说长头发反动、不卫生。”他又加了句：“我不记得从前是什么样了。”

我问他：“为什么看不到一面经幡和嘛呢堆？”他说，这地区的小庙一个也没修，西藏东部的寺院要重新修整的，首先得答应政府提出的条件。

我的家乡曾有旖旎的自然风光，是个伟大的佛教圣地，我记得无数个清晨，我站在自家房前等待日出，待朝阳升起，阳光洒在远处甘孜寺的金顶上，在粉红色的朝霞映衬下闪闪发光。我快乐地看阳光投射在岩石上，投射在白雪皑皑的山巅和山下的森林上。如今，洛巴夏周围的山秃了，一片森林也没剩下。

我们从甘孜车站下车，听到大喇叭里播放的是中国音乐。每天早晨七点半广播里就开始连续不断地播送中国新闻、节目、音乐，一整天都是如此，从没听到里面播过藏语节目或是藏族歌曲。公共汽车站的售票处都由汉族士兵把持，所有标志、票券上印的都是汉字。打交道都得讲汉语，这很困难，因为大部分藏族人不会说汉语，几乎所有汉人也从没学过西藏话。

我走在城里，发现过去藏族人刻嘛呢经的石板、石块被用来铺路，这让西藏人有种失落感：朝左右一看就会看到脚边有块刻了经文的石头，在这上面走过真是对神的亵渎。

我们家过去的女佣人楚依卓玛在 1985 年我出狱后第一个来看我，对我说这些年来她都为我祷告，祝愿我在劳改队的平安。从我弟弟口中听到我的那些故事又让她如何的惊恐不安。她本人的生活并不像中国共产党宣扬的，成了一个“自由公民”，这些

年来她都忍饥挨饿，在公社里辛苦劳动。

一天我正在洛巴夏街上走着，碰到了似曾相识的两男一女。我们停下脚步互相打量对方，突然我认出了他们过去是我夫家的仆人鲍碧和索南俊美，还有丹增俄珠，一个年迈的牧民，是我哥哥珠古玛的好朋友。鲍碧那时也很老了，她走过来摸着我的手说：“是阿德么？又看到你真是高兴。我担心你已经死在监狱了，你受了那么多罪。”索南俊美对我说我哥哥尼玛去果塘嘉果时，曾托他给我带去一块黄油。他说他不可能忘记中国政府对我干过的事。“以前我们有那么多自由，我和你丈夫、你哥哥还有他们的朋友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骑着马翻山越岭、喝青稞酒、一起露营、在星光下跳舞。你哥哥珠古玛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神射手之一。你丈夫是个好人，阿德，一个好小伙。”

丹增俄珠拉着我的手说：“如今我们这些留在这儿的不过是奴隶，他们给我们间屋子住，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房子。多年的辛劳如今换得了一些慰藉：一些现代的发明和玩意就想让我们忘记做西藏人的意义。可我们一直记得那些美好的日子，仍然盼望光明到来的那天。”

我被捕后就没见过我丈夫的姐姐热尕，听说她还活着，住在安多某个地方。可我们不知道她丈夫贝玛旺求是否还活着和她住在一起。



中共现在努力营造宗教宽容的形象，1983年起准许藏族人重建甘孜寺。当地百姓看到后为工程的进展感到高兴，但同时想到原来的寺庙悠久辉煌的历史和往昔的宗教自由，又感到深切的

悲伤。

因为那些攻击我的强大的宣传攻势，在我家乡几乎人人都听说过我，就连小孩子也悄悄走到我旁边说：“那个就是阿德，就是那个女人。”所有人都支持我，尽可能给我帮助。我对朋友、家人说：“我在别人的土地上生活了 21 年，只有到 1985 年我才能回到自己家乡的土地，和我女儿住在一起。”

有时我们躺在床上，女儿大声说：“阿妈，这是梦呢还是我们真的在一起了？”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与此同时我又想到我的幸福并不重要。我最珍贵的财产就是在果塘嘉果开始拼补的那条褥子，许多片碎布是从死去的犯人的衣服上剪下的，其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除了满身的伤疤和在果塘嘉果时朋友送我的那顶帽子，这条褥子是我带在身边的唯一能令我回忆起狱中生活的物品。我女儿曾求我丢掉它，她说：“我受不了这东西，快把它扔到河里吧。”但是我没有，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它。



一天，我向一位朋友借了匹马，到曾和夫家人住过的房子旧址去。虽然我感到有必要回来看看，却不敢想能看到什么。一路上骑马前行，却不住东张西望，为所有受苦受难逝去的人祈祷，祈祷光亮照进人心，在心里向被亵渎的山上的神明鞠躬赔罪。我站在一块田地里，那儿曾经紧靠着我的家。风吹着，倍感凄凉。

有时风不知何故戛然而止，所有的感觉就只剩下一片寂静。我望着光秃秃的墙头剥落的墙泥，陌生的路人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曾有个幸福的家。有个年轻的母亲曾在这四壁之内产下她第一个孩子，一个漂亮的孩子。



表面上，中国的政策重心已从完全摧毁所有藏文化传统，转为开始榨取西藏的自然资源。现在政府努力控制不断增长的汉族移民人口数量，以促进地区稳定。为此，甘孜地区正不断进行着军用设施的的建设。

在这些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给西藏人了一些自由，让他们重建家园，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公社制度被证明是完全的失败，于 80 年代初停止了。西藏人可以重新采用传统耕作方法，一些人又可以养牦牛、放羊，生活变得比较富裕。有时我们附近的朋友聚会，会准备许多点心、菜肴。然而我对那些还在世的人说：“吃着这些饭，让我马上就想起那些狱友，心情就黯淡下来。”有很多次，回忆使我胃口尽失。有时我极力想让他们明白，现在不是我开心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狱友、家人大部分都死了，全埋在西藏东部。

渐渐地，我心里产生一个想法：“我要去印度告诉至尊达赖喇嘛，告诉这个世界我碰到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人民在中国暴政下是如何死去的。”除非能把这些说出来，我永远得不到安宁。在我内心，活在西藏并没有“活着”的感觉。

我没能再见到我的狱友才令玉顿，她住的地方离甘孜很远。不过有一天，耶什卓玛来到了我在洛巴夏的家，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说就抱头大哭起来。她说：“阿德，我真高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以为你有了什么不测。”看到我活着从监狱出来，她感慨万千。

耶什卓玛她们家仅能维持生计。她对我说：“我的孩子都长

大了，我们都在学着重新了解对方。有时我觉得好像在和一群好心的陌生人住在一起，很难完全跟他们解释明白我为什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适应新生活为什么这么难呢？”我们两个在同孩子交流时都有些不知所措，很高兴有人能体会到我的难处。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该让扎西坎多知道我多少过去的事情，我很为难。”耶什从包里掏出了一些黄油、糌粑，说：“看，我说过会照顾帮助你的，我们暂且面对现实吧。”她拉着我的手平静地说：“阿德，时间让一切都变了样，我知道适应它很难。”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天，有说不完的话。晚上我们睡在一起，天一亮又开始聊。有时两人回忆起共同度过的岁月就忍不住哭起来。她临走时求我别再跟汉人作对了，害怕我会被他们再抓去。她说：“现在我们只要低着头安安生生过日子就行了。”



1986年，班禅喇嘛⁶⁶宣布访问甘孜。他到访那天，群众手捧哈达夹道欢迎。有二十辆汽车车队护送着他，他坐在一辆敞篷车里朝每个人挥手。比我年长10到20岁的人都哭了，祈祷将来有一天他们能这样欢迎至尊达赖喇嘛和流亡在外的西藏同胞。我拼命朝他发言的讲台跟前挤。

他演讲的中心要点是：“你们都是西藏人，西藏人应当穿藏服、读西藏文、写西藏字，勿忘修习佛法。”我敢肯定在场的西藏人都清楚记得这些话。当然，他只能讲这么多，因为他被严加

⁶⁶ 班禅喇嘛，活佛“班禅额尔德尼”的简称，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驻锡地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此处指十世班禅确吉坚赞——译注

看守着，每一句话都受到监听。尽管如此，这三个要点对我们有重大意义。

班禅喇嘛向甘孜人民发表演讲的地方正好也是中共在这里第一次举行会议的地方。他们在会上保证说心里装的都是我们的最高利益，说他们很快就离开。八年后，也是在这里，贝玛坚赞被处决，我被判刑入监。伫立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面对班禅喇嘛，我想起了许多年前那可怕的一天，想到历经所有磨难而我却活下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为贝玛坚赞祈祷，脑海里浮现出他被处死的每一个细节。那一大片地方叫多果塘，在甘孜的江卡区，不知道现在汉人管它叫什么。

我站在那里回忆这些事，痛苦地感叹逝去的这些年月。我觉得浑身没了力气，要晕倒了。我强自镇定站好，忍住悄然滑到腮边的泪水。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阿希。他少年时因参加布纳塘的战斗被捕，坐了20年牢后，于1979年出狱。他拉起我的手笑着说：“不管怎样，我们两个经受了中共的再教育后都活了下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一起瞻仰班禅仁波切有多幸运啊！”他告诉我他现在在梁茹某个地方过着非常简单的游牧生活，我常常被阿希品质里的某种可爱、质朴所打动，尽管他孩提时就坐牢了，心却没有被那段经历磨硬。知道他也自由了，我感到了片刻的安宁。

班禅来访前，汉人宣布藏族人家不得有活佛达赖喇嘛的肖像。藏族人被激怒了，开始发表抵制班禅演讲的言论。一个藏民说：“如果不让我们在家里摆放达赖喇嘛肖像，我就不去听班禅仁波切讲道。”别的藏民也这么说，最后所有人都达成共识。他们允许我们挂达赖喇嘛的肖像已经有一段时间，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没有人愿意这项权利再受到侵害。那些为汉人工作的藏民

不得保留达赖喇嘛照片，不过有许多人都把他的照片藏在全家照的相框后面。

班禅喇嘛对众人演讲时说：“也许是你们听错了，中国可能不准你们保留至尊的肖像。”他对我们说：“我和至尊比起来我什么也不是，差别之大犹如拇指和小指。”他说他没有权力居于至尊之上。他的话打消了百姓的顾虑，我们开始去听他讲道。

中国官员不喜欢他的这番言论。后来几个藏族职员听到有个官员对他说：“你只要说他们可以保留肖像就行了，为什么你要说你与达赖喇嘛差别巨大？”



汉人有意在甘孜郊外建一座水电站。开始动工挖土时发现了一大片金矿。我女儿现在住在那个地方，她丈夫的亲戚在那儿开了间水磨坊，家中有十口人在磨坊干活。

他们对我和仁青讲，我们受了那么多苦，现在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可以淘些金子开始新生活。关于是否允许我们开采金矿，我们和汉人方面有很多争论，最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竟不干涉了。我们采了四个月金矿，挖土、滤沙，等我们快要在水里洗出金沙的时候，有人来了，站在近旁边看边称量。不管淘来的金子都多少，政府只给我们一半价钱。我一共淘了 65 克金子，仁青淘了 70 克，最终我们只拿到了 3000 块钱。那段时间我们干得很辛苦，我的力气都耗尽了。后来有段时间我路都走不成，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很难。不过仁青安慰我说：“现在我们变得这么亲近，休息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期待已久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一天，我尼泊尔的哥哥寄来一封信，信上说：“你来加德满

都见我吧。你可以到拉萨还有尼泊尔的各个佛教胜地朝圣，然后我们一起回甘孜。”我把信给甘孜公安局的人看，当局的人告诉我：“现在你最好是休息，和你女儿老实过日子。你可以让你侄子去见他。”我不理这些话，说：“让我侄子去没用，我哥哥不见到我是不会回来的。”

在汉人眼里，我哥哥这是同流亡的藏族人决裂，回到“祖国”的怀抱。政府官员开会讨论是否该让我去。汉人领导反对我去，他们说：“让她离开甘孜将带来极大的不利，对我们的政策是一种挫败。”藏族官员提醒他们：“他哥哥去拉萨以前是甘孜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协委员。”强调他这次回来的重要宣传意义。

几天后我被叫到公安局，说我到尼泊尔去的申请批准了，不过我和哥哥必须尽快回来。公安想说服我，让我相信我和珠古玛回来后他们会给我们安排得很好。他们说：“死在异国他乡，骨头埋在外面多没意思。只要你们回来，我们就安排你们进甘孜地区的政协，能进那里的人屈指可数啊！”尽管我不相信那样的委员会会有什么实权，不过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假装同意。我对他们说：“我哥哥回到家乡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前委员会主席，他会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的。我认为他将为统一的祖国做出很大贡献。”

一个官员说：“你还必须记住，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内部矛盾要在国家内部解决。”他实际上是暗示我，我不能对外界讲西藏的反抗斗争、死刑、饥荒、监狱暴行，以及西藏人民遭受的所有苦难。

我和仁青坐了七天汽车到拉萨，沿途遇到一件事让我们很吃惊，成百上千辆卡车载着羊毛、兽皮、木材迎面开来。每经过一

辆卡车，我们就仔细瞧里面装的是什么。晒干的兽皮堆得很高，有的卡车装满圆木，一直堆到车顶。

西藏随处都可欣赏到美景的地方如今大部分都充斥着汉人的混凝土建筑，看上去像一个个火柴盒子。汉人的房屋有几百座，而大部分的藏民小村落都在山上，房子又小又破。显然我们的“解放者”们自己拿走了这块儿土地上最宝贵的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到圣城拉萨，也是我孩提时代一直梦寐以求的朝圣之旅。我们到了之后，不等停下来找住的地方就去了大昭寺和小昭寺，接受了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宝冠释迦牟尼像⁶⁷和米觉多杰佛⁶⁸像的赐福。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塑像分别代表八岁和十二岁时的佛祖。据说这两尊佛像是佛祖在世时印度塑造的四尊佛像里现存的两尊，曾受过佛祖亲自赐福。七世纪，这两尊佛像来到西藏，自此一直被认为是西藏最神圣的宗教珍宝。

大昭寺的环境现在看起来很怪异。穿过宽阔的，铺着石板的广场朝前走，四周看不到藏族房屋，看到的只是新建的火柴盒模样的混凝土房子，还有两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看上去十分丑陋。快到寺庙时我们扑倒在寺院前被一代代朝圣者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感谢佛祖让我们安全到达。在大昭寺外的院子里买捐献用的哈达时，我们看到一排身穿汉服的商贩，走近一看，很明显所有卖佛教祭品的商贩都是汉人。

我们重新回到朝圣人群里，朝寺院一个白色的大香炉走去。这座漆成红、白两色的庙宇入口的屋顶上，明媚的阳光照耀着镀

⁶⁷ 宝冠释迦牟尼像，唐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时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现藏大昭寺。1409年宗喀巴给该佛像献金制五佛冠，故有“宝冠”一说。

⁶⁸ 米觉多杰，尼泊尔尺尊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时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八岁等身像，现藏小昭寺——译注

金的佛教宝器——八幅金轮，金轮两侧各有一只可爱的小鹿。我们转着大经轮，祈求佛祖保佑我们的信仰，然后入了寺，慢慢走过伫立在两侧的石雕神像。

我如同走在梦里，因为从没想过我有天会来这里朝圣。那一刻，我的整个一生就像是一场梦。在那座神圣的寺庙里，亲眼目睹藏人对神祇的敬畏，实在让人感慨。尽管大多数香客都衣衫褴褛，他们的眼里却闪射出虔诚和坚定的光芒。

大昭寺没有躲过文革浩劫。1975年，寺里许多塑像被毁、墙上的壁画被损坏，许多和尚不是被杀就是遭毒打被关押，寺院成了猪圈。甚至到了1987年还有许多厢房被封着。大昭寺只有一尊塑像在文革期间逃过了被破坏褻渎的命运，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像，它被几个和尚藏了起来。

我们参观大昭寺时本想在释迦牟尼像前祷告，可我们没有时间冥想、念经，每个人都得排队，一到寺里就听见有人说：“快走，别停下！”有一天仁青实在受不了这种骚乱，不由得大声叫了出来：“愿活佛回到布达拉！愿西藏重获独立，过上幸福生活！”只见寺庙管理员紧张起来，说着：“好了，好了，请……”

我听说了小昭寺里米觉多杰佛像被破坏的故事后非常伤心。为了便于运输，这座巨大的塑像被一分为二，下半身留在西藏，后来被和尚们藏了起来，完好保存下来；塑像上半身运到了中国，上面的镶嵌的宝石、金叶子被挖走，剩下的就丢在北京郊区一座仓库，里面存放了数不清的被破坏的塑像。

1981年，西藏代表到北京参加一个宗教会议，代表中有个色拉寺的喇嘛叫热布祖古，他请求返还文革时被抢掠的西藏佛教宝物。代表们的请求遭到拒绝，不过那一年北京政府又收到班禅喇

嘛和安多的几个高层喇嘛的更多请求，最后，由于这件事被看作是对北京当局新自由政策和宗教自由的一次检验，当局决定准许热布祖古和为数不多的一群藏人访问中国。他们发现了躺在灰尘里的佛像的上半身，安排把重达几十吨的塑像送回到了西藏。

米觉多杰佛像回到西藏后得以重新修复。1985年，文革时受到破坏的小昭寺的修复工作也接近尾声，珍贵的佛像又回到它的莲花座上。小昭寺里的其它佛像都是仿照原来佛像新做成的，没有通常佛像所包涵的珍贵的宗教纪念意义，只是一具具空壳而已。

仁青和我讨论着沃米觉多杰佛像的命运，我闭上眼睛回忆起劳改队的往事。那天太阳烤着我的肩膀，我跪在地上朝周围扫了一眼，确定没人注意我。然后用朱巴擦去一颗小土豆上的土，又朝四周看了一眼，张口大吃起来，嘴里是没擦净的沙子混着土豆淡淡的淀粉味。突然，外面路上一队卡车开了过来，车上装的粮食在阳光下闪亮耀眼。

我和仁青也去了布达拉宫。几百个房间只有极少数几个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说那一刻很悲伤，因为至尊达赖喇嘛并不在宫内。他的宝座空着，一条哈达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我看到有年老的西藏人哭着为西藏独立、至尊重返西藏祈祷。有两个老妇人泪如雨下，我听见她们哭道：“不看到至尊回来的那天我们就不死。”在罗布林卡⁶⁹感觉也是同样的悲伤。

我们从家乡带去了很多上好的酥油，做酥油灯献给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还有拉萨其它寺庙用。我们为在中共占领下死去的所有狱友祷告，希望他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我在心里跟他们讲话，告诉他们我还活在这世上，我在拉萨替他们捐酥油。在

⁶⁹ 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译注

这些圣地做这么多捐赠，我得到了一些宽慰，尽管我知道我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我和仁青讨论中共的魔掌如何伸得这么远。他们把我们最神圣的佛教圣地变成汉人的地方。走在路上听到的是汉人音乐，市场上买的是各色汉人商品。仁青低头看了一个摊位上摆放的货物，转头对我说：“我们怎么办？一切都被他们控制着。”

我们在拉萨的那段日子，有幸碰到一些藏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有家人听说了我漫长的经历后免费让我们住宿，还给我们讲哪些地方最有名，哪里的街道不安全。他们说拉萨郊外有三个主要的监狱：扎布奇、桑伊和古察，警告我们在城里不要和外国人打交道或是做引人注意的事。他们还劝仁青别带刀，因为很有可能会被没收了。他们说我们去印度可以见到至尊，真的是天大的福分。

现在我们开始高兴起来，因为我们的脚步距离印度和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脑海里也不断浮现出狱友们挨饿、受折磨、被处死的情景。为了避免一直沉湎在痛苦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捐献。然而，每当我踏进一座庙宇，脑海里总浮现出狱友的脸庞。

一天我们去布达拉宫下面的小湖里捕鱼，一个汉族男人朝我们跑过来说：“要照相么？你瞧这相质多好，看这个。”于是我们就在湖边留了影。后来我们知道这座人工湖是六十年代末由强制劳动的藏族孩子修造的。他们都是在阶级划分中被划为高成分的那些人家的子女，有过去的西藏政府官员、贵族阶级、喇嘛或神职人员、地主、军人、商人、艺术家、作家、学者等。大部分的拉萨居民都被划到了这类人里。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们的子女不许去上学，却在西藏各地修公路。这座湖在拉萨藏人中

间，被看作是“孩子们受苦受难的纪念地”。

我把离开西藏的通行证拿给拉萨公安局看，告诉他们我是去尼泊尔把哥哥接回来，因为我不想让他死在外国。他们听到这话很高兴，不过我很难拿到去尼泊尔的签证，我在甘孜足足等了四个月他们也没有给我签发。

我去见拉萨的一位喇嘛问卜吉凶，他对我说：“我感觉你要是和一群离开西藏的人一起走，没有签证也能到尼泊尔。”他还提醒我，拉萨有可能爆发抗议活动。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出发前往加德满都。

第十四章 自由

拉萨东边那条路通向岗巴拉山口⁷⁰。按照西藏的传统，高山关口处都会有石块堆成的嘛呢堆，上面插满了登山成功者的经幡。来到此处的旅人都会在上面加一个石块，以示对山神的尊敬和虔诚。仁青和我看到岗巴拉山口旁还有一座嘛呢堆，十分欣慰。我们迫不及待地祈祷，求神保诺我们从尼泊尔到印度一路顺风，保佑我们有一天我们能与至尊一起返回独立的西藏。我们每人添了一个石块，在绳子上系上哈达，继续上路了。

从山口走下，羊卓雍错⁷¹碧玉般的湖水映入眼帘。羊卓雍错是西藏第一大湖，不用说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湖，湖面伸展到远方，和天际的群山交汇在一起。整个湖面虽然宽阔，却一片静谧，在阳光照耀下呈现出诱人的淡青色。

我们一行人到了日喀则，班禅喇嘛的寺院——扎什伦布寺就在此地。不巧的是，天色已晚，没时间做礼拜。待了一夜后，又在贸易城叶努待了一天。

最后到了樟木，西藏东部边界的最后一站。海关人员要检验行李，问我们去哪里。我说：“我们要把哥哥接回来。”警卫说：“噢，很好，”只问了这一个问题再没有别的麻烦，我们就被放行了，尽管当时我们两个连最起码的尼泊尔签证都没有。

樟木坐落在山上。要进入尼泊尔，必须先步行五里，再过一

⁷⁰ 岗巴拉山口，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贡嘎县之间，海拔 4880 米——译注

⁷¹ 羊卓雍湖，西藏三大圣湖之一，位于山南浪卡子县境内——译注

座桥，桥中央就是边界线。即将离开西藏的土地，就要进入尼泊尔的地界，我向度母祈祷，求她保佑我们顺顺利利到达印度。

边界线另一边便是尼泊尔，有位藏人独自站在那儿。过桥时，他走过来，和我们握了握手，问我：“你是阿德吗？”我问他是谁。他说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我长得和哥哥很像，当时就是我哥哥送他来尼泊尔的。

从拉萨到尼泊尔整个行程用了五天。一下子，我们自由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西藏，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到目的地时，有些激动，也有些震惊。现在只能往前看，面对我们将会面临的各中可能性。想想那扇铁门在我们身后砰然关闭，不由得让人感到无法忍受。又走了十个小时，来到了哥哥在加德满都的家。

我们的到来惊醒了正在梦中的珠古玛。三十三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凝视着对方，发觉彼此都老了很多。哥哥已完全是位老人，满头银发，瘦削的面庞布满皱纹。“好可怜的哥哥。”我边想着边拉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和他拥抱在一起。我们谈起过去一起在草原欢笑，骑马的时光，一起仰望星空的日子，和这些美好岁月消失后的漫长的年年岁岁。直到天亮，窗外传来鸟鸣，珠古玛说：“我们还是睡一会儿吧。”

珠古玛告诉我，1959年从西藏逃出之前，他是一名在罗布林卡宫保护达赖喇嘛的康巴护卫，后来事变发生，至尊最终背井离乡，离开西藏。哥哥向我解释共产党如何在默朗木祈愿大法会（藏历新年十五天后的一个盛大的祈祷节）那天，过来邀请至尊观看在中国驻地举行的戏剧表演。至尊很迟疑，因为时间太不合适：当时他除了要主持节日，还在勤奋地准备格西学位的考试，为了通过这次考试他付出了半生的精力。

几天后，就在至尊要去罗布林卡宫期间，藏人发现了件怪

事：自拉萨被占领以来，站立在道路两旁向至尊致意送行的人群中，第一次没有见到中国人。

不久，共产党把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库松德鹏叫到中国军队驻地。谭冠三⁷²将军告诉他，达赖喇嘛必须确定起程的具体日期，最好是三月十日。谭冠三说这次出行，达赖喇嘛的日常陪同人员，包括那位行影不离的内臣，都不得同行，通向驻地的路旁不得站有佩带武器的藏兵，驻地周围一定范围内不允许有藏人。他还强调一切准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

如此不同寻常的命令，中国军官如此冷漠的态度都让库松德鹏十分警觉。他知道想使至尊的行踪不被人知晓根本不可能，尤其是现在拉萨全城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朝拜者。当时拉萨城内有众多康巴人，共产党早就开始了宣传攻势，对康巴人大加诋毁，说他们是“邪恶的反动派”，“帝国主义的爪牙”。

四位来自西藏东部各地区的高僧曾被邀请观看类似的戏剧表演，从此再没有回来。三人被谋杀，一人被投入监狱。人们更担心的是，中国广播最近播出了一条通知：达赖喇嘛很快就要访问中国，虽然他从未同意做这种访问。

就在拟议中的表演开始前一天，拉萨人自发起来要保卫至尊达赖喇嘛。大约有三万人包围了罗布林卡，不让他离开这里前往中国营地。人们高喊着口号，要求共产党从西藏撤出，要求中国停止干涉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统治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局势越来越紧张。

当时，有五批男子从甘孜来到拉萨，他们都表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宗教政府。寺院很同情这些康巴人的处境，但不

⁷² 谭冠三，十八军政治委员，和张国华将军率领十八军侵入西藏。1959年镇压拉萨民众的总指挥——译注

久寺院便被封了，再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汉人占领寺院不久，逮捕了甘孜的领导人鹏措嘉措。一些康巴人和人民大会的成员（人民大会为一民间组织，西藏第一支重要的反共组织，成立于西藏首次饥荒）试图发起反抗，他们逮捕几个汉人官员。随后，共产党在拉萨投入了更多兵力及武器装备。

一支志愿军组织起来。离开拉萨的士兵在城郊重新组织，留在城里的看守马匹、牲畜及军火。同时派战士携带资金与军火通知拉萨山南地区的卫国卫教志愿军战士总部。余下的人仍驻留拉萨，保护人民，监视道路，如果有必要，将采取游击战术。

想到至尊面临的危险，战士们悲愤欲绝，他们团结一心，立誓战斗到底。人民大会的首领联合康巴人和安多人，去会见噶厦，即西藏内阁。在这群人里，来自甘孜的贝玛南加拥有最高的军事头衔。他带着一些士兵去见内阁。见面后，噶厦成员保证达赖喇嘛不会试图在中国营地与共产党会面。97位手持武器的士兵在贝玛南加带领下负责保护罗布林卡宫的主要入口处，我哥哥是其中之一。另外选出六七十位领袖组成委员会，他们发誓誓死保卫宫殿，保护至尊。还有七十六位战士自愿去守卫大昭寺和其他重要圣地。

三月十六日，达赖喇嘛收到共产党的通知，要求他说出下榻的具体地点以保证安全。他没有告诉共产党自己的具体位置，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中国政府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有可能不使用重型军火。下午四点，两枚重型追击炮弹从中国营地射出，落在了罗布林卡宫东大门外的沼泽上。

此时毫无疑问要准备安排达赖喇嘛出逃了。夜幕掩护下，藏军派出百名士兵守卫在布达拉宫东南部一条名叫吉曲河⁷³的浅水

⁷³ 吉曲河，拉萨河流经拉萨市之一段——译注

渡口。夜间，达赖喇嘛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先从宫殿撤出，达赖喇嘛化妆成一名士兵紧随其后。

当时拉萨大约有三万到五万中国士兵。整座城市被十七门现代重型榴弹加农炮重重包围。共产党还未发觉达赖喇嘛已离开拉萨，尽管当时有成千西藏人包围着宫殿，共产党仍然在3月20日凌晨两点炮轰了罗布林卡宫。炮击整整持续一天。之后共产党又把大炮对准了拉萨的其他地方，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周边寺院，打死打伤大量战士及平民。著名的藏医学院——药王山⁷⁴——几乎被夷为平地，第二天，所有抵抗人员都被炸死。

拉萨三大寺中色拉寺和哲蚌寺遭到严重破坏，寺内珍藏的无价珍宝和经文被毁；甘丹寺损坏稍轻，寺院内成千僧人死的死，抓的抓。罗布林卡宫和躲在那里的藏人遭受了八百枚炮弹的轰击，寺院内外尸体成堆。第一天轰炸结束时，共产党进入罗布林卡一个个地翻转尸体，搜寻达赖喇嘛。他们下命令炮轰拉萨时就已经横下心，宁愿把他炸死也不让他逃走。后来，共产党没有找到达赖喇嘛的尸体，很明显他已出逃，个个被气得火冒三丈，声称达赖喇嘛“已被反革命叛乱分子劫持”。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月二十八日，中国宣布解散西藏政府。

珠古玛继续说：“轰炸期间，许多建筑的墙壁被打垮，房屋成了空洞的门廊，树木被炮弹连根拔起。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拉萨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未见过这么疯狂的、迅疾的毁灭，也从未想过世上会有这样的毁灭。”正说着，仁青桑珠给我们上了杯茶。珠古玛谢了谢他，呷了一口茶，继续说：“轰炸期间，我和一队

⁷⁴ 药王山，在布达拉宫右侧，为一尖顶山峰。五世达赖时期，在第巴·桑杰嘉措主持下，开始组织各地僧医在此学习，整理西藏医药学，以后逐渐发展为藏医研究与教育中心——译注

康巴人从罗布林卡逃了出来，到了布达拉宫的军火库。看守者吓得动弹不得，我们拿了钥匙打开库门，每人拿了两三把步枪，在藏袍里装满子弹，重新加入战斗。我的六位朋友不久便被打死。剩余人群开始途步向尼泊尔逃去。我们和更多带有重武器的康巴人一起逃向尼泊尔。快到边界时，我们发觉共产党的战机在监视我们。战士们竭尽全力击落了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暴露了目标，共产党知道了山区藏有武装藏人，就升高了飞行高度。

“此时，朋友们和我目睹了共产党军队对平原上的藏人进行血腥轰炸的景象。我们利用山边的有利地势，通过双目望远镜看到空地上惊慌失措的藏人四处奔跑躲避飞机，可惜根本没有藏身的地方。”

珠古玛继续说，他刚到印度时，被送到了阿萨姆邦一个叫米萨玛里的地方。最初到达的是僧人和参与战斗的康巴人。开始的几个星期，人们受了极大的痛苦，完全不适应当地的饮食，供水也遭到了污染，许多人染上了致命的阿米巴痢疾。晚上到处都是蚊子，嗡嗡声不绝于耳。气候跟西藏大不一样，单单是高温就夺去了许多藏人的生命。有段时间，好像每天至少死亡一人。”

“受至尊的护佑，没有人对我们横加干涉。没有人要求我们不能去这儿不能去那儿，或是不能做生意。”从那时起，珠古玛过上了自由的生活。他在山里做了好几年的搬运工，有时去修路，最后挣到了足够的钱，不仅在尼泊尔安了家，还在加德满都开了一家小商店。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再结婚，总忘不了留在甘孜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已经八十二岁，成了一位虔诚的修行者，总是点着一盏酥油灯，大部分时间在打坐，转经，祈祷神灵让世人早些觉醒，让世界不再有贪婪与不幸。

西藏西北部⁷⁵有座山叫迦拉萨山⁷⁶，山上有座寺院叫普朗库恰觉沃寺。传说很多年前，一天晚上，寺门虽然锁着，寺内的佛像前却出现了一包银子。人们看到银子，确信这不是凡人所赠，便用银子给佛像镀身，剩下的作了钵盂和酥油灯。

珠古玛的一些朋友是匠人，他们亲眼目睹了汉人用枪指着藏人头部，强迫当地人捣毁庙宇，向寺院撒尿来亵渎神灵。这次破坏后，一些尼泊尔搬运工偷走了庙内的一盏酥油灯。珠古玛从搬运工那儿买来了这盏灯——就是现在他一直点的这盏。即使吃不饱，他仍要先保证灯内有油。五十岁那年，他决定终生修行。在尼泊尔，他共转了 10 万转的经筒。珠古玛告诉我们，他青年时犯了很多罪，现在所能做的只有虔诚地赎罪、积极地修行。

珠古玛上了年纪，独自生活很困难，我们见面时他还正患痢疾。我们帮他收拾床铺，洗衣服。后来他对我说：“你要照顾我，你必须先去见一见至尊。只有你做了这件事，我才安心。”这样，一天早上，我们搭上一辆汽车，向那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进发，一切都和我们所知道的不同。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前行，透过窗子向外望，印度人独特的衣着使我们惊讶。我们看到虽然印度有很多穷人，但他们行动自由，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到的地方。比起来，我的国家的情形实在令人伤心。同时，能来到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的国家又令人无比兴奋。很快就能见到至尊了！我感到阵阵喜悦，像长时间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被突然搬走了，一切重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当时的感觉，就跟要回到童年的村庄一样，心中装满了期

⁷⁵ 应为西南部——译注

⁷⁶ 迦拉萨山，即冈底斯山。是佛教、本教等宗教的圣山。迦拉萨之名来自梵语——译注

待。知道大家都在等待你，知道那些曾是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朋友会欢迎你的归来。虽然被遥远的距离和许多障碍所阻隔，关于他们的记忆一直留在脑海中，时间的蹂躏与考验并未阻止注定的重逢。不久，要不了太久，重逢就在眼前了。

路上我们吃了些面包和达尔⁷⁷。我以前从未见过柑橘，觉得很好吃。仁青不喜欢尝试新的事物，不愿吃任何看起来奇怪的食物。和西藏比起来，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不同，却又那么欣欣向荣。

我们一路来到瓦拉那西，至尊正在给众多信众讲学，其中大多数是藏人。后来，我听一位妇女对其他人说：“噢，我现在非常高兴，我受了达赖喇嘛的赐福。”一边说，一边欢欢喜喜地离开了。我绝不满足只是远远地看到至尊，这根本没有达到我这次印度之行的目的。仁青和我决定留下来等待时机。不久看守告诉我们必须离开。

当然，我们两人都不会讲印第语或英语，但是我们决定想办法乘车到达至尊的驻地。在车站我们不停地重复着“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两个词。我们乘了好几辆车，希望能有一辆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我像在来尼泊尔的路上一样，向西藏的护佑神祈祷，求他保佑我们。离开瓦拉那西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到了一个汽车站，当时天色已晚，一些印度人在车站周围走动，仁青走到一个人面前，用藏语问车站的名字。看起来那个人不明白仁青在问什么，我们也不理解他的回答。当时我们没有精力再去想什么可以让他理解的方法。想到早上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车站，那时或许可以找到能提供帮助的人，我们决定在寒夜里等候。我们在露天的长椅上休息了一会儿，最后还想法睡了几个小时。

⁷⁷ 一种木豆做的印度菜肴——译注

早晨，车辆和别的响动吵醒了我们，不一会儿，耳边全是人们用印第安语高声快速的交谈声。我们迷茫地坐起来，后来我看到了一位藏族妇女便问她：“这是哪里？”她回答说：“你们在达兰萨拉。”我非常高兴，招呼仁青：“仁青，我们到达兰萨拉了，你不用再担心了。”

我们被领进了客人休息室，歇了一会儿，又沿着山路来到至尊所在的寺院——南嘉寺院，为平安到达致谢。在休息室内，有人告诉我们至尊已经知道我们来了。

上达兰萨拉⁷⁸住着一些藏人和印度人，可以见到一些挂着印度招牌的商店和餐馆。这儿有很多藏人，大多数妇女都穿着传统服装，少数西方人穿着奇异的、五颜六色的鞋子和衣服。我们看到笑脸盈盈的藏人孩子和汪汪欢叫的小猎狗在街边跑动。城镇中心是一座小庙，挂着黄铜的转经轮，人们走过时会转动经轮。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难民——一无所有，刚刚来到此地，正在努力调整，以适应自由的生活。

几天后，有人领着我们去见至尊达赖喇嘛。就在被领进会客厅，看见达赖喇嘛的一瞬间，狱友们饿死之前向至尊祈祷的声音一下子在我的心中响起，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变得无比伤感。但是我马上意识到：“我没有时间伤感，否则我就可能尽不到我的责任。”至尊正在等着我们，望着我们。我一步步地走近这位自己一生都等着要见的人，仿佛也感到了那些念着他的名子默默去世的人们的渴望。我太激动了，连叩长头都忘记了——我鞠了一躬，连忙在离他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一个劲儿地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至尊让我们往前坐，直到他说第三遍时我们才稍

⁷⁸ 上达兰萨拉，达兰萨拉有上达兰萨拉、下达兰萨拉之分，两地相距 9 公里。上达兰萨拉又称麦克里昂-甘曲 (McLeod Ganj)，是达赖喇嘛府邸所在。

稍向前移了一点。我不敢过于靠近他，是担心衣服上那些从劳改营里带来的污垢，还有来印度时的一路风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遭遇了那么多的兽行，感觉自己的身心内部也带着污秽。我说每件事时都低着头，生怕那些污秽会随着我的口气传向至尊。我向至尊讲述了宗教社区是如何消亡的，那么多的藏人是如何被杀死的。还好，这么多年我想要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我都一一给他讲了，一件都没有遗漏。

听我讲到纳确寺监狱中那些喇嘛的命运时，至尊很伤心，也很感动，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我仔细地叙述了狱友们的状况及劳改营的生活条件，至尊静静地听着，一脸严峻。

至尊问我是想回西藏还是留在印度。我告诉他：“我不打算回去。”他建议我保持冷静，告诉我现在不是为所受的折磨感到难过的时候，我应该坚强。他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轻声问我们共产党怎么可以用这种非人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类。

至尊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已经受了这么多折磨。你现在应该把你的经历写成书，以告慰死者，警示生者。”他眼中充满了激情，他的神情让我明白我们不虚此行。随着至尊低下头祈祷，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寂静。

接下来，仁青给至尊讲述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整个会见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离开时，我们感到收获很多。

后来我又见过至尊几次，他询问我有关写书的安排，要我想办法要找到一种方式把我的经历纪录下来，哪怕只是用磁带录音也好。可是，因为我不识字，这件事一直拖到 1990 年才开始做。

我们回到尼泊尔，珠古玛非常高兴。不久，我想：“既然我已经向至尊达赖喇嘛说过了这些事情，现在该是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些事的时候了。”当然，除了西藏，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中国长期对藏人进行宣传洗脑，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拿“美国”这个标签朝犯人身上乱贴，因此，那时候我们认为西方人就是美国人。

一天，我在切菜，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原来是德臣望姆希瓦仓。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1956年我们分手时都还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我不敢想像我们还能见面，现在我们几乎认不出对方了。我是小姑娘时，喜欢戴一条镶有四块猫眼宝石的项链，再擦一些进口护肤膏。现在我穿着一件破旧不堪、很不合身的朱巴，满脸沧桑。德臣望姆说我看起来就像是经历了极大痛苦的人；我也很吃惊，发现她老了很多。

现在的德臣望姆穷得连耳环都戴不起，她把珠宝卖了补贴家用。她告诉我希瓦仓一家去拉萨时，由于达赖喇嘛的邀请，被安排住在别墅里。离开西藏后，他们在印度北部的卡林朋待了一段时间。1962年，到了印度南部的毕拉固贝难民营。德臣望姆告诉我，炎热的天气，出没着大象及其它凶猛动物的原始丛林，使刚到印度的藏民受尽了折磨。藏民要建房子、要开荒种地，就必须先清除这些动物。他们经历了疾病、灾荒，以及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几年后，藏民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社区。我们讲着各自的生活经历，时常激动不已。然而，当记忆如一群生灵再次从栖息地醒来，活生生浮现在眼前时，我们陷入了长长的沉默，仿佛是那些记忆太珍贵太脆弱，经不起我们的高声谈论。

第十五章 死者与生者的见证

1989年1月前后，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官员米歇尔·巴哈娜来采访我。米歇尔是第一位和我谈话的西方人。这时离上次和至尊会见大约有一年时间，自从回到尼泊尔后，我再没有和任何人谈起我的经历。我很高兴见到米歇尔，也很害怕，不知道共产党会对我的家人做什么。她问我的名字，我没直说：“我叫德臣拉姆。”谈着谈着，我最终决定告诉她我真实的生活经历。后来米歇尔告诉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情，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理解西藏，支持西藏。”她告诉了至尊，西藏政府也得知有我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不久，我被邀请参加1989年4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一届西藏问题国际听证会。听证会之前，我们得知，拉萨有一万藏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中共对西藏的统治。3月5日，中共宣布对拉萨实施戒严。

从机场坐车到波恩的路上，我看到到处都干干净净，整个国家看上去一片欢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无人践踏的草坪和绿地，牲畜栖居其间。牛群、马群自由自在，四处嬉游，有吃不完的青草。看到西方的牲畜都这么自由——比生活在西藏和其它地方的许多人都自由很多，我不由得哭了起来。我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让自己变得平静，这样到了波恩才不会失态，不会辜负人们各种各样的期待。

应邀参加听证会的人，除了我和仁青桑珠，还有一位刚从西藏来的难民——洛桑津巴，一位年轻的僧人，1987年从拉萨逃了

出来。

听证会得以举行主要得益于佩特拉·凯利和格特·巴斯坦的推动。佩特拉曾说如果这次听证会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她就从她参与创立的绿党退出。早在佩特拉开始她的事业之初，就致力于改善人权，避免战争，推进环保。成立绿党并入选议会后，她很快提出了一些国家为金钱利益而压迫人民这类棘手问题。

格特巴斯坦以前是德国军队的一名军官，1982年，为反对核扩散，从军队退出。他加入了绿党，并入选议会，一直任职到1987年。我们在波恩与佩特拉和格特首次会面时，由于语言障碍，再加上与会者众多，不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了之后，我们三人决定给他们献上象征纯洁的西藏事业的哈达。佩特拉和格特是那种天生含蓄，彬彬有礼的人。他们的蓝眼睛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蓝色的眼睛，也看到了他们对我们的真诚关心。我们把哈达围上他们的脖子，他们反复地低声说着“谢谢”，很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没过多久，他们便热情地笑了起来。我内心充满感激，发现自己和这些从未谋面的人成了朋友。佩特拉握着我的手说：“朋友，我们十分高兴你能来这儿，为你们的人民主持正义。”

德国遇到一切我们都感觉新鲜。我们住在德国政府经营的一家酒店，房间在39层，住了三天，见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玻璃门自动开合，我们寻思是谁打开的；乘上电梯，还以为踏进了一辆没窗户的公共汽车。电梯速度很快，吓得我用双手抱住头。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电梯在直线上升，一下就到了酒店顶层。

西方人的用餐方式也让我和仁青疑惑不解。他告诉我：“我们最好仔细看看西方人是怎样吃饭的，看他们怎样用刀叉。”在西藏，我们根本不用叉子。吃饭时总是学着别人的动作。同时，

又假装习惯了这一切。直到真正学会使用餐具前，我几乎总吃面包。三天后，我们离开了酒店，一家西藏人邀请我们住在他们家。

仁青和我有很多事想在听证会上讲。虽然我们在达兰萨拉时已经练习过，仍然拿不准能不能在短短的指定时间内说清楚我们想说的。等待发言时，会议厅强烈的灯光使我的眼睛很不舒服，后来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副太阳镜。我内心激动异常，边等边想：“这一天终于到了。为了这一时刻我等了三十年。”向在场的每个人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证，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想到这儿，我不再紧张，只有一腔感激之情。

有四位中国媒体的记者出席了听证会。当然，在西藏，任何人如果像今天这样公开讲述这些事情，就会立即逮捕拘留。听证会期间，想到我们现在享有的自由和过去所受的奴役，真觉得有天壤之别！

等待发言时，我反复回忆监禁期间那些最重要的事件。但等到那一刻终于到来时，我发现根本无需考虑，因为我是在讲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事情已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我的同伴们受苦受难的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没多久，我发现代表团大多数人都流下了眼泪。我还发现中国媒体的代表一脸气愤，急躁不安。听证会结束时，与会者一致通过，签订了“波恩宣言”。

在波恩期间，我们与佩特拉、格特及其他一些人参加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他们给了我机会让我高举着一面西藏大旗——此情此景，我在自己的祖国想都不敢想，在西藏挥舞藏旗马上会被定罪。这一刻让我最真实地感到我和仁青真正正获得自由了。

一天，和朋友一起步行，仁青看到路边的一种野草，指着

说：“许多藏人，包括我们自己，在灾荒年间都吃这种草。在劳改营，趁看守们不注意，我们就开始找这种草吃。”格特告诉我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那段艰苦日子里，德国人也靠吃这同一种野草充饥。佩特拉告诉我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给世界带去了太多的创伤和恐怖，或许现在，通过召开这次听证会，我们德国人总算可以为世界和平做一点贡献了。”

在波恩时，德国规模不大的西藏人社区居民都聚在一起和我们会面。他们非常高兴见到最近才从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也很高兴分享我们的经历。这里凝聚着一种伟大的团结精神，当然，提起往事大家也免不了伤心落泪。

我们在德国期间，当地一位头面人物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提供在德国的永久居住权。他告诉我们：“你们两人一生受了那么多苦，现在你们可以留在德国。不用担心生活问题，会有人照顾你们的。”我们十分感激他的慷慨帮助，但是我说我哥哥在尼泊尔无人照顾，况且我们自己并不重要，大多数藏人还处在水深火热中，我们个人的舒适与富有什么意义呢？

跟佩特拉和格特道别时，我们感到彼此已成了亲密的朋友，对他们充满感激，感谢他们对至尊及西藏事业强有力的支持。亲人之情将永驻我们心间。我告诉佩特拉，藏人最终获得自由之日，我们会把帮助过西藏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朋友，介绍给依然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



我回到加德满都，集中精力照顾哥哥。我们住在一个小社区

内，社区建在苏瓦扬布纳寺⁷⁹下方的一座小山上，那是一座两千年的古刹，有一座很宏伟的佛塔和很多佛龕。我早晚都爬到山顶，围着寺庙转山。虽然交了不少好朋友，每天我都要独自待上一会儿去祈祷，去默想。沿着山路去拜庙，我看见山坡上长满了药用树木，山脚一片金黄，那是芥菜和其它庄稼正在开花。清晨，我驻步向山下望去，只见整个山谷弥漫着水雾，仿佛一泓湖水。那时，我内心一片宁静，祈祷神灵指引方向。

一天，我正在屋里纺毛线，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天珍阿底峡来找我。他告诉我另一个听证会即将在丹麦召开，邀请我参加。安排好照顾珠古玛的事情，我们一起去达兰萨拉做准备。

在达兰萨拉，我参拜了当地所有的寺庙，向我们的护佑神致敬，接受他们的赐福，求他们保佑我们此行取得圆满成果。起程那天，我们和四位经历了千难万险最近才从西藏逃出来的藏人道别。他们走到我们身边，给我们献上哈达，眼含热泪说：“阿妈，你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不只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而是在把所有西藏人的苦难讲给世界，引起世界的关注。”

1989年11月18日清晨，我们来到了哥本哈根。整整一个小时，我都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我们应邀住在巴塘最有名的活佛拉嘉仁波切的家中，他出生在芒康。当天晚上，我的膝盖疼痛难忍，为减轻疼痛不停地在房间内走动。

天珍阿底峡从门缝下看到灯光，问我为什么不睡觉。他很担心，听证会第二天早晨就要召开，我是一位主要发言者，或许会影响会议如期举行。他说要联系医生，我不想招太多麻烦。后来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有一些达赖喇嘛赐过福的宝贵药丸。他给了

⁷⁹ 苏瓦扬布纳寺：尼泊尔名刹，在尼都西郊——译注

我，很快，我便静静入睡了。

听证会由丹麦支持西藏小组⁸⁰和西藏文化中心⁸¹共同主持。虽然当时正值丹麦举行地方选举，仍然有 500 余人参加了听证会。轮到我发言时，我站起来，展开一条哈达，伸开双臂献给听众，我说：“我代表饱受苦难的西藏人民向你们致意。”他们似乎很欣赏我的举动。要在短短的二十五分钟内诉尽藏人饱受苦难，我再次感到简直不可能。虽然听众看起来反映很强烈，我并不确定我讲的事情中他们真正能理解多少。听证会结束时，发言者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丹麦政府在达赖喇嘛下次来访时给予官方正式接待。

当天晚上，丹麦电视台对此次听证会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报道，包括对我的采访。看到自己在电视上，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尽一份微薄之力感到高兴。丹麦的国家报纸也作了报道，使我们很高兴。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购物。当然，我们从印度来，没有太多钱，去了一家二手商店。店内的一位女售货员非常热情。一看到我们就说：“噢，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听到你的经历，我非常难过。想买衣服吗？想要什么就只管拿吧！”我很难为情，拿了一件外衣和两件小用品。

天珍阿底峡又让我给仁青拿了件衣服。最后，我们满怀感激离开了商店。

在丹麦期间，我们参观了丹麦议会。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是这次听证会的发起者，我们去见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维戈·费歇尔。

⁸⁰ 丹麦支持西藏小组，丹麦援藏组织，总部设哥本哈根——译注

⁸¹ 全球以“西藏文化中心”为名的西藏援助组织不下数十，尚不知具体所指——译注

他完全支持西藏的事业，还告诉我们，如果其它国家也加入进来，丹麦将为帮助西藏人民而竭尽全力。丹麦是一个小国，因此必须和其它国家一起才可以影响整个世界。

最初的这些事曾使我深感快慰，然而，这么多年的失望经历告诉我，如果人权没有成为各国领导者主要关注的问题，这项事业再崇高也并不总足以将世界唤醒。

尾声：时轮

1989 年，仁青和我搬到了达兰萨拉，觉得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外国记者交谈，他们许多人都表示有兴趣采访我。遗憾的是，那时我们没有能够说服珠古玛一起搬家，只得先找人临时照顾他。我们和很多难民一起住在一幢大楼内，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虽然条件不是很好，可也无人在意那些。能生活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方地方，远离恐惧与怀疑，这样的生活无疑是神灵的恩赐。

搬到达兰萨拉后，我很担心哥哥的生活问题，与哥哥离得这么远，时常让我心烦。乘长途车到尼泊尔并不容易，所以根本不可能经常去看他。1990 年夏天，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要我回加德满都。我陪了他几个月，终于说服他和我们一起在达兰萨拉生活。

我们在加德满都时，就有朋友们告诉我们有些陌生人向他们打听我的事情，询问在哪可以找到我。那些人看起来非常可疑，朋友们就告诉他们我已经离开了。不久，我们的确离开了尼泊尔，到了印度的鹿野苑⁸²，至尊要在 1990 年 12 月在此举行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⁸³。参加一次这样的法会是珠古玛最后的心愿，我很高兴大家可以一起在如此自由的氛围中领略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藏传佛教在西藏遭受严重破

⁸² 鹿野苑，位于印度北方邦瓦拉那西以北约 10 公里处，为佛祖初次说法之地，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译注

⁸³ 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藏传佛教重要佛事活动。据信，上师透过灌顶使弟子的身体、心理，相续臻於成熟——译注

坏的人来说，至尊的教诲无疑是无价之宝，值得冒一切风险，付出一切代价。

鹿野苑是佛祖第一次讲道的地方。这里有座非常美丽的庙宇，留有佛祖的遗迹，周围是一座九世纪被蒙古人⁸⁴损毁的大型佛寺出土遗址，当时只有一座巨大的佛塔得以幸免。

珠古玛和我为了躲避查访我们的陌生人，很早就离开了尼泊尔，提前两个月来到了鹿野苑。我们搭起帐篷，住在当地藏人寺院的院子里，后来仁青桑珠也来了。珠古玛依然很虚弱，需要精心照顾，但能和哥哥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觉得十分值得。

十二月中旬，朝圣者开始陆续到来，人数与日俱增。估计大约有十五万人参加了此次法会：来自西藏的藏人，逃亡到印度、尼泊尔、美国及欧洲的藏人，还有一些拉达克人⁸⁵，尼泊尔人、西方人和亚洲其它国家人。会场周围搭起了无数帐篷。

法会期间，每日每夜，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佛塔基座旁的小路转经三周。许多人高声念诵六字真言经和一些其它经文，每一次高声念诵都给唱经增添了特别的韵律。就在佛塔不远处，一段石阶下面，有一座古代寺院遗址，夜幕降临时，香客们在这里点燃成千的酥油灯和蜡烛。此时，仔细端详一下那些刚从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个个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有老年人、年轻人、身着传统服装，发间系着红丝带的康巴汉子、使我想起青春伴侣的年轻妇女，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难民。人们轮番向佛祖、向众神、向至尊祈祷国家的自由，祈祷人间苦难的终结，祈祷者的脸被盈盈燃烧的酥油灯和蜡烛照亮，笼

⁸⁴ 原文 Moguls 既可指蒙古人，又可指莫卧儿人，但都与“九世纪”一说不牟，暂存疑——译注

⁸⁵ 拉达克人居住在克什米尔山区，与藏人有渊源关系——译注

罩在腾腾的热气中。此时及整个法会期间，我都在为死在果塘嘉果的狱友和其他相识的人祈祷。

中国政府不希望藏人参加法会，担心人们利用这个机会相互交流政治信息。然而，仍有许多人冒着极大风险前来参加。共产党好像没有明白，越是阻止人们来鹿野苑，就越是在帮助藏人创造一种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氛围。许多藏人，有些和我是一个地区的，想办法找到我的帐篷，告诉我中国迫害藏人的最新情况。不少人都不敢回家了。

就西藏问题著书立说的各类学者，被称为西藏问题的权威。但我觉得，除了至尊，最了解我们国家的应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共产主义最初进入这片土地的那段日子，记得城镇乡村发生的一切：苦难、掠夺和疯狂的虐待——只要胆敢拒绝受共产主义制度奴役，只要胆敢抵制他们那彻底的文化灭绝政策，这类灾难就会迎头袭来。然而，老人们一直沉默无语。我曾和许多老人谈心，他们都曾遭受共产党的统治，对待此事的态度也都是一致的：他们憎恶共产党占领统治西藏。直到今天，这些老人们早晨做的第一件事、晚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仍是为西藏的独立祈祷，为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祈祷。如果有人去了印度，回来时，老人们总是把他叫到面前询问：“有什么消息吗？我们是不是离目标更近了？”

对于共产党占领西藏，老人们现在比当初更加憎恨，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即将给整个藏族带来威胁——共产党把大量汉人移居西藏，控制藏人的出生率。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反抗自然更加强烈。

我们藏人相信自己有不可混淆的民族特征。一千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认为他们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两

种文化。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有同样的民族认同感。长者去世时，他们的祷词会直接传达给流亡中的至尊达赖喇嘛，传达给国外正在为西藏美好明天努力奋斗的西藏人民。

“我们不是野草，不会被大风连根拨起，我们就是土地。”

西藏人民翘首期盼西藏的主权再次回到人民手中的那一天。我们认为中国对我们国家采取的政策将以失败告终，因为西藏的土地依然存在。不管面临多少困难，不管要付出多少牺牲，我们决不放弃希望。

我们知道，在汉人控制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未来。不管汉人如何处心积虑消除我们对西藏的爱，我们的爱国之情依然强烈。西藏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相信生命是最珍贵的。然而，尽管实力如此悬殊，他们依然进行示威，甘愿牺牲生命，因为他们坚信勇敢奋斗才会帮助西藏实现独立。



我一生的幸福与悲惨的时光都记录在此了。现在我已经 64 岁，一无所有，目不识丁，论到知识，我可以说是愚钝无知。但是，能在至尊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一同逃亡，我感到幸福。再不用为直面那些险恶的敌人而犯难——那些人想摧毁我做人的一切原则，摧毁我的信仰。现在，我终于甩掉了加在我头上的标签，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终于成了一个自由公民。我并非仅仅关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计；远离祖国、家人和朋友，我时常感到悲伤，却又不得不忍受悲伤。

但是这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们见过那么多受苦受难的西藏人，他们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想到那些至今仍

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们，我感到心痛。1987 至 1993 年间，西藏至少有过大大小小上百次示威抗议，要求还西藏以自由。不少这样的抗议就发生在监狱里。

中国现在正实施一些新的政策，历史将证明这些政策会给西藏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磨难。假借着发展西藏经济之名，共产党开始准备让汉人大规模移民西藏，这比以前的任何行动都更具威胁。回想起自 1985 年我获释后看到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的心越来越沉重，西藏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连那里的人民都感到恍若隔世了。



这本书是由一位美国女作家经过与我多次长谈而写成的，我已经把她看成了自己的女儿，还给她取了一个藏语名字。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作为对这个世界的活生生的见证而流传下去，这样，即使明天我不在人世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到独立的西藏与被侵略的西藏的真实情况。有一天，西藏自由了，书中的具体细节可以一一得到证实：劳改营在哪，囚犯被埋在什么地方。一座座万人坑、一个个滥施酷刑的场所就是证据。

这么多年，我发现我所有的记忆都完好无损，永远刻在了我内心深处。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是藏人如何在汉人的统治下走向死亡的证明；是一种声音，提醒人们记住那许许多多我认识的、但却没有逃脱厄运的藏人。我感到随着此书的完成，我的任务或多或少也算完成了。我祈祷我和其他藏人经历的种种暴行和苦难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都能

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我希望本书的读者都来帮助西藏人民，因为在这小小的星球上，每个人都是相联的，一个人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许多人的苦难。我完全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相更有力。迟早，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历史事件撮要

西藏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地处亚洲最高的山岭的中部。自古与中国在政治、宗教及文化上有着长期往来。数千年来，两国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7、8 世纪，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帝国，疆土扩展到中国、中亚及印度的部分地区。13 世纪初，西藏开始受到蒙古人的影响，那时蒙古人还没有夺取中国政权，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西藏与蒙古人关系的性质并不明晰，据某些说法，西藏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的藩属国。而当今的中国，仅仅凭着西藏与元朝这种充满争议的统治关系，宣称西藏主权属于中国，完全无视西藏从古代直至二十世纪都是独立国家的大量证据。

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西藏东部的康区。这一地区虽然在文化上与拉萨西藏中央政府紧密相连，但直到 1950 年共产党入侵前，一直在当地酋长的领导下保持着高度的自治。康区的历史及康区与近邻中国的关系即多彩又复杂。在此，仅让我们回顾一下 18 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以便更好地理解阿妈阿德经历的悲剧性事件背后的一些原由。

清朝是由原来的蒙古帝国的属民满洲人建立起来的。满清时代的中国皇帝宣称对中部西藏拥有宗主权，对康区拥有司法权。康区的范围在棒山口以东，巴塘与昌都之间，本属西藏领土。阿妈阿德的老家梁茹历史上有过一位叫贡波南嘉的酋长，凶悍残暴，权高势众。1835 年，贡波南嘉发起了一场战斗，征服了周围

的部落，并从满清统治者手中将康区的范围重新推进到最初的藏汉边境：白理和加拉王国。

1896 年，满州军再次短暂入侵康区。1904 年，英国扬哈斯本探险队到达拉萨。英国代表在拉萨与西藏人签订了一个新条约，否认中国对中部及东部西藏的统治权。这一举动惊动了满清朝廷，他们担心一旦藏人与英国联合起来，很可能会引来帝国主义军队，给原本坚固的西南边界造成威胁。

鉴于当时局势，清政府派驻藏帮办大臣凤全⁸⁶进入巴塘。巴塘是康区内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地区。凤全下令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发展农业。虽然当地寺院强烈反对这项计划，凤全对寺院的干预完全不屑一顾。他得到命令，要一步步地削弱当地统治者的权势，加强清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于是百名汉人移居西藏的计划开始了。

巴塘的局势急剧恶化。1905 年 4 月，西藏人开始反抗，凤全与其部下被杀死在距巴塘不远的峡谷内⁸⁷。这一事件，再加上担心英帝国主义入侵，清政府于 1905 年派中国将军赵尔丰大规模侵入西藏，企图把康区彻底变成中国的领土，只能建中国庙，讲中国话，穿中国服装。

1912 至 1913 年及 1917 年，赵尔丰率领川军再次入侵康区部分地区。当时，西藏人民卓绝奋战，几乎把所有中国人都驱逐出原来的边界线外。英国驻打箭炉的使馆总顾问埃里克·泰克曼对此事进行调停，向藏人说明，在中国人口密集区附近占据领土是不可能的。藏人接受了意见，与中国在甘孜附近的绒坝岔镇签订了停火协议。

⁸⁶ 原文作 Feng Chang，当为“凤全”讹误。

⁸⁷ 此即所谓“巴塘事件”。

1911 年满清帝国灭亡，赵尔丰的“丰功伟绩”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灰飞烟灭。接下来的混战年代里，中国的大军阀控制着四川、云南、康区东部地区，他们组成自己的半封建联盟，拒绝接受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蒋介石的指挥。这些军阀们的军队控制着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一面向农民征税，一面贩卖鸦片牟利。军阀刘文辉在康区好几个要塞都驻有重兵，如：甘孜、巴塘和梁茹。1939 年，国民党宣布在康区东部置西康省。

1931 年日本入侵满州和中国后，狂轰滥炸城市，残暴屠杀人民，国民党与共产党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驱逐入侵日军。但两支政党间几乎毫无信任，还没等 1946 年春天日本被最终驱逐出东北之前，两党合作便宣告破产。紧接着，中国再次陷入内战。虽然有美国的援助，1948 年底，国民党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彻底打败。蒋介石与众多追随者逃往台湾，剩余残兵败将，诚惶诚恐，四下逃散。

北京的紫禁城是蒙元以降历代中国君主的官邸，其正门叫天安门。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北京市民发表演讲，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正式宣布自己为国家领导。针对上世纪欧洲列强的剥削压迫，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面对着人山人海的听众，毛泽东说：从此中国人民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的确，从此之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势力遍及整个东方。

1949 年末，共产党进驻西藏与四川交界处的西藏小镇打箭炉。国民党领袖刘文辉立即投降，交出了他的所有管区。不久，共产党便控制了整个城市，刘文辉的儿子被打死，财产被没收，自己在共产党委员会里得了个闲职。

195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政府宣布“西康西藏自治区”政府

成立。这个地区的正式名称是“打箭炉自治州”，辖二十二个区，包括甘孜、梁茹、炉霍、德格、道孚和理塘。

1950 年初，稳固了政权的新中国领导，开始实施从 1953 到 1957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快速提高重工业的发展，急剧增加飞机、轮船、卡车、钢及重型机械的生产量。那几年间，国家投资的 56%都用于进口、生产这些产品。

同时，部分由于中国过于依赖苏联援助，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53、1954 连续两年饥荒后，农业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农业可以通过出口创汇为工业提供支持，可以为中国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保证。

西南军区总政委邓小平，是组织入侵西藏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全力劝服毛泽东，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公社化，可有助于在这些地区尽快安插共产党训练出的干部。邓小平说提高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生产，会有助于改善工业发展过快所导致的不均衡，这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越来越严重。

虽然总理周恩来和主席刘少奇持更温和的态度，提倡循序渐进的转换方法，采用“和平方式、温和道路”进行公社化，但是毛泽东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迅速采用了“和平方式，军事道路”来推行公社化。那些被毛泽东选为首批进行公社化实验的地区，面对这种政策，除了接受公有化改造别无选择。康区就是其中之一。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第一步就是集中收缴民众的武器，一些像阿妈阿德一样的藏民，因拒绝接受新政策被逮捕、拘留、折磨、监禁。整个西藏，藏人与中国入侵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59 年 3 月，达赖喇嘛离开西藏逃到印度，从此开始了长期流亡。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中，一味强调

钢产量，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农业荒废。1959年，中国与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停止了向中国出口粮食，中国进入了三年灾荒的第一年，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中国政府看到西藏新发展起来的农业公有制可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由于采用多季耕作，西藏农业获得丰收，但粮食立即被人民解放军征用，或运入中国内陆。西藏人民自己只得靠四处搜寻野菜、虫子和中国居民丢弃的垃圾充饥。整个西藏的藏人连最基本的肉、酥油和蔬菜等食品都吃不到。1959至1962的三年饥荒期间，成千上万的藏人死去。

1962至1966年，形势逐渐好转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影响力有所回升，同时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前几年，邓小平的角色完全不同。他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引发了康区的社会大动乱，西藏众多享有盛誉的寺院都被捣毁。

1960年，刘少奇成为最有名的共产党员之一，职位仅次于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一职，同意刘少奇接替他的职位。刘少奇针对国家日渐恶化的经济，实施了一系列全新有效的经济政策：分配自留地给农民，允许城市居民进行农产品自由贸易，提高工人工资等。这些政策很成功，刘少奇很快赢得人们的爱戴。但是，毛泽东开始怀疑刘少奇，担心他对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胁。

1966年，毛泽东认为甚嚣尘上的“资本主义思想”正在削弱他的权威，于是号召青年，甚至整个中国，打破现有程序和社会规范，去消灭他的敌人。毛发起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叫做“文化大革命”，无数人遭到清算，刘少奇与邓小平首当其冲。

文化大革命是在所谓的“四人帮”的领导下逐步开展的。四

人帮中有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她负责红卫兵运动。红卫兵都是一些青年，火箭般地被推上中国政治舞台。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的社会结构遭到颠覆。不管是科学家、教师、作家，还是艺术家、演员，任何与西方，与国民党势力有接触的人，任何不同意红卫兵所作所为的人，都有可能被捕入狱或丢掉性命。刑讯逼供是那时候的家常便饭。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 14 年之久，阶级斗争仍然蔓延于大街小巷。

1966 年 8 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态蔓延到了西藏。那些在西藏任职多年的汉人官员被迫离开拉萨。拉萨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扇大门上都贴着毛泽东的像。红卫兵向西藏进发，要彻底摧毁西藏文化。他们首先进攻拉萨的大昭寺，以此拉开了这场大破坏的序幕。暴徒们涌进佛寺，亵渎圣像，捣毁了无价的壁画，烧掉了数千页的古代经卷。接下来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藏人被残害而死，有幸活下来的藏人中大多数都被贬损、受侮辱、忍饥挨饿，遭受了极大的肉体折磨。不久，红卫兵内部发生内讧，分裂成了不同的敌对派别。

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破“四旧”。在西藏，共产党试图彻底消灭：旧思想——任何西藏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旧文化——传统的西藏宗教；旧风俗——一切西藏社会的残留；旧习惯——一切具有西藏特色的事物，包括讲藏语。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之后的两年内，邓小平以军队首脑及共产党中间派领导的身份，掌管中国大权。1978 年，他与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取得联系，表示有意与达赖喇嘛进行接触。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来北京商论西藏问题。几次会面中，邓小平都承认共产党在西藏犯了许多错误，并表示十分关切西藏的未来。邓小平告诉嘉乐顿珠，他认为如果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西藏会管理得更好。他认识到共产党 28 年的统治无法消解西藏人民的抵抗，藏人依然认为只有达赖喇嘛才是他们唯一合法的领袖。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国迫切需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非常有必要让其它国家明白中国的内部政策已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新一代领导集体也意识到，海峡两岸统一的唯一希望，就在于使台湾领导人相信，合作的新纪元已在大陆展开。至今西藏仍发生着零零星星的藏人起义，邓小平希望通过折衷和解，缓和西藏局势。他和整个领导集体把共产党的入侵给西藏带去的一切灾难，都算到四人帮的帐上。

共产党对待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态度有了如此转变，实在振奋人心。不幸的是，北京的其他共产党要员很快开始谴责这种转向。虽然藏人的生活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改善，但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仍然严峻。达赖喇嘛返藏的条件始终没有付诸实施。1979 年 1 月 1 日，美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入侵西藏的问题很快成了中国的内政问题。

80 年代初，虽然共产党对本国与西藏都采取了更自由的政策，1989 年情势却急转直下——拉萨的政治示威者遭到了残酷镇压，北京也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天安门屠杀。几乎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坚持通过非暴力方式争取西藏独立，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89 年 4 月，第一届西藏问题国际人权听证会在德国波恩举行，这些大大激发了全球的西藏独立运动。

近年，中国对西藏政策起起伏伏，时松时紧，但西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读者如果想知道西藏局势的最新消息，或者想为西藏独立贡献一己之力，请参阅本书末尾的“西藏援助机构名录”⁸⁸。

⁸⁸ 该内容未译出——译注

附录二

英汉西藏专名对照表⁸⁹

英语	汉语	注释
Aghey	阿希	布纳塘战役的一位幸存者
Ahtra	阿塔	阿德哥哥珠古玛的妻子
Aso	阿索	1、阿德的大妈的三儿子； 2、砖瓦队的喇嘛
Avalokiteshvara	观音菩萨	梵语名称
Bathang	巴塘	甘孜一地名
Beri	白理	康区东部地名
Beri Lhaga	贝理拉佳	阿德的狱友
Beri Pon	贝理头人	贝理拉佳的丈夫
Bhombi	鲍碧	阿德夫家的仆人
Bhumo	布姆	阿德的二姐
Bhumo Yalu	布姆雅禄	阿德的狱友
Bochungma	博琼玛	阿德父亲的第一个妻子
Bu na thang	布纳塘	梁茹的一片平原
Bum La Pass	棒山口	藏印交界处的一山口
Chagla	加拉省	藏边行省，后被中国兼并
Chagrong Sonam Tobchen	恰荣索南托钦	甘孜寺和尚，留守寺庙
Chagzotsangs	恰卓仓	霍尔五部的大家族
Chak Sum	恰松	铁桥，铁索桥
Chakpori	药王山	拉萨
Chaksam Kha	恰桑卡	泸定县
Chale	夏乐	阿德的大妈的二儿子
cham	羌姆	宗教舞蹈
chang/chhang	青稞酒	藏人喜爱的酒

⁸⁹ 感谢国际援助西藏运动（ICT）的 Rinchen Tashi 先生校阅本部分专名，改正了不少讹误——译者

Chatring	乡城	桌卡和央钦的家
Chemey Tashi	其美扎西	贡嘎坚赞的儿子
Chendha	钦德	甘孜寺院区的一个地方
Chenrezig	渐列喜	观音菩萨
Chethok	且托克	康定地名
Chimi Wangyal	其美旺加	阿德的儿子
Choenyi Dolma	楚依卓玛	阿德夫家的仆人兼好友
Chomphel Gyamsto	群培嘉措仁波切	阿德家的祖师
Rinpoche		
Chomphel Gyamtso	乔白嘉措	阿德家的喇嘛
Chulo Dzong	曲洛宗	地名，有林场
Chung Rinpoche	琼仁波切	敏竹林寺喇嘛
Crown Buddha		
Shakyamuni	宝冠释迦牟尼佛像	佛祖十二岁等身像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格鲁派领袖
De Gonpo	德贡布寺	在甘孜
Dechen Lhamo	德臣拉姆	阿德的化名
Dechen Wangmo	德臣望姆	希瓦仓家之女，阿德的好友
Derge	德格	康区地名，在今甘孜州
Dharamsala	达兰萨拉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Dhargye	达吉	地名，阿德的狱友拉佳的家
dharma	达摩	真理、真知
Do go thang	多果塘	贝玛坚赞被处死的地方
Dolkar	卓嘎	被奸污的女囚
Dolma Lhakyi	卓玛拉吉	阿德的大姐，乳名叫色拉玛
Dolma Yagtso	卓玛雅措	阿德的狱友
Dorje Raptan	多杰拉普丹	阿德的父亲
Dorje Yudon	多杰玉珍	嘉日尼玛之妻，抵抗组织领导
Dra-Dha	达拉达	大察尔寺一位活佛的出生地
Dram	樟木	西藏和尼泊尔边境小镇
Drapchi	扎布奇监狱	拉萨著名监狱
Drepung	哲蚌寺	拉萨寺院
drogpa	桌格巴	游牧部落
drong	踵	野牦牛

Dugkar	都噶	大白伞盖佛母
Dugkar thanka	都卡尔唐卡	在甘孜寺
Dza Chu	扎曲	阿德家乡的河
dzong	宗	1、堡垒式建筑；2、县一级行政单位
five Hor States	霍尔五部	地在今康定县
Ganden	甘丹寺	拉萨寺院
Garthar	尕塔尔	劳改营所在地
Gelugpa	格鲁巴	教派
geshe	格西	获佛学体制最高学位的僧侣
Ghapa Lin Chang	嘎巴林场	康定附近一个劳改场，仁青曾在那里劳改
Gholo Tho	果洛托	阿德的劳改队劳动的地方
Golmud	格尔木	安多一地名
Golok	果洛	康区和安多交界地区
Gonpo Namgyal	贡波南嘉	梁茹的酋长
Gothang Gonpa	戈塘贡巴	一座被改成仓库的寺院
Gothang Gyalgo	果塘嘉果	阿德的劳改营
Gowa Kha monastery	果瓦喀寺院	米纳的寺院，帕旦供职于此
green Dolma	绿度母	观音菩萨的化身之一
Gutsa	古察监狱	拉萨著名监狱
Gyalo Thondup	嘉乐顿珠	达赖喇嘛二哥
gyama	嘉玛	重量单位
Gyanka	江卡	甘孜一地名
Gyapontsang	嘉本仓	阿德的狱友拉佳的姓
Gyari Dorje Namgyal	嘉日多杰南嘉	阿德家乡的头人
Gyari Nyima	嘉日尼玛	嘉日多杰南嘉之子，共产党初入康区时曾任领导
Gyaritsang	嘉日仓	阿德的家乡的统治家族
Gyayi Tago	嘉义塔果	康定东去的公路
Gylathang	中甸	康区一地名，在今云南
Holo Drago	霍洛卓格山	阿德小时去朝拜的一座圣山

Jampelyang	妙吉祥	曼殊室利，文殊菩萨
Jamyang Norbu	江央诺布	《西藏勇士》作者
Jamyang Samphel Shivatsang	江央桑白希瓦仓	甘孜名土司，与嘉日仓联姻
Jigme Ngapo	阿沛晋美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Jokhang	大昭寺	在拉萨
Jowo Mikyoe Dorje	米觉多杰佛	在大昭寺的佛祖 8 岁等身像
Jowo Shakyamuni	释迦牟尼佛	佛祖十二岁等身像
Jughuma	珠古玛	阿德的大哥
Jyekundo	玉树	安多南部一地名
Ka Misa	嘉米萨	阿德的狱友
Kalachakra	时轮金刚灌顶法会	藏传佛教重要佛事活动
kalsang flower	格桑花	西藏高原的草本植物
Kalsang monastery	格桑寺	乔白嘉措所在的寺院
Kamba Pass	岗巴拉山口	位于西藏山南地区
Karmapa	葛玛巴	噶举派的大宝法王
Karze Day-tshal	甘孜大察尔寺	离阿德家乡不远的寺院
Kashag/the Tibetan Ministry	噶厦/内阁	流亡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Kathong Gonpa	嘎塘贡巴寺	卡塘司徒仁波切供职的寺院
Kathong Situ	嘎塘司徒仁波切	阿德的狱友
Kawalori Massif	卡瓦拉里	阿德家乡的山
Khangsar	康萨尔	新家
Khangsar dzong	康萨尔宗	甘孜地名
Kharnang Kusho	卡囊库朔	阿德家的喇嘛
Kharnang monastery	卡囊寺	阿德家乡的寺院
khatag	哈达	藏人表示献礼的丝巾
Kora	转山	藏传佛教崇拜仪式
Kunga Gyaltsen	贡嘎坚赞	希瓦仓家族
Kunga Gyaltsen Shivatsang	贡嘎坚赞希瓦仓	甘孜土司的儿子
Kushi Lago	库什拉果山	阿德去伐木的林场所在的山
Kusung Depon	库松德鹏	达赖喇嘛的总保镖
Kyi River	吉曲河	罗布林卡附近的河流

Lamdark Rinpoche	蓝达仁波切	甘孜寺喇嘛
Lhaka Rinpoche	拉嘉仁波切	巴塘最有名活佛，流亡丹麦
Lhakyi	拉吉	阿德哥哥珠古玛的女儿
lhamo	拉姆	藏戏
Lhamo Dolma	拉摩卓玛	阿德的狱友
Lhamo Lhatso	娜姆拉措湖	藏传佛教圣湖
Lhobasha	洛巴夏	阿德的家乡
Lhodrang Namkha Gyaltsen	洛荣纳卡坚赞	甘孜寺喇嘛
Lhoka	山南地区	藏南一地区
Lhoyang	洛央	抵抗组织成员，后供出阿德
Lingkarshé	灵卡夏	囊措望姆的家乡
Lobsang Jinpa	洛桑津巴	西藏政治犯，波恩国际听证 会证人
Lobsang Sampten	罗桑珊登	达赖喇嘛的哥哥
Lobsang Tenpa	洛桑丹巴	为作者提供书面证词
Lodi Gyari	洛珠嘉日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任
Losar	洛萨节	藏族新年
Mahakala	大黑天神	藏传佛教八大护法之一
mandala	曼荼罗	“坛”、“场”
mani shrines	嘛呢堆	嘛尼石堆成的圆锥形石堆
Manjushri	曼殊室利	文殊菩萨
Markham	芒康	昌都一地名
Mazur	马祖尔	分区的管理者
Mimang Tsongdu	人民大会	西藏抵抗组织
Mindoling Monastery	敏竹林寺	在山南扎囊县
Minyak	米纳	康定县
Minyak Kaluga khar	米纳卡鲁嘎卡尔	康定地名
Minyak Ra-nga gang	米纳拉嘎冈	新都桥
Minyak Tago	米纳塔果	康定西去的公路
Monlam Chenmo	默朗木祈愿大法会	藏历新年 15 天后的一个盛大 的祈祷节
Mount Kailash	迦拉萨山	即冈底斯山

Namgyal monastery	南嘉寺	达赖喇嘛所在的寺院
Nangtso Wangmo	囊措旺姆	被奸污的女囚
Ngachoe monastery	纳确寺	康定
Ngawang	阿旺扎玛加本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
Drakmargyapon		
Ngawang Kusho	阿旺库朔	仁青的大哥
Norbulinka	罗布林卡	达赖喇嘛的夏宫
Nyangchuka	亚曲喀	即雅江
Nyagto	纳格托	阿德的家乡
Nyagye	纳耶	甘孜地名
Nyarong	梁茹	阿德的家乡
Nyima	尼玛	阿德的哥哥
Nyingma sect	宁玛派	藏传佛教派系
Ochoe	奥确	阿德的哥哥，未婚
Padhen	巴丹	嘉米萨的哥哥
Padmasambhava	莲花生	红教创始开山祖师
Palden	巴旦	甘孜的副土司，因帮助抵抗组织被捕
Paljor	巴觉	朱古玛的助手，后为中共翻译
Palrno	帕尔诺	阿德家的管家
Panchen Lama	班禅喇嘛	格鲁派活佛，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
Pema Gyaltsen	贝玛坚赞	阿德的姐夫，布姆的丈夫
Pema Namgyal	贝玛南加	来自甘孜的抵抗组织领袖
Pema Wangchuk	贝玛旺求	热嘉的丈夫
Pema Wangmo	贝玛旺姆	湿瓦仓家之女，阿德的好友
Phitsha	培夏	梁茹和理塘之间的游牧区
Phuntsoe Gyatso	鹏才嘉措	抵抗运动甘孜领导人
Phurba	普尔巴	阿德的大姐夫，卓玛拉奇之夫
Potala	布达拉宫	达赖喇嘛的宫殿
Prince Siddhartha	祖悉达多王子	佛祖
Purang Khorchag	普朗库恰觉沃寺	迦拉萨山上的寺院
Jowo		
Ramoche	小昭寺	在拉萨

Ra-nga namthang	拉嘎纳塘	康区地名
Rekho	瑞可	阿德的狱友，因抽血致死
Reting Rinpoche	热振仁波切	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臣
Ribhur Trulku	热布土库	色拉寺喇嘛
ridag choekhor	八幅金轮	佛教宝器
Riga	热尕	桑杜的姐姐
Rinchen Dolma	仁青卓玛	阿德的狱友，因抽血致死
Rinchen Samdup	仁青桑珠	阿德前夫的亲戚，后与阿德结婚
Ro Xian	娄县	一个原始森林
Rongbatsa	绒坝岔	甘孜地名
Sampten Dolma	桑旦卓玛	阿德的婆婆
Sandhutsangs	桑都仓	霍尔五部的大家族
Sangdhu Pachen	桑杜帕钦	阿德的第一位丈夫
Sangye	桑杰	佛
Sangye Yeshe	桑叶耶西	一个藏人内奸
Sangyip	桑伊监狱	拉萨著名监狱
Saraha Rinpoche	萨拉哈仁波切	甘孜寺喇嘛
Sarnath	鹿野苑	佛祖第一次传法处
Saten	萨丹	阿德丈夫的老家
Sateng Qu	萨藤区	康区地名，属康定
Sera	色拉寺	拉萨寺院
Sera Ma	色拉玛	阿德的大姐的乳名
Sergyi Drongri	色吉仲日麦波	意思是金牦牛居住的地方
Mukpo	色达	康区地名，在今甘孜州
Setha	夏杰拉	米纳拉嘎冈的神山
Sha Jera	夏劳改营	阿旺库朔呆过的劳改营
Sha Labor Camp	夏丹寺	康定寺院
Shapten monastery	日喀则	地名，今属日喀则地区
Shigatze	什玛岔	康定地名，在今甘孜州
Shimacha	西窝绒	一劳改队之名，在萨藤区
Shiwo Rong	西雅祖古	甘孜寺喇嘛
Sigyab Tulku		

Sonam Dolma	索南卓玛	瓦术托洛的妻子
Sonam Gyal	索南嘉波	十三世达赖的宗教导师
Sonam Gyurme	索南俊美	阿德夫家的佣人
Sonam Topgyal	索南多杰	噶夏(内阁)政治事务委员会
Su-ngo sha	苏额夏	甘孜城下平原的一座村庄
Tapontsang	达本仓	阿德的姓
Tara	塔拉	度母, 女菩萨
Tashi Khando	扎西坎多	阿德的女儿
Tashi Tsering	扎西次仁	藏学专家
Tashilhunpo monastery	扎什伦布寺	位于日喀则
tata	塔塔	各种颜色的布块拼的衣服
Tawo	道孚	伊嘉的老家
Tenzin	丹增	藏族看守
Tenzin Geyche	丹增格西	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
Tenzin Ngodup	丹增俄珠	阿德珠古玛的好朋友
Tenzin Sangpo	丹增桑波	阿德的狱友
Tenzin Tethong	丹增戴童	作者致谢词中提到
Tenzing Atisha	丹增阿底峡	新闻和国际事务部官员
Tenzing Atisha thamzing	天珍阿底峡	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
Thangu	批斗会	藏人仿汉语新创的词汇
The Essence of Nectar	丹古	女犯队看守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he Graded Path	《甘露精滴》	益西措嘉作
Three Jewels	《菩提道次第论》	宗喀巴大师所作
Thupten Dhargye	三宝	即佛宝、法宝和僧宝
Thupten Gyatso	土登达杰	阿德的狱友
Tibet Support Group of Denmark	土登嘉措	十三世达赖喇嘛
Tongkhör Shagdrung	丹麦支持西藏小组	国际援藏组织
Trango	东果尔夏仲	一位自杀的仁波切
Trijang Rinpoche	炉霍	康区地名, 今属甘孜州
	赤江仁波切	达赖喇嘛的副经师

trimpon	垂朋	法官或律师
Trisong Detsen	赤松德赞	藏王
tru-zo	仲萨	婚礼
Tseloma	才洛玛	阿德家的女仆
Tsering Lhamo	才令拉嫫	阿德的狱友，因抽血致死
Tsering Yuden	才令玉顿	阿德的狱友
Tsetan Samdup	才丹桑珠	西藏伦敦办事处
Tsetan Wangchuk	才丹旺修	美国之音西藏历史学家
Tsewang Tashi	才旺扎西	阿德在洛巴夏的乡邻，因帮助抵抗组织被捕
Tsola	措拉	阿德的小伙伴，阿德女儿的养母
Tsongkhapa	宗喀巴	格鲁派创立者
Tuta	图塔	相当于排长的军衔
Upper Dharamsala	上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官邸所在
U-Tsang	卫藏	西藏中部地区
Volunteer Freedom Fighters/VFF	卫国卫教志愿兵	抵抗组织
Wangchuk Dorje	旺修多杰	江央桑白希瓦仓的儿子，娶嘉日仓家的女儿
Washul Tolho	瓦术托洛	色达抵抗力量指挥官
Yamdruk	羊卓雍错	西藏三大圣湖之一
Yangchen	央钦	被奸污的女囚，阿德的狱友
Yenum	叶努	临近尼泊尔的一座边贸镇
Yeshe Tsondru	益西宗志	《甘露精滴》作者
Yeshi Dorje	耶希多杰	藏语翻译
Yhagra Tago	雅拉塔果	康定北去的公路
Yigma	伊朶	阿德的狱友
Yulo Gonpo	玉禄贡宝	共产党利用的乞丐
Yundrung Peimo	云尊佩嫫	阿德的狱友，因抽血致死
Zi stones	猫眼宝石	藏人喜爱的饰物
Ziling	西宁	在今青海

记忆的声音

黑色文库 第十五集

口述/阿妈阿德

编著/乔伊·布雷克斯莉

翻译/杨莉藜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 作者 阿妈阿德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The Voice that Remembers

By Ama Adhe

As Told to Joy Blakeslee

Black Series Volume 15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6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18.00

一部跨世纪的西藏悲壮史诗

记忆的声音

阿妈阿德 口述
乔伊·布雷克斯莉 著
杨莉黎 译

作者简介

阿妈阿德，1932年一个出生在康区梁茹（今四川新龙）。曾经在家乡渡过田园诗一般幸福的童年和少女时光。中国军队入侵西藏，开始系统地摧毁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引起藏族人民的自卫反抗。阿妈阿德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婆婆、姐夫和无数的亲人邻里，她本人也因为曾经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入狱将近三十年，受尽了酷刑折磨，几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1985年，终于出狱，辗转来到印度。从此，她多次出现在国际会议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中共入侵西藏后，给西藏人民带来的苦难，给西藏文化造成的毁灭。难能可贵的是阿德虽曾经历巨大的压迫与折磨，依然能坚守人类的尊严、正直、慈爱与宽容。作者现居达兰萨拉。

黑色文库 第十五集
劳改基金会

The Voice that Remembers
By Ama Adhe
As Told to Joy Blakeslee
Black Series, Volume 15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6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8.00



